

批判毒草小说文选



湖北省图书馆编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PDG

702.3  
812  
4111



149  
0.80

# 目 录

- 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  
——评《上海的早晨》  
..... 丁学雷 (1)
- 阶级斗争在继续  
——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  
..... 丁学雷 (13)
- 砸烂资产阶级的“功德碑”  
..... 何为革 (24)
- 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  
——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  
..... 安学江 (31)
- 《风雷》的出笼和刘少奇的罪恶“足印”  
..... 《拂晓报》编辑部批判《风雷》小组  
宿县专区革命大批判组 (43)
- 射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毒箭  
——从《风雷》中任为群形象的塑造看陈登科的反革命策略  
..... 安徽工农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评论组 (49)
- 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  
——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及其“来龙去脉”  
.....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56)

欧阳山为青年设置的一条死胡同

——评叛徒、工贼周炳的道路

..... 中山大学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70)

阶级投降主义的一个黑标本

——狠批反动小说《东风化雨》

..... 巩旭黎 (80)

为复辟资本主义呼风唤雨的大毒草

——评反动小说《东风化雨》

..... 上海采矿机械厂工人 程继尧 (88)

评为王明路线招魂的反动作品《红旗谱》《播火记》

..... 冀红文 (100)

两个躯壳 一个幽灵

——评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贾湘农

..... 何 达 (109)

叛徒王明路线的忠实走卒

——评《红旗谱》《播火记》中的主人公朱老忠

..... 何诗元 红 宣 (119)

《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

..... 文红军 左红兵 新北文 (128)

《保卫延安》是一株反党的大毒草

..... 解放军某部 红 哨 (141)

一部狂热鼓吹刘少奇叛徒哲学的反动小说

——批判《战斗的青春》

..... 冀向东 (153)

## 刘少奇叛徒哲学的黑样板

——批判反动小说《战斗的青春》

..... 驻沪空军 卫红鹰 (162)

## 叛徒小说出笼前后的一场政治斗争

..... 李新弓 (172)

## 是“斗”还是“降”？

——评李英儒的大毒草《野火春风斗古城》

..... 河北省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177)

## 革命人经得起地陷天塌

——《斗古城》里的杨老太太根本不是革命母亲

..... 子弟兵母亲 戎冠秀 (188)

## 撕下老牌机会主义者陶铸的画皮

——评反动小说《小城春秋》

..... 吴泰昌 马连儒 邹正贤 林 心 (194)

## “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吹鼓手

——评反动小说《小城春秋》

..... 驻厦门大学工、军宣队  
厦门大学革委会大批判小组 (202)

## 反动小说《红日》为谁招魂立传？

..... 驻沪空军 卫红鹰 红鹰群 (207)

## 彻底砸烂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天白日”

——评吴强的反动小说《红日》

..... 齐南文 解胜文 (217)

叛人民战争之道的黑标本

——彻底批判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

..... 鲁文 (233)

刘洪是哪个阶级的“英雄人物”？

..... 青岛市文化局革命委员会写作组 (244)

胜利从何而来

..... 虹燕 (250)

人民军队所向无敌

..... 驻军某部 红线兵 锋 军 (258)

把中国农村“变”向何方？

——批判周立波的反动小说《山乡巨变》

.....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 (261)

黑作家周立波和他的反动哲学

..... 桃江县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275)

《三里湾》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反动

.....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 (281)

彻底批判《三里湾》贩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 晋红兵 (292)

# 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 鸣锣开道的大毒草

——评《上海的早晨》

丁 学 雷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重要时刻、每一重大问题上，都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在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同伙，更加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以下简称《早晨》)，就是一株狂热鼓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在我们认真学习“九大”文献的时候，剖析一下《早晨》这个反面教材，对于提高我们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益处的。

## 美化资产阶级

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向我们指出：全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刚开完，工贼刘少奇就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大唱反调，鼓吹资产阶级“剥削有功”，叫嚷资产阶级还处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资本主义。

解放初期窃踞过上海旧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要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为了给他的黑主子刘少奇的反革命谬论提供艺术标本，挖空心思地在《早晨》中刻划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家。

“红色小开”马慕韩，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这个大老板“不在乎钞票”，高唱着“要前进，前进”，“跟着时代走”的调子。在作者笔下，他不仅“爱国”，而且“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叛徒刘少奇不是硬说有“可以跟无产阶级一致、可以学会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入党”的资本家吗？《早晨》中的这个“红色小开”，就是根据刘少奇的谬论捏造出来的。

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是周而复竭尽全力刻划的《早晨》的主人公。这个大资本家被描写成“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在周而复的心目中，此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所谓“正统”的资产阶级。《早晨》花了许多笔墨，极力渲染这个资本家，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

还有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朱延年。周而复再



三强调这个药房老板不能代表“工商界”。只不过是“沾污了上海工商界”的“败类”，已经“根本不能算资产阶级”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了最科学、最精辟的分析。毛主席指出：一、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有革命性；二、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三、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者属于人民的范围，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人民的敌人。毛主席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分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为题材的《早晨》，通过对三个不同类型资本家的刻画，打出了一块“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招牌，玩弄了一套“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的把戏，抛出了一个“根本不能算资产阶级”的工商界“败类”。小说对资产阶级的这种描写，同毛主席的科学分析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周而复替马慕韩之流挂上一块“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招牌，是想把资产阶级打扮成刘少奇所说的“红色资本家”。在周而复的笔下，这种“红色资本家”，“革命”得很，不仅没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且比工人阶级还要高明。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严正地指出：“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

事实呢？不是事实。”在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发表以后，周而复竟然还如此明目张胆地美化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同我们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唱反调吗！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没有两面性”的“红色资本家”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恰恰在他拚命“拔高”马慕韩这个人物的时候，就露出了马脚。野心勃勃，一心想“跨上政治舞台，担任一名角色”的，是这个“红色小开”；表面上冠冕堂皇，暗地里大搞五毒的，也是这个“红色小开”；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星二聚餐会”，狂叫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确实才有力量”的，还是这个“红色小开”。马慕韩自己就明明白白地招供过：“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厂，就是学共产党的那一套，要跟时代走，向前看，我们的前途就更大。”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象变色龙那样变换颜色，披上“红色”的外衣，“学共产党的那一套”，就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争取资产阶级的“更大”的前途。

《早晨》中玩弄的“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的把戏，也实在太不高明。这场“变化”的主角是徐义德。他五毒俱全，还日夜梦想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反攻大陆”，以恢复他的“黄金时代”。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徐义德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各种方式穷凶极恶地反抗我们党的限制政策的大资本家。这个大资本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是一个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家伙。这样反动的资本家，竟然能够靠他自己的“觉悟”，在一夜之间完成“伟大的历史性变化”，岂不奇哉怪也！周而复为什么要变这套蹩脚的戏法？就是要人们相信象徐义德这样的资产阶级，只要象大工贼刘少奇所说的那样，“说通了之后”，就能够和无产阶级“团结”“合

作”。而饶漱石、谭震林之流，秉承刘少奇的旨意，当时就在上海把工厂中的“民主改革”运动篡改为“民主团结”运动，要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去讲“民主”，搞“团结”，完全否定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周而复的反动小说《早晨》，正是为了卖力地推行从刘少奇到谭震林之流的这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过一位经济学家的这样一段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一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早晨》中的朱延年，就是这样一个“不怕绞首的危险”的资本家。在伟大的“五反”运动中，上海的工人阶级曾经揭露出一个不法奸商王康年。这个王康年，竟然丧心病狂地把假药、坏药销售给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获取暴利。小说中的朱延年，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王康年之流。这样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周而复却说什么他“根本不能算资产阶级”，这不是在为资产阶级辩护又是什么！

刘少奇不是叫嚷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吗？刘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马慕韩所说的资产阶级“前途”“更大”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处在“年青时代”的社会制度。周而复在《早晨》中极力美化“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就是为了抹煞全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否认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以开辟资产阶级的“年青时代”，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 污蔑工人阶级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

矛盾中，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光辉文献中教导我们：“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

可是，对工人阶级怀着刻骨仇恨的大工贼刘少奇，却恶毒地污蔑工人阶级“不可靠”，“不如资本家”。周而复在《早晨》中，就是按照刘少奇的调子来描写工人阶级的。

你说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周而复却把工人写成是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工人汤阿英，是《早晨》中的一个主要工人形象，也是刘少奇的“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的反革命谬论的活标本。这个贫农的女儿和她的一家，遭受了杨白劳和喜儿同样的命运。可是，到了周而复的笔下，这个苦大仇深的女工，在解放以后居然还对资本家感恩戴德，认为是“资本家拿出钱来办工厂”，“养活了我们工人”。她成天战战兢兢，拚命干活，唯恐资本家歇了她的生意，丢了饭碗。“五反”运动开始，听人说工人阶级要领导工厂，她怎么也想不通：“工厂是资本家的，工人怎么好管理”？大工贼刘少奇的忠实走卒周而复，如此放肆地污蔑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真是反动透顶！

工人群众是如此，所谓“工人领袖”又怎么样呢？《早晨》中

的“工人领袖”、沪江纱厂工会主席余静，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奴才。解放前，她躲在背后“领导罢工”，搞的是“有好处大家享受”的经济主义，并且“私心还很欢迎”地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黄色工会的国民党鹰犬。解放后，她当了权，在工人面前，指手划脚，趾高气扬，而在资本家面前，却变成一头绵羊，驯服地跟着资本家转。她还跟资本家的小老婆打得火热，并大放厥词，胡说什么“大家都是人”，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劝这个小老婆要“真正的爱”资本家，活现出一副工贼的丑恶嘴脸。由这样的“工人领袖”和资本家“合作”搞“社会主义”，当然就会象大工贼刘少奇说的那样，使资本家“眉开眼笑”了。

象余静、汤阿英这样的“工人阶级”，既不能依靠，更无法肩负起领导阶级的重任。那么，由谁来当领导阶级呢？当然只好恭请资产阶级了。请看，在《早晨》中，工人是那样愚昧落后，而资本家却懂理论，懂政策，进步快，觉悟高；工人是那样软弱无能，只知埋头干活，而资本家却“魄力大”“能力强”，有的“老练通达”，有的“年青有为”。对比是何等鲜明！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在周而复的笔下，完全被颠倒了。这样还嫌不够，他又居然不惜篇幅为资产阶级胡诌了一篇“光荣历史”，厚颜无耻地说“工商界老一辈人，为了救国救民出过不少力气，中国能有今日，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哩。”原来中国之“能有今日”，竟是资产阶级“艰苦努力”的结果。按照周而复这种说法，今日之中国，岂不应该是资产阶级的天下了吗？

周而复这个反动家伙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污蔑工人阶级，为什么要如此肉麻地吹捧资产阶级？显然是为了鼓动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行反革命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周而复对工人阶级的无耻诽谤，不过是狂犬吠日，损害不

了工人阶级的一根毫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也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伟大新时代已经到来。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正以无比豪迈的英雄气概，在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把一切顽抗到底的反动阶级及其形形色色的代理人踩在自己的脚下，彻底粉碎了周而复及其黑主子刘少奇的反革命迷梦！

### 鼓吹修正主义路线

对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还是象大叛徒刘少奇鼓吹的那样，对资产阶级“可以不革他们的命”，只准“团结”，不准斗争，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这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路线，前者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后者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早晨》标榜“它写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平改造的过程”。我们不妨来看看它写的“党的领导”究竟是按照什么路线来“改造”资产阶级的。

体现“党的领导”的，是沪江纱厂“五反”检查队队长、区委统战部长杨健。此人既可算是周而复的“夫子自道”（周而复正是“五反”时在一个私营纱厂“蹲点”的“统战部长”），也可说是大工贼刘少奇的一个写照。杨健一进厂，就大捧五毒俱全的反动资本家徐义德，说什么“徐总经理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这方面，我很清楚，从来没有怀疑过，并且给予足够的评价。”他死保徐义德，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徐义德在“五反”检查队进厂后，用停薪、停伙、停工来破坏“五反”运动，反动气焰十分

嚣张，工人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杨健却立即加以压制，胡说“这么一来，我们就理亏了”，“我们不能用违法对待违法”。一句话就露出了这个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工贼的狰狞面目。杨健要的是什么“理”，守的是什么“法”，还不清楚吗？这个“理”，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强盗逻辑；这个“法”，是专门保护资产阶级利益，镇压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枷锁。大工贼刘少奇不是叫嚷“如果反对资本家，就便搞错了”，就是“犯路线的错误”吗？这些黑话，正是杨健信奉的“理”和“法”的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对它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改造”，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干净，逐步把他们“化”掉，最后完全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所以用和平改造的方法，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怕资产阶级造反。和平改造，是一种不流血的阶级斗争，是以“武攻”为后盾的“文攻”。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种“文攻”比武装斗争更为深刻，更为复杂，更为曲折。

毛主席早就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五反”运动，就是解放以后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第一个大战役，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可是，身为“五反”检查队队长的杨健进厂以后，马上就定下一个调子：“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总之，资本家决定一切，徐义德的“彻底坦白”，既决定“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决定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成败。于是，一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二不要组织阶级队伍，三不要开展阶级斗争，需要的只是用苦口婆心的劝说来说“启发”资本家“个人的觉悟”。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这算什么革命！

杨健在“五反”运动中依靠的又是些什么人呢？他完全按照刘少奇所说的一套，“在资产阶级中间”培养“一批积极分子”，依靠他们来引起徐义德的“伟大的历史性变化”。是“红色小开”马慕韩的“自觉革命”，为徐义德的“坦白交代”树立了“榜样”；是大工贼刘少奇赞不绝口的那种能抵得上“两个副总理”的资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话，真正触动了徐义德的心境；是徐义德的心腹工程师韩云程、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冲垮了他的“防堤”。这就是杨健的“三依靠”。

经过杨健导演的一场闹剧，徐义德居然“过关”了。“五反”工作总结大会刚结束，杨健马上向这个吸血鬼献媚讨好，迫不及待地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并且把这个吸血鬼抗拒“五反”运动的罪行轻轻归结为一个“认识问题”。徐义德有了这样的党内代理人作靠山，不禁得意忘形，手舞足蹈，一路高叫“我过关了”。无怪乎他要特地到王开照相馆去拍个照，以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的新的开始了。

至此，小说所谓的“和平改造”，真相大白了。杨健在“五反”运动中所推行的路线，是完全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抗衡的，是刘少奇的那条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



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和平”有之，“改造”却不见了。资产阶级正是把他们的反革命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上的。他们根据刘少奇的“向工人斗争”的反革命号令，向党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周而复借徐义德之口说：

“我们资产阶级一无军队，二无组织，三无总司令，怎么进攻呢？”真是欲盖弥彰。社会上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那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党内走资派，就是你们的“军队”，周而复就是其中的一员黑干将。什么“聚餐会”，什么“集团”，一直到党内的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你们的“组织”。至于你们的“总司令”，不是别人，就是那个罪恶滔天，死有余辜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黄鹤一去不复返”。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个黑“总司令”的死刑，那些大大小小的杨健们，也一个个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反动小说《早晨》出笼的时候，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发动的进攻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党的“九大”政治报告指出：“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就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周而复穷凶极恶地抛出了这部颠倒历史的大毒草，又特意起名《上海的早晨》，妄图通过这部以“五反”运动为题材的小说，鼓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梦想使上海以至全中国都变成资产阶级的“早晨”，也就是说变成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历史早就下了结论：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

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充其量不过是同盟者的角色；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成了被改造、被消灭的对象，何来象征着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早晨”？

历史的车轮岂容倒转。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始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晨”、“黄金时代”，就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如今，这部破烂不堪的被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吹捧为“了不起的工程”的反动小说《早晨》，已经成为他们复辟资产主义的罪证和革命人民的反面教材了！

旭日东升，朝霞满天。真正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上海的早晨，决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是属于紧紧掌握着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命运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我们将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

## 阶级斗争在继续

——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  
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

丁 学 雷

近来，围绕着为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以下简称《早晨》）翻案和反翻案的斗争，在上海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人民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們写的《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一文。这篇文章，是学习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严正批判中的许多好意见写出来的。发表不久，上海市煤气公司即跳出一个人来，名曰桑伟川，写了一篇唱对台戏的文章，为大毒草《上海的早晨》翻案，为毒草的作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翻案，为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文汇报》将这篇奇文加了按语，在十一月二十日发表出来。桑伟川的专业不是文艺工作而是煤气技术。然而，他却很懂得利用文艺评论的武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服务。他的文章的出现，博得了阶级敌人的喝采，也使我们队伍中某些患伤风感冒的人鼻子开通起来，懂得了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形式。这场斗争使我们进一步领会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受到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码头工人说得好：“太平洋从来不太平，上海港也决不是避

风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谁想要把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停止下来，想要把枕头塞得高高的蒙头睡觉，那就十分危险。

## 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和现实中的路线斗争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重新提起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都是为着现实中的阶级斗争。透过毒草小说《早晨》以及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场已经延续了整整二十年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国内的基本矛盾始终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怎样对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两条路线的鲜明分界线。毛主席号召全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则狂叫资本家“剥削有功”，“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而“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公开煽动资本家“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五反”运动，既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一次全国规模的大较量，也是党内两条路线的一次大较量。这种斗争，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力量最为强大、资产阶级势力也十分集中的上海，表现得更为尖锐和复杂。

上海解放以后，刘少奇一伙就在这里安插了他们的代理人饶漱石、潘汉年、陈丕显等。他们对伟大的“五反”运动进行百般的阻挠、破坏和反攻倒算。他们鼓吹对资产阶级要“团结合作”，把“民主改革”运动篡改为“民主团结”运动。上海工人阶级

和革命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了刘少奇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的种种阻挠、破坏活动和反攻倒算的阴谋以后，取得了“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

《早晨》就是肆意歪曲这场伟大革命的一部小说。《早晨》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出笼，是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之间。这时候，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已被粉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由于失败而更猖狂。特别是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配合美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以后，国内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刘少奇一伙的策动下，更是嚣张一时，妄图把他们的复辟欲望变为复辟行动。

在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用文学艺术来反映“五反”运动的伟大斗争，有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和方法：一种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着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努力塑造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鼓舞革命人民去同阶级敌人进行勇敢的战斗。另一种则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着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捏造资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以对抗工人阶级，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煽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起来“变天”，把他们的“黄昏”变为他们的“早晨”。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是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方法来创作《早晨》的呢？我们就拿《早晨》中的资本家徐义德这个形象来作回答吧！

资本家徐义德是贯串《早晨》全书的主人公，其他人物都是

作为他的陪衬而存在的。此人不仅是“五毒”俱全的反动资本家，而且是“人民解放军一渡过江”就在上海、香港、纽约设下“三道防线”，妄图同社会主义祖国顽抗到底的叛国分子。可是，周而复不仅把他描绘成为“养活”工人的“实业家”，而且是“象将军”一样威武、“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的“功臣”。作者的全部同情都倾注在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身上，用尽修正主义那一套腐朽的表现手法，美化他的丑恶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当席卷上海每个角落的伟大的“五反”运动向资产阶级进行冲击的时候，作者特意让徐义德在江边对着流水徘徊，长夜望着南天兴叹，通过几次“生离死别”式的家庭聚会，猖狂地向工人阶级、向社会主义发出反革命控诉。最后，又让他的假坦白、真反扑在全厂职工大会上“通过”，并用“水红色的月季花”和“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来赞美这个所谓“伟大的历史性变化”。

如果说，徐义德是周而复理想中的资产阶级“英雄”，那么，完全是为着说明徐义德“剥削有功”而存在的汤阿英，就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丧失了革命斗志的、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奴仆。作者硬要她把恶霸地主残酷迫害的深仇大恨忘个精光，对资本家敲骨吸髓的剥削却又感恩不尽。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城都没有激起她一点起码的阶级觉悟，却为死了一个“双眼皮”的宝贝儿子而痴疯癫癫。她的参加“斗争”徐义德，也仅仅因为徐义德和她宝贝儿子的流产有关。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统统都没有放在她的眼里。

为着按照徐义德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需要，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调和”起来，作者又编造了一个人物，这就是区委统战部部长、“五反”检查队队长杨健。名为“五反”队长，却不反资本家的“五毒”，进厂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着刘少奇的腔调，对资本家的“功绩”“给予足够的

评价”，“很体贴地”劝资本家为自己“好好打打算盘”，以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向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的指示；又根据刘少奇发明的“资本家老婆”“比两个副总理还厉害”的怪论，把资本家的心腹、小老婆、贪污分子等等统统收集拢来，组织起一支资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以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至于对工人阶级，杨健又换了一副嘴脸，他反对工人干社会主义革命，训斥工人批判、斗争反动资本家是什么“理亏”、“违法”。这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徐义德说：“这个人倒不错，我们工商界有什么事找到他，倒是肯帮忙的”。从反动资本家徐义德的赞扬声中，不是已经活画了他一副丑恶的工贼嘴脸了吗？杨健，就是小刘少奇！

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二年这样一个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极其激烈的重要时刻，《早晨》把徐义德这位资产阶级“将军”及其所率领的那一帮人物，召唤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大地上来，究竟想干什么？作者借“红色小开”即资产阶级政客马慕韩的嘴说出了这个目的：就是要让资产阶级达到“中国哪个朝代”都没有过的“显赫地位”，那就是要照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

但是，桑伟川却跳出来，说：不！你们说的完全不对，《早晨》说得完全都对，现在就应当按照《早晨》的那一套得出“统一认识”来！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重要阶段，无产阶级正在建立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时候。桑伟川的阶级敏感性比我们有些同志要强得多，他很能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在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所谓按照《早晨》来“统一认识”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

统统翻过去，把《早晨》里的反革命阶级路线、阶级关系、阶级专政统统搬过来，资本家一个个都象徐义德那样成为耀武扬威的“将军”，劳动人民又一个个都象汤阿英那样成为逆来顺受的奴仆！怪不得在翻案文章发表后，上海就有那么几个反动资本家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或以马慕韩自居，或以徐义德自况。这叫什么？这叫典型的“利令智昏”！

党的“九大”政治报告指出：“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对反革命分子是这样，对反革命的思想言论也是这样。

### 驳桑伟川为资产阶级翻案的三论

所谓写翻案文章是“落实政策”论。

政策是为路线服务的。既然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必然就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政策。无产阶级为着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就必须排除各种干扰，坚定地落实毛主席规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但是，桑伟川要落实的是什么政策？他肯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落实”是《早晨》的“主流”，那就说明他要落实的是《早晨》所鼓吹的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反动政策。这还等你今天出来叫喊吗？资产阶级已经叫喊了整整二十年。

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的这个基本纲领也就是它对资产阶级的总政策。在这个总政策的指导下，根据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和斗争形势，制定相互衔接的具体政策，以逐步实现总路线、总政策。在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使之成



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实行这样的政策不是为了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恰恰是为了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是总政策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我们在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同时，对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继续采取了“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使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由剥削者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便最后消灭资产阶级及其一切影响，实现无产阶级的总路线、总政策。

无产阶级的总路线、总政策和具体的工作路线、具体的政策，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长期和短期的关系，它们是辩证的统一。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就是把无产阶级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政策和它的总路线、总政策对立起来，进而又把具体政策歪曲成适合资产阶级的东西。《早晨》炮制者及其翻案者运用的正是这种反革命手法。资本家可以猖狂地破坏“五反”，群众要针锋相对斗争，那就是“左倾盲动”；资本家有严重“五毒”也只是“认识”问题，你要追查下去就是“违反政策”。就这样，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革命政策，被《早晨》歪曲成为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包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都正在进一步全面落实的时候，突然跑出来大叫要“落实”《早晨》中所提出的听任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策”，这就不仅想把“五反”的案翻过来，把社会主义改造的案翻过来，还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也翻过来，一句话，就是想把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案全部翻过来！——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所谓宣扬修正主义路线是“客观如实”论。

《早晨》是“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这种调子早已唱烂了！无论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还是文艺黑线头目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都曾拚命鼓吹过这种反动的“写真实”论，即所谓“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决不可能有什么脱离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而抽象地“客观如实”的反映。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才能深刻地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无产阶级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五反”运动，是我国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好得很。这就是对这个伟大运动的科学的“客观如实”的评价。但资产阶级站在它的反动立场上，却认为“五反”运动实在是一场大灾难，糟得很，还硬要说这才是“客观如实”的评价。持后一种观点的确实大有人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就是其中一个。但他不是明白地说出，而是通过曲曲折折的反革命手法，把这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完全颠倒过来，描写成为是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控制下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胜利。为《早晨》翻案的桑伟川却说，如果“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话”，“根本不会举行‘五反’”。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把所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滔天罪行都一笔勾销了，还谈什么“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呢！——不错，这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即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拍手叫好，为复辟资

本主义三呼万岁，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尽忠效劳！

其实，所谓“客观如实”论者，也明明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如实”，但他只承认资产阶级那家的“客观如实”，决不承认无产阶级这一家的“客观如实”。有谁胆敢运用无产阶级的观点说句话，他马上给你扣上一顶帽子，叫作既不“客观”也不“如实”。如果这种不问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不分表现哪条路线的反动“客观如实”论能够成立，那么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都将被说成是“香花”了。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都是“客观”存在，既然“如实”地写出是“艺术的最高原则”，那就怎么美化这些敌人都可以。象这样的要为一切毒草、一切牛鬼蛇神翻案的反革命理论，我们革命的人民难道还能容忍吗？桑伟川之流的所谓“客观如实”论，最近终于露出了马脚。他公然叫嚷：不但要“重新评价”已经被革命群众批臭的《上海的早晨》，而且要“重新评价”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反动影片《林家铺子》和《不夜城》。可见，这个新跳出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那些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的大毒草是何等的爱；他对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条汉子”的衣钵，可以说是原原本本“客观如实”地继承了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无产阶级发起了进攻。

所谓对毒草应“自由开‘放’”论。

多么熟悉的声音啊！仔细一查，原来反革命大党阀彭真早在《汇报提纲》中就作过这样的叫嚷。

“放”，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坚持“放”这个长期性的而不是暂时性的方针，就是表明要长期坚持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如果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和反动思想的批判对立起来，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

只许资产阶级自由进攻，不许无产阶级自由还击，那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你们不是主张放吗？编者按已经点明人家的文章是毒草，有谁还敢放？”

那么请问：在《文汇报》的编者按之前，工农兵群众大量的批判文章早就“点明”了《早晨》是株大毒草，为什么还有人甘愿冒着“被认为是毒草”的危险，抛出翻案文章，大叫要“参与战斗”，即向无产阶级进攻呢？既然明明是毒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报纸，理当明确表态，以动员革命群众锄此毒草。为什么这一“点”点得你如此不舒服呢？

我们历来主张“放”。禁止人民群众同谬论、同丑恶的东西见面，不组织革命的人们同反面的东西作斗争，识别并战胜它们，是不能够深刻地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只有经过同反动的思想进行斗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不搞革命的大批判，不重视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不锄新长出来的毒草，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因此，允许毒草出笼，就是为了要使它成为肥料。发出编者按影响了“放”这种议论的人，事实驳斥了他们的观点。令人担心的倒是这些同志自己，已经当上了毒草的义务保护员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哩！

“你们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这不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吗？”

不是我们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你在故意混淆视听，混淆思想批判和政治处理的区别。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来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

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上纲上线”吗？这种正确的“上纲上线”正是客观存在最科学的反映，非此不足以说明问题。“一棍子打死”吗？我们倒没有这个奢望。孔子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他的反动思想尚且阴魂不散哩，何况是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它的反动思想决不是一棍子、两棍子打得死的。有时看是死了，其实是装死，一有机会，即行反扑。因此，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千钧棒，不断地打，狠狠地打，打它几十年、几百年，直到确实打死为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既然出现了《早晨》这样的反革命毒草小说，必然会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文章。有批判，还会有反批判，又会有再批判，思想的仗，是永远不会“停火”的。这种批判、反批判、再批判，还将随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出现。正如同这一次资产阶级搬出来同我们纠缠的这一套谬论，不过是二十年来早已遭到多次批判的那些货色的改头换面一样，今后，它们还会作各式各样的乔装打扮，再度登台表演，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人，也会换的。这一回，资产阶级推举一位名叫桑伟川的，以后还会出现张伟川、李伟川。经过这么一段斗争，我们再来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感到多么亲切啊！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 砸烂资产阶级的“功德碑”

闻 为 革

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以下简称《早晨》),是大工贼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形象图解,是刘少奇及其走卒周而复之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自供状,是一座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的“功德碑”。

### 《早晨》出笼的前前后后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

大工贼刘少奇为了制造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物色了一批吹鼓手,周而复就是其中得意的一个。全国一解放,刘少奇的代理人就把周而复安插到上海,窃取了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要职。刘少奇的代理人一到上海就对其同伙说:“我这次把周而复和夏衍带来了。”带来干什么?他说:“中央的意思是要叫周而复写东西。”这个所谓“中央”就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写”什么“东西”呢?他们要周而复把上自大银行、纺织厂

的大老板，下到煤球店、药材店的小老板都写上书去。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头子之一夏衍叫嚣说：“上海这班资本家不给他们写上几本小说，就太对不起他们了”。周而复这个资产阶级的奴才就是抱着这种不要“对不起”资本家的心情，决心把上海的资本家“写上书去”，要让“子孙后代”看看，“不要忘记中国的这些历史”。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领受到其主子的旨意后，立刻活动起来，和大资本家称兄道弟，你来我往，打得火热。他甚至嚷着要到大资本家的公馆里去搭一个床铺住一个时候，进行他的所谓“创作体验”。刘少奇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一小撮叛徒、特务和走资派，对于周而复的这些活动极为赞赏，并且利用职权，为周而复炮制反动小说创造了一切方便条件。就这样，周而复在一九五二年躲进阴暗的角落开始炮制，于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先后完成了反动小说《早晨》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初稿。

毒草炮制成功后，什么时候放出笼？周而复一直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大工贼刘少奇叫嚣“中国资产阶级还要香一个时期”。周而复这个被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包庇过关的漏网右派，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在一九五八年五月抛出大毒草《早晨》的第一部。一九六二年又抛出第二部。刘少奇在出版界的代理人，把反动小说《早晨》当作“特急件”，火急万分地下令马上付印，在插图中把男的画成女的都来不及改，就急忙地抛了出来。

反动小说《早晨》出笼后，国内外阶级敌人马上出来捧场。刘少奇的同伙非常满意，要周而复把“下一部赶快写出来”，并急忙召集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和文艺界牛鬼蛇神进行座谈。上海的一些大资本家眉开眼笑，称赞说：“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面很广，气魄大，写得深入细致，是个了不起的工程，有这样的书出来，是件大事”。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把这部小说捧上了天，说什么它是“时代的记录”，是“巨幅史诗”，是“社会主义的编年史”，写得“明朗、流畅、干净、利落、痛快、严密”等等，不一而足。明明是文字干瘪，使人读起来头痛，却偏偏要说是“明朗、流畅”；明明是拖泥带水，是用历史的垃圾堆起来的，却偏偏要说是“干净、严密”；明明是资本主义的编年史，却偏偏要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编年史”，真是可恶之至！他们之所以搜肠刮肚，用尽一切美丽的词藻吹捧这部反动小说，就是要给这座资产阶级的“功德碑”涂上一层漂亮的色彩，以便达到他们欺骗群众，腐蚀群众，制造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的目的。

### 贩卖“剥削有功论”的黑货摊

反动小说《早晨》，分明是贩卖大工贼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的黑书。周而复这个善于招摇撞骗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却硬要给自己贴上一块假商标作为遮羞布，亲自为《早晨》写了一个“内容说明”，说什么：“这部长篇主要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和平改造的过程”。好一个“和平改造”，现在就让我们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拉出来，通过他的言行，对照他的反动小说，看看他极力鼓吹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全国胜利前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正确地规定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在谈到当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政策时，毛主席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



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大唱反调，立即抛出一个“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反动政治纲领，并到处奔走呼号，大肆贩卖“剥削有功论”，极力鼓吹要无限制地“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疯狂反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子一出动，奴才就紧跟。周而复这个刘少奇的忠实走卒，立即在上海倾销刘少奇的黑货。他的反动谬论很多，仅择三则示众：

其一曰：“我们不反对剥削，剥削得越多越好”，“因为他们（指资产阶级）有了利润，他们的工厂越办越多，使国家的财富也越来越多了，这样全国人民的经济也越来越好”。看啊！周而复象不象是资产阶级招摇撞骗的广告商。他极力要使人们相信，没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国家就不能富强，人民就过不了日子。这是地地道道的“剥削有功论”。周而复的胡言乱语，和他的主子刘少奇在天津贩卖的货色完全一模一样，充分表明了他们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工贼。怪不得，在《早晨》中一群吸血鬼被打扮成是救世主，“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成了不法资本家徐义德用来掩盖剥削的口头禅；而老吸血鬼潘信诚则被描绘成是“救国救民”的“功臣”。在周而复的黑笔下，仿佛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新中国，真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二曰：“要改变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农业经济，发展工业经济，是要依靠他们（资产阶级）的”，“工业经济达成了百分之七十，我们就可以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了”。周而复不愧是刘少奇的门徒。刘少奇说：“将来工业化了，工厂多了，出产的东西也就多了，那就要搞社会主义了”，周而复为之作了具体形象的注解。周而复在《早晨》这部反动小说中，就竭尽全力把

资产阶级这个已经是日薄西山的阶级打扮成为“生气勃勃”，“阳光洒满一地”，处在“青年时代”的阶级，把一群吸血鬼打扮成为“英雄”，真是不“依靠”资产阶级就不行哩！“红色小开”马慕韩狂叫：“向前看，我们的前途就更大了”，准确地表达了刘少奇、周而复之流的反动心理。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资产阶级“更远大”的“前途”——复辟资本主义。

其三曰：“我们要培养进步的资本家”，“资本家可否有缺点和错误呢？可以的，我们共产党员也有缺点或错误的”。周而复不但有其言，而且有其行。他在《早晨》中费尽心机地杜撰了几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其中特别呕心沥血地捏造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马慕韩，并通过马慕韩的口说出了一段“精采”的言词：“我认为不能说资产阶级就一定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如同无产阶级不一定有无产阶级思想，……哦，想起来了，是刘少奇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的。”真是不打自招。周而复的谬论也好，“红色资本家”马慕韩的胡言乱语也好，原来贩卖的都是大工贼刘少奇黑柜里的私货。如果照刘少奇、周而复之流的反动谬论类推下去，既然资产阶级不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而无产阶级又不一定有无产阶级思想，那岂不是说，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更高明，无产阶级就要让位给资产阶级上台执政了吗？这不是歇斯底里的反革命叫嚣又是什么？

够了！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反动小说《早晨》反映的根本不是什么“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过程”，而是一个贩卖大工贼刘少奇“剥削有功论”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黑货摊。

### 资产阶级“早晨”迷梦的破产

大工贼刘少奇及其黑爪牙周而复之流为什么这么卖力地兜

售“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贩卖“剥削有功论”，放肆地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自从混入上海以后，就没有一天不幻想“变天”。你看他，象资产阶级的看家狗一样狂吠：现在是“四大阶级的专政”！他在反动小说《早晨》里，百般地美化资产阶级，恶毒地污蔑工人阶级，就是为了推翻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一九六〇年前后，帝、修、反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蒋匪帮也妄想窜犯大陆。大内奸刘少奇及其包庇下的一小撮叛徒、特务与帝、修、反遥相呼应，大刮翻案妖风，全面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一时乌云翻滚，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周而复以为“变天”时机已到，于一九六二年急急忙忙赶写了《早晨》第三部。在《早晨》第三部里，他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放肆，他美化资产阶级更加露骨，丑化工人阶级更加恶毒。反动资本家徐义德不仅混过了“五反”这一关，而且一步一步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当上了长宁区政协常务委员。沪江纱厂在经济上不仅没有在税收、价格、劳动条件几个方面受到限制，反而是得到了发展，徐义德马上就要变成“办两个、三个”乃至“十六个厂”的“新型资本家”了。更为恶毒的是，周而复竟然以这些反动资本家举杯庆祝他们的胜利来结束反动小说《早晨》的第三部，仿佛中国已经“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去了，资产阶级“光辉灿烂的早晨”已经来到了，从此中国的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历史是无情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中国人民几十年来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所换来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岂容他们来窃取？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铁打江山，岂容他们来主宰？不能，

不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大海的怒涛，冲击着一切污泥浊水。周而复跟他的主子大叛徒刘少奇一道被揪了出来，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他们鼓吹的“剥削有功论”等等都成了其臭无比的东西，他们宣扬的资本主义的“早晨”和资产阶级的“锦绣前途”都完蛋了，而真正有前途、有力量的是无产阶级，真正光辉灿烂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今天，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正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任何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转的人，都将被碾得粉身碎骨！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

# 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 篡党复辟的黑碑

——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

安 学 江

《人民日报》编者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反动小说《风雷》，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一个罪证。

《风雷》这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在刘少奇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它披着“写农业合作化”的外衣，大刮反革命黑“风”，大打资本主义妖“雷”，穷凶极恶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肆无忌惮地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为刘少奇篡党复辟制造反革命的舆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我们要谢谢陈登科等人的劳作，谢谢这些反面教员，他们使革命的人民懂得：阶级敌人是如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是怎样耍两面派手法的；革命的人民为什么必须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大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应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

续有力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深入批判各种毒草，彻底肃清它们的流毒，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反动小说《风雷》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罪恶铁证。

一九六二年，在国内外阶级敌人掀起的恶风浊雨中，刘少奇亦膊上阵，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猖狂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然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放厥词，扬言要象赫鲁晓夫“修改”“斯大林写过的”联共党史一样，“修改”中国的革命历史，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并且特地指使他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之流：“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

反动小说《风雷》，就是遵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之命，由披着“工农作家”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精心炮制的颠倒“前三年的历史”、诋毁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一株大毒草。

《风雷》的初稿《寻父记》写成后，博得了周扬文艺黑线的干将邵荃麟以及李葆华们的一片喝采声。在叫好鼓噪之余，他们又担心《风雷》的反骨太露，特地向陈登科关照：“写得太露太实，不好”，要“加些合作化的情节”。陈登科领命照办，找人在书中加了一些“农业合作化”的词句。这样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这是描写农业合作化的一本书。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撇开书中时断时续的“合作化”情节，《风雷》便赤裸裸地现出了它的原形。这一点，陈登科自供不讳：“我写合作化，就是指责这三年。”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描写农业合作化是假，篡改“前三年的历史”是真。

现在，让我们剥去《风雷》的伪装，看一看这株大毒草所宣扬的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 刮的什么风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革命形势说成漆黑一团，大刮单干风、翻案风，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陈登科在《风雷》中刮起的黑风，打起的妖雷，正是刘少奇的这一套黑货。

在小说中，陈登科捏造了一个所谓“特殊落后”的黄泥乡，把总路线光辉照耀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污蔑得一塌糊涂。在这里，“粮食紧张，烧草困难，人口外流”，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闹粮风潮。在这里，“军心不振”，“唉声叹气”，“失去信心”。这完全是别有用心地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给三面红旗抹黑！

《风雷》通过对农业集体化的污蔑，大刮单干风。在陈登科的笔下，黄泥乡的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群众，都被灾荒压得“直不开腰”，“自私落后”，留恋单干，毫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要组织个副业生产组，得费九牛二虎的力气；刚刚搞起来，“三朝不到晚，就夭折了！”那些拚死拚活拉到一起的“农业互助组”，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散伙了，不干了”。

在周围已经开展起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下，黄泥乡仍然一直是“空白点”。老贫农说：“俺庄上的人……你要叫他组织起来……在一起劳动，那就难了。”作为青年积极分子的陆素云竟然

大言不惭地叫喊：“一人领三个孩子，过得比谁都强！”这不是在向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示威吗？

在陈登科的笔下，何老九、陆素云、万春芳等“贫下中农”，对乡里的领导者大搞复辟资本主义活动，迟迟不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根本无动于衷，从来没有抵制，倒是极为欣赏地说：“做个老百姓，一能不受地主富农欺压，二能不受地主富农剥削，三能有个太太平平安定日子过，就是天堂的生活了。”这分明是在宣扬个体经济的“天堂生活”！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风雷》仍然大刮单干风，显然是在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三自一包”、“责任田”招魂！

《风雷》还不断煽动“出气”，大刮翻案风。祝永康经常以“青天大人”的面目出现，打着访贫问苦的幌子，鬼鬼祟祟，煽动人们诉共产党之“苦”，出新社会之“气”。许多人赞扬祝永康，“这一来，把俺肚子里好几年的闷气，一家伙都出完了”，甚至连“解放以来”“还没有翻过身来”这样露骨反动的話都冒了出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之流，在一九六二年前后，鼓动牛鬼蛇神攻击三面红旗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正是在“出气”的名义下进行的吗！什么是“出气”？就是反革命翻天！书中端出来的污蔑广大贫下中农解放后“只翻半个身”或“根本没翻身”的黑话，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李葆华们黑话的原版。

“祝青天”在他的神秘活动中，发现了一起所谓“冤案”。

书中描写的任为群，是个“任劳任怨为群众”的民兵大队长，“不可多得的好干部”。可是，仅仅因为他捆打了反动富农黄龙飞，就被罢了官，缴了枪；仅仅因为他查获了黄龙飞的走私粮食，就险些被开除党籍。很明显，这是个受到所谓“过火斗争”迫害的典型。由于祝永康的出现，任为群那一伙的怨气便



冲天而出，大肆叫嚣“撤任为群的职就是不该”，“对不平的事，俺就是要讲”；任为群“被人赶下了台”，“俺们还咋能好得起来”！为了替任为群平反，祝永康亲自主持“出气”“平反”会，在他的鼓动和支持下，任为群嚣张到了极点，大叫“我的心是红的”，明目张胆地诬蔑我们党错打了“好人”。

《风雷》为什么要大写特写“过火斗争”？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必须为任为群翻案？这个阴谋必须揭穿！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攻击我们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安徽大组会上，他还别有用心地把干部分成“打人的和挨打的”两类，一笔抹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陈登科笔下的任为群，正是为了宣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诽谤党内斗争是“过火斗争”而炮制出来的一个“挨打”的典型。“任劳任怨为群众”而“挨打”，这岂不是“将我罢官理不公”吗！这是在为什么人鸣冤叫屈，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风雷》正是从属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它所刮起的黑风，就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的。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是从舆论上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的篡党复辟活动动员力量；翻案风，从组织上、政治上为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单干风，从经济上动摇瓦解社会主义，完成复辟资本主义的任务。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掀起的这几股黑风，彼此配合，互相呼应，其目的就是为了篡党复辟，改变中国的颜色。

## 走的什么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

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风雷》一开篇，便描写了主人公祝永康在淮北平原顶着风雪走路，直到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还是在描写他顶着“逆风”走路。祝永康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中间，走的到底是哪一条路呢？

祝永康到黄泥乡不久，就发现了那里落后的根源，是由于朱锡坤放弃农业生产，组织人下湖打兔子，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要“改变”这种局面，于是找到了一个窍门，就是大搞编芦席的副业生产。书中描写，正是因为祝永康组织了大批的编席互助组，编了大批的芦席，赚了钱，救了灾，才带动了黄泥乡走上“组织起来”的道路。这里可以看出，编席赚钱，是全书作为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而加以宣扬的。书中的主要人物都围着这个问题团团转。

祝永康的“道路”究竟是什么道路？揭开这批“互助组”的画皮，便不难看出它的本质。

这批“互助组”组织起来的目的是，根本不是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为着做“一笔本薄利厚的交易”，使“手头活泛活泛”。

这批编席组的经营方式，是“自负盈亏”，“各编各的”，“编的多，多赚钱”。为了鼓吹这种经营方式，书中专门安排了祝永康的一大段演说词，又是讲技术，又是讲分账，又是讲“各归各”。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合伙搞单干！陈登科捧出这样的货色冒充“社会主义”，恰好暴露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原来，祝永康组织编芦席和朱锡坤组织人打兔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走的一条路：资本主义道路。经过祝永康“改

造”了一番的黄泥乡，资本主义的浊流不是减少了，而是泛滥了，不是隐蔽了，而是公开“合法”化了。

祝永康搞这样的“集体化”，依靠的是些什么人呢？他用秘密活动、私察暗访的方式收罗了一批心腹，掌握了黄泥乡的领导权。这些人，有的是被罢了官、缴了枪的“翻案好汉”，有的是思想落后，迷恋单干的“巾幗英雄”，有的是爱情至上，多愁善感的恋爱迷；还有吃吃喝喝、吹吹捧捧的江湖弟兄。由这些人组成所谓的“领导核心”去搞社会主义，不是活见鬼吗！

为了标榜祝永康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风雷》中喋喋不休地宣扬，早在一九五四年，祝永康就在黄泥乡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明显，这是《风雷》在炮制过程中，随着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形“左”实右黑货的出笼，而做的精心安排。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按照《风雷》的描写，“运动”面临的情况极其复杂，“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纠结在一起”，即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所胡说的“党内外矛盾交叉”。“运动”的方法是“扎根串连”，“访贫问苦”。“运动”的斗争对象是农村中的“破鞋”和懒汉，而对阶级敌人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则千方百计包庇过关。显然，这个“运动”所推行的是一整套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中必须充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祝永康搞的这场“运动”处处都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黄泥乡进行的这场“运动”，是地地道道的假四清，真复辟。

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尖锐地指出：“联系到一

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反动小说《风雷》中祝永康这个人物所作的种种表演，正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从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到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这条黑线的图解。

这一切，充分说明了祝永康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 寻的什么“父”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恶狠狠地叫嚷：我国三年困难，是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污蔑三年经济困难是由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造成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反动小说《风雷》完全体现了刘少奇的恶毒用心，把所有的党组织都丑化得一塌糊涂，不是由外向里坏的“堡垒”，就是由里向外霉的“花生仁子”。党的领导干部，不是蜕化变质分子，就是阶级异己分子；不是两面派、伪君子，就是“老事务”、糊涂虫。总之，就如同初稿《寻父记》中方艳艳唱《女起解》所暗示的：“洪洞县里无好人！”

《风雷》对我们党的攻击，特别恶毒地表现在对县委书记方旭东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方旭东，是“黄泥乡”这个“困苦凄凉”世界的最高领导者。陈登科把他所捏造的一切灾祸的根源，都归结到方旭东身上。说他“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蹲在“森严”的“衙门”里，忘记了曾经用生命和鲜血救助过自己的人民；说他“主观臆断”，“把矛头对着自己的同志”，残害了任为群那样的“忠良”，包庇、重用了熊彬、朱锡坤那样的权奸。还借贫农何老九之口，大骂方旭东：“你主观！”“你忘本！”“黄泥乡搞成这样，难道你没有责任？”

骂，陈登科还觉得不足以发泄他对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仇恨，在第五十一章中，又特地设计了方旭东“翻车”的场面，描写方旭东把社会主义的“大马车”陷入了淤塘，方旭东自己也弄成了“满脸黑”，“好似被人敲了一棒，昏昏沉沉地将头低下……”。这是反动透顶的政治黑话！陈登科做贼心虚，在《风雷》的第二次印刷本中，偷偷摸摸地把“好似被人敲了一棒”这段话删掉了，这样一删，不是更加暴露了他们一伙的反革命马脚吗！反革命分子田汉在大毒草《谢瑶环》中曾经叫嚣：“载舟之水也覆舟”，陈登科在这里也来了一个车陷淤塘，人仰马翻的描写。一个要“覆舟”，一个要“翻车”，在刘少奇及其大小娄罗们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之“舟”快要“覆”了，社会主义的“马车”就要“翻”了，他们篡党复辟的日子就快到了。这批反动家伙的黄粱梦真是做得美极了！

果然，陈登科在《风雷》中经过精心设计捧出了一个“高大”的形象，这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理想“英雄”——区委第二书记祝永康。

祝永康是在“灾荒压顶”，“军心不振、士气涣散”，“粮食紧张”的所谓关键时刻，带着大批“救命”的粮食，从天而降，飘飘飞来的。祝永康的出场，使“阴霾满天”的黄泥乡马上出现了“积雪融化”、“河水解冻，大地回春”的场面，而且在他那“春雷一般轰鸣”的吼声之后，一场闹粮风潮，便立即烟消云散了。《风雷》中的祝永康俨然是一个力能回天的“救世主”！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再大的灾荒也能战胜，再大的困难也动摇不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陈登科之所以要烘托祝永康这个人物出场，目的就是要丑化人民群众，吹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我们伟大的党。

为了强化祝永康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回春”之力，陈登科从头到尾为祝永康安排了一条“寻父”的线索。《风雷》的前身就叫《寻父记》。人们不能不奇怪，为什么一定要在祝永康这个“共产党员”身上，安上封建的报恩情节呢？陈登科曾经自供过：“寻父不是一个生活命题，而是一个政治命题。寻父就是寻找党的真理。”“寻父”，一语泄露了天机，正是揭穿这部小说反动主题的关键。

什么“寻找党的真理”！在反革命分子陈登科们看来，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真理”了，这也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疯狂叫嚣的“党的传统遭到了破坏”、“党的威信丧失了”、“官越大，真理越少”这种反动谬论的翻版。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党的真理。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拼命叫嚷要寻找什么“党的真理”，他们究竟要寻找哪家的“真理”呢？

且看《风雷》的表白：祝永康走马上任的全部思想动力，是决心沿着“党中央领导人”在淮北这块土地上“留下”的“很深”的“足印”继续前进。

那个在淮北“足印很深”的人指的究竟是谁呢？查查历史，明白了：这个“足印很深”的人，就是曾经为了逃避抗日斗争而躲在这里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刘少奇，不仅抗日战争时期有在这里当逃兵的“足印”，而且解放后还来淮北转过三次，留下了篡党复辟的“足印”。其中很“深”的一次，就是到濉溪县卧龙公社的卧龙湖。他在这里满口谬论，胡说八道，公然亮出自己的黑货，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相抗衡，破坏了淮北的水系，给淮北人民带来灾难。书中写祝永康在“视察”卧龙湖时与任为群所商订的“治湖”计划，同中

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指示”的精神是一路货。这不是在追寻刘少奇的“足印”又是什么？！那个祝永康怀恋的是什么人，寻找的是什么“父”，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把《风雷》的反动主题揭到底，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伙反动分子看来，我们伟大的党已经“陷车”了；只有按照刘少奇的“足印”走下去才能“回天”，所以他们要“寻父”。“父”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他就是资产阶级“真理”的化身，就是那一伙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父”，“寻父”就是寻找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要刘少奇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寻父记》——《风雷》的要害所在，也是《风雷》包藏的全部祸心。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叫嚷要立的“碑”，就是这样一块篡党复辟的黑碑！

我们一定要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粉碎《风雷》刮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摧毁《风雷》宣扬的资本主义道路，打倒他们左寻右找的“父”——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彻底砸烂他们妄想“传给后代”的黑碑！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我们对反动小说《风雷》的批判，正是这种斗争的继续。《风雷》中寻的“父”，就是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利益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风雷》的炮制者，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卵翼下的一伙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我們同他们斗争的实质。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夺取更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坚决把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



## 《风雷》的出笼和刘少奇的罪恶“足印”

《拂晓报》编辑部批判《风雷》小组

宿县专区革命大批判组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一九六二年前后，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紧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浊浪，利用文艺大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篡党复辟的黑碑——反动小说《风雷》，就是在一片反革命的鼓噪声中“破门而出”的。反革命分子陈登科把反动小说《风雷》的背景选择在淮北农村，是有其险恶用心的，必须加以戳穿。

### 一串罪恶的“足印”

反革命分子陈登科在反动小说《风雷》中煞费苦心地捏造了一个“英雄”祝永康，说他是踏着“党中央领导人”在淮北留下的“足印”走的，是在“党中央领导人”的“路线”指导下活动的。人们不禁要问，《风雷》中的所谓“党中央领导人”究竟是谁？究竟留下的是什么“足印”？翻开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谓的“党中央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无耻到极点的老牌反革命、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个“路线”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串“足印”就是刘少奇篡党复辟的罪恶“足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老反革命刘少奇就对抗伟大领袖

毛主席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伟大号召，钻到淮北一带大肆推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留下了他罪恶的“足印”。一九四二年，他在苏北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日寇的进攻面前，弃下军队独自逃跑到安徽，在卧龙湖边留下了他可耻的逃兵“足印”。

一九五八年，这个一心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棍又以“视察卧龙湖河网化”为名，窜到淮北，继续贩卖他的黑货。他和宿县地区的走资派勾结在一起，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大刮“三自一包”的黑风，鼓吹“技术挂帅”、“分工分益”，大肆散布农业管理“专业化”，破坏农业集体化道路。在治水方面，他大发“以蓄为主”的黑指示，与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在农业生产上，他胡说什么“密植是增产的关键”，反对毛主席关于种植不可过密，不可过稀的指示，造成了粮食的减产。在“视察”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极度不满，指使其代理人“要注意搜集存在的问题，记县志。”更恶毒的是，他在谈话中还别有用心地拉出“陈胜、吴广在宿县大泽乡起义”的历史，煽动牛鬼蛇神造无产阶级的反。

不久，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牛头马面”，也打着视察的幌子，先后多次溜到淮北，伙同宿县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大造反革命舆论，积极推销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责任田”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治水路线，严重地破坏集体经济，破坏了淮的水系，给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一九六二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指示纠正和批判“责任田”。但是，刘少奇的走卒们却偷偷摸摸跑来宿县地区和宿县地区党内走资派串通一气，搞什么“责任田”的“调查报告”，疯狂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妄图继续为“责任田”招魂。

总之，以大叛徒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多年来在淮北转来转去，大放其毒，甚至自吹自擂，篡改历史，犯下了滔天罪行，留下了一串串篡党复辟的罪恶“足印”。

自称在反右派斗争后“埋着头过了几年日子”的反革命分子陈登科，对刘少奇一伙的旨意心领神会，紧踏着其黑主子们的“足印”，窜到宿县地区学着其黑主子们的腔调，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乱七八糟”、“不象话”，诬蔑农民“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胡说“江淮地区的天下”是他的黑主子刘少奇“打下来的”，活画出一副反革命奴才的丑恶嘴脸。为了给其黑主子篡党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邪火，按照其黑主子“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的黑指示，日夜兼程赶制出一部四十五万言的大毒草《寻父记》，即《风雷》初稿。

现在，让我们把反动小说《风雷》里所贩卖的黑货和大叛徒刘少奇一伙在淮北的罪恶活动对照一下，看反革命分子陈登科是如何“踏着”其黑主子们的“足印”爬的吧！

反动小说《风雷》打着写农业合作化的幌子，写编席组以“自负盈亏”、“编得多、赚得多”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宣扬“利润挂帅”，“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这正是刘少奇“三自一包”的产物，正是“责任田”的所谓“十大优越性”的翻版。陈登科在书中特地写了老贫民何老九为了组织合作社到处碰钉子，大任庄的第一个互助组眼看要垮台，小吕庄的互助组“散伙了”，其他几个庄连互助组也没有等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妄图以此证实刘少奇“现在搞农业合作化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办早了”、“冒进了”的反革命谬论。书中把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描写得漆黑一团，乌烟瘴气，正是按照其黑主子要搜集农村“阴暗面”、“写县志”的黑指示炮制出来的黑货。书中祝永康和任为群“治理九湖的计划”，正和刘少奇“以蓄为

主”的黑指示同出一辙。陈登科还在书中拚命为牛鬼蛇神撑腰打气，鼓动他们“车、马、炮一齐出动”，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正是刘少奇利用“陈胜、吴广起义”暗示反革命暴乱，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写照。够了！《风雷》中所贩卖的黑货，完全是刘少奇一伙在淮北所散布的反革命黑话的记录，也是他们阴谋篡党复辟的种种罪恶活动的罪证。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反动小说《风雷》，完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在国际上紧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反共大合唱，在国内忠实地贩卖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积极为刘少奇篡党复辟鸣锣开道，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这一切，正好说明反革命分子陈登科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忠实、最勤快的鹰犬，他所追随的“足印”，就是刘少奇一伙阴谋篡党复辟的罪恶“足印”。

### 淮北革命历史绝不容颠倒

黑《风雷》为了替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篡党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不惜采用极其卑劣的手法，恶毒诬蔑淮北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淮北劳动人民，故意颠倒淮北革命斗争的历史，真是混蛋透顶！

淮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广大劳动人民，决不容歪曲和诬蔑！

早在一九五一年，淮北人民就热烈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一九五三年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时刘少奇却大砍合作社，企图阻止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在这种情况下，淮北人民还自动办

起数以千计的“自发社”，以实际行动抵制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三年困难时期，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英雄的淮北人民，始终高举三面红旗，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终于战胜了困难，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而反革命分子陈登科，却睁着眼睛说瞎话，竟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诬蔑为“特殊落后”，攻击贫下中农“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拚命往贫下中农脸上抹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陈登科恶毒攻击革命人民，恰恰暴露了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派。

淮北革命斗争的历史绝不容颠倒！

抗日战争时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淮北人民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毛主席对淮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作了英明的指示，给予极大的关怀。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给《拂晓报》作了“坚持游击战争”的光辉题词，给淮北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提出了抗战的纲领，引导淮北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叛徒刘少奇却跑来淮北当逃兵，到处散布活命哲学，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这个老反革命却把自己吹捧为“坚持淮北抗战”的“英雄”，甚至连“江淮地区的天下”也是他这个逃兵“打下来的”。这正和他自命为安源煤矿工人运动“领袖”而实为安源煤矿的工贼一样的无耻至极！

震惊世界的淮海战役，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接领导和亲自部署下进行的。淮海战役前夕，毛主席就为战役制定了作战方针，对战役的三个阶段作了具体的分析和部署。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同时对彻

底摧毁蒋家王朝，夺取全国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刘少奇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复辟的目的，却利用各种机会，篡改历史，贪天之功，把毛主席的巨大功勋窃为己有，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解放后，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淮河，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淮北人民在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的鼓舞下，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治水路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治理淮河根除淮北水患方面，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绩。又是毛主席领导淮北人民走上合作化、公社化的康庄大道，在前进的道路上，击退了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责任田”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粉碎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淮北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淮北的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淮北人民的大救星，永远是淮北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是淮北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论他们如何为自己粉饰，但是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在广大革命群众面前，都会暴露无遗，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淮北人民，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及其黑《风雷》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肃清其一切流毒！

（原载《新安徽报》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 射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毒箭

——从《风雷》中任为群形象的塑造看陈登科的反革命策略

安徽工农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评论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反革命分子陈登科为了替大叛徒刘少奇篡党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在黑《风雷》中精心捏造了一个任为群被“平白”罢官的“冤案”。并在这个假“冤案”上设置了层层伪装，喋喋不休地大作文章：（一）任为群仅仅是因为捆打反动富农黄龙飞而被“罢”了官，缴了枪；又因查获了黄龙飞套购国家粮食，而险些被开除党籍。这就是说，任为群是因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挨打”的。（二）任为群是一个“一不利己，二不徇私”，“任劳任怨”，“为劳苦人民奔波”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好干部”。（三）任为群是一个虽受打击但决不气馁，虽被“罢官”但仍然有“不可动摇的革命意志”的硬骨头，他即便“骨头烧成灰，也是红的”，等等，等等。而为《风雷》翻案的林××，也对陈登科捏造的这起“冤案”大为赞赏。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难道会有一个“好干部”因为“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反而要受无产阶级专政惩罚这样的怪事吗？显然，这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大骗局！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只要剥掉任为群身上一件件堂皇的外衣，就会显出原形。他原来和祝永康一样，是大叛徒刘少奇麾下的一名小伙计。在任为群这一形象身上，寄托了陈登科为反动的政治要求，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

## (一)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任为群“任劳任怨”地执行着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他在干些什么？

早在变色龙祝永康踏着刘少奇的罪恶“足印”来到黄泥乡之前，任为群就在罢官后整整三个多月时间里，不分昼夜地在卧龙湖里“找魂”。他以这样的疯狂热情，究竟找的是什么样的“魂”呢？原来在一九五八年，大叛徒刘少奇怀着反党的野心窜到了淮北的卧龙湖，在这里他满口喷粪，抛出了一条“只蓄不排”、“边界圈圩”，“以邻为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治水路线。任为群左寻右找的“魂”，就是这样一条被淮北人民斥之为“只准喝水，不准撒尿”的刘贼治水路线。他根据刘贼的这条治水路线，炮制出一个治理九湖的“蓝图”。在这个“蓝图”上，“这头是闸，这头也是个闸”，“马鞍形的记号，红颜色是桥梁，绿颜色是闸坝，黄颜色是涵洞”。任为群治理九湖的所谓“蓝图”，实际上就是刘贼反动治水路线的图解。刘贼的这条反动治水路线，包藏着他对抗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破坏团结治水，破坏淮北水系的反革命祸心。这个所谓“任劳任怨”的任为群，却正是刘贼反动治水路线的卖力鼓吹者。

在和祝永康的关系中，我们会进一步认识任为群的真面目。祝永康是一个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就在祝永康的眼睛里，任为群是一个“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优秀骨干分子，不可多得的好干部”。而任为群心目中的祝永康则是“头一回遇到”的“良师益友”，“祝永康的心里不知有多少革命道理，简直象大海一样”，他不肯“放过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从此以后，“永康走到哪里，为群跟到哪里”。祝永康大刮“黑暗风”，任为群与之一唱一和，攻击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现实；祝永康大刮“翻案风”，任为群更是赤膊上阵，污蔑我们党“错打了好人”，叫嚷要把罢官后“满肚子滚锅似的怨气”，一下子出得净光；祝永康大刮“单干风”，大搞以赚钱为目的的“编席组”，任为群对这套假社会主义货色更是心领神会，到处奔走呼号，并在任大庄迫不及待地搞了一个假社会主义的“互助组”，充当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祝永康卖力推行刘贼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任为群也是赞赏备至，帮助祝永康“扎根串连”，建立一个反革命的根据地。任为群贩卖刘贼反动的治水路线，祝永康不遗余力地赞助；祝永康篡夺了区委书记职位后，立即把黄泥乡总支书记的宝座送给了任为群。他俩就是这样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事实证明，任为群和祝永康是连在刘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黑藤上的两个黑瓜，都是披着革命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

毛主席深刻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陈登科对任为群这样一个大叛徒刘少奇的忠实走卒如此“钟爱”，并通过祝永康为他大翻其案，其罪恶用心就是要为大叛徒刘少奇卵翼下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翻案。陈登科通过任为群之口鸣冤叫屈，胡说什么“党平白无故打自己的孩子”等等，这就是对党内路线斗争的恶毒攻击和诋毁。在炮制《风雷》过程中，陈登科阴险地施展了“要把中央的问题放到基层去写”的反革命策略。而捏造任为群这起“冤案”，则是这个反革命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射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毒箭。

## (二)

反革命分子陈登科不厌其烦地给任为群披上层层伪装，从中大作文章，除了替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

义路线翻案外，还有着更加险恶的用心。

一、通过任为群的翻案活动，煽动牛鬼蛇神出笼，以“出气”为名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猖狂进攻。

《风雷》开始炮制是在一九六二年。就在这一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以为他们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公然跳出来为反党野心家彭德怀翻案，攻击我们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掀起了一股翻案的浊浪。陈登科为了紧密配合其黑主子的翻案妖风，就在《风雷》中捏造了任为群被“平白罢官”的“冤案”，并通过这起所谓冤案凶相毕露地提出：任为群被罢官是“一项带有原则性的政治事件”，是“工作路线有毛病”，和刘少奇诋毁党内路线斗争的叫嚣相呼应。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陈登科把任为群这个修正主义分子打扮成一个“任劳任怨的好干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给他披上一件件美丽的外衣，戴上一顶顶巍峨的桂冠。陈登科的这些精心的“描述”，在向人们暗示：将这样一个“好官”打下去就是“理不公”！陈登科这股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满腹“怨气”，终于通过他笔下的“积极分子”的嘴冒了出来：“撤为群的职，就是不该”，“对不平的事，俺就是要讲”，“路不平，有人踩”，“为群被人赶下了台”，“俺们还咋能好得起来”！这一阵阵叫嚣，和三家村黑干将们以及田汉、孟超之流为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切齿咒骂无产阶级的声音，又有什么两样？这里，反革命分子陈登科通过任为群的翻案活动，在肆无忌惮地呼唤一小撮牛鬼蛇神出笼，要他们“吐出肚中的满腹怨气”，向无产阶级进行猖狂进攻。

二、竭力鼓吹任为群的反党“傲骨精神”，为牛鬼蛇神打气，鼓动他们负隅顽抗。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

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和人民顽抗到底，他们总是竭力鼓吹反动的“傲骨精神”，作为他们反革命的精神支柱。在《风雷》中，陈登科通过任为群对这种反革命“傲骨精神”作了放肆的鼓吹，他让任为群于众表白：“我的心是红的，骨头烧成灰也是红的”，“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受到什么处分，革命的意志决不能动摇”等等。不言而喻，任为群的“意志”，就是跟着刘贼干到底的反革命意志。

陈登科如此卖力地鼓吹任为群的这副反党“傲骨”，这完全是为了适应他黑主子的政治需要。刘贼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居心险恶地要人“勇敢”地为“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并说什么“如果受到打击，就辞职不干嘛，等路线正确了，再出来当书记”。刘贼所说的“路线正确”之时，就是他们反革命复辟得逞之日；刘贼所说的“再出来当书记”，就是要一小撮阶级敌人坚守阵地，负隅顽抗，失败了再干，妄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陈登科对刘贼的这番“苦心”，心心相印，于是他在《风雷》中编造了一个“受到打击但不气馁”，“失败了再干”的任为群这一反动形象，和刘贼此唱彼和，为一小撮阶级敌人撑腰打气。对任为群形象的塑造，再一次暴露了陈登科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狼子野心。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陈登科不仅把祝永康写成了“胜利”的英雄、同时也让“平白无过受打击”的任为群，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黄泥乡总支书记的宝座。吴晗之流要“海瑞”们“再居官重整纪纲”的反革命迷梦，在陈登科的笔下，却一一成了事实。但是画饼焉能充饥？！在现实生活中，陈登科之流的复辟梦想，却被革命人民胜利前进的雄伟步伐碾得粉碎！

三、陈登科通过任为群手中的一杆枪，向一小撮牛鬼蛇神

暗示：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重视枪杆子的作用。

反动阶级为了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对枪杆子的作用也极为重视。陈登科对于干反革命勾当是颇为能干的。在《风雷》中，他不仅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祝永康抓了印把子，而且让祝永康亲自交给任为群一杆枪，又让他抓了枪杆子。陈登科着力烘托和渲染了任为群对这杆枪的所谓“休戚与共”的关系。任为群被“罢”了官缴了枪，他就“焦虑”得“睡不着觉”，当他重新抓住了这杆枪以后，“心情愉快”，终于能够又“安静舒服”地“一觉睡到大天明亮”了。任为群紧紧抓住这杆枪不放，他睡熟了还“抱着枪”，“好似久别重逢的孩子一般，双手抱着，紧紧地搂在怀里，贴在胸上”。那么，任为群为什么抓住枪杆子不放呢？他自己有一段绝妙的招供。他举起手中的枪在半空晃晃道：你放心，这个家伙抓在我们手里，“天下是我们的”。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陈登科通过任为群之口，在向无产阶级示威，在暗示一小撮牛鬼蛇神：有了枪，就能夺取“天下”，就能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陈登科通过任为群这个反动形象的塑造，包藏着阴谋篡军篡政的祸心，这不是洞若观火了吗？

剥开任为群身上的画皮，我们就清楚地看到：陈登科通过任为群这个反动形象的塑造，来为大大小小的反党野心家塑象，为被打翻在地的地、富、反、坏、右塑象。在任为群身上，寄寓了陈登科之流极为阴险、反动的政治要求。陈登科所以要在《风雷》中为任为群大翻共案，林××所以要对这个亡灵大唱挽歌，原因就在这里。

### (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这里，我们要谢谢陈登科之流，他们的反

革命活动，从反面提醒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内，一小撮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一有机会就起来翻案，猖狂向革命人民反扑。而利用文艺作品来为一小撮阶级敌人塑象，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又是他们惯用的一种反革命策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这种右倾翻案和反右倾翻案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的一个表现。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对于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原载《新安徽报》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

## 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

——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及其“来龙去脉”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五年前，围绕着对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的评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当时就看出《一代风流》是腐蚀群众特别是腐蚀青少年的大毒草，奋起口诛笔伐；刘少奇一伙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则慌忙跳出来压制和围攻。文艺黑线头目周扬亲自出马抚慰欧阳山：“你吃了亏”。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公开扬言要做欧阳山的靠山：“有我陶铸在，欧阳山就不会倒。”欧阳山在这些黑后台的支撑下，狂妄地叫喊：他“第二世也不服”。

请同志们注意：在这里，欧阳山宣布了他所代表的阶级——资产阶级，还要同无产阶级作长时期的、几“世”的较量。可见，在文艺界，在全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远没有结束。刘少奇一伙看中《一代风流》是有原因的。《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一代风流》就是“专写错误路线”的反动作品。对这样一个作品进行再批判，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

余毒。

毛主席指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现在，就让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来解剖一下《一代风流》及欧阳山的其他作品，看看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究竟是为哪条路线服务的。

### （一）

欧阳山在谈《一代风流》的创作时自我标榜道：到了解放区经过整风以后，“我对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想到写一部小说反映这个问题。”

要说明“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光辉著作，彻底批判了以陈独秀和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为我党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以后，毛主席的这条正确路线又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刘少奇等的机会主义路线，不断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可是，《一代风流》是根据什么路线来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呢？

贯串《一代风流》的主线，是共处于一条小巷之中的三个家庭：买办资产阶级的陈家，官僚地主阶级的何家，工人阶级的周家。以这三个家庭为中心，联系到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不同的人物，意图构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都市社会的一个缩影。遵照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按照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历史或现状，在这条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的

小巷中，将会出现多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啊！但欧阳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你看，在他的笔下，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早已被温情脉脉的邻里、亲戚、爱情的关系所淹没，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斗争，也已为端午、乞巧、中秋赏月、春日郊游等等所谓“优美的南方风俗画面”所代替。这样的“蓬莱仙境”，根本不可能在存在着阶级对立的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里找到，它只能存在于作者的主观臆想之中。作者臆造出这条“三家巷”来歪曲现实的阶级关系，完全是为了美化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的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阶级投降的反动路线的需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抗。

在《三家巷》中，欧阳山精心编造了买办资产阶级陈家小姐和“共产党员”周榕，用恶意的口吻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反动情节。一个高声狂叫：“一个社会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能划成四分五裂”；一个随声附和：阶级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大约是时隐时现的东西”。真是“说不清楚”吗？不。《一代风流》中为地主资产阶级及反映他们利益的错误路线大肆吹捧、树碑立传，这一黑线是十分露骨的、十分“清楚”的、贯串全书而决不是“时隐时现”的。

《一代风流》的第一卷——《三家巷》反映的，正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后的那一个历史时期。这是革命与反革命进行生死搏斗的时期，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极其激烈的时期。对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



革命的胜利。”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使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根据这个科学的分析，反映这一阶段历史的革命文艺作品，理应象江青同志率领革命文艺工作者所创造的革命样板戏那样，塑造和歌颂革命的暴风雨中工农兵的革命英雄形象，典型地概括社会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真实地反映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显示中国革命只有坚决遵循毛主席所指引的航向，才能战胜敌人、取得胜利。欧阳山却完全相反。在《三家巷》里，他通过书中周家兄弟的一段谈话，来表现他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革命前途的看法。“共产党员”周榕满腹牢骚地说：“为什么我们对国民党那样好，他们对我们总是那样坏！我们吃小份儿，他们吃大份儿。”另一个“共产党员”周金先是暴跳如雷：“欺骗！上当！耻辱！人家坐轿子，我们抬轿子。人家是东家，我们是扛活儿。”接着又灰心丧气：“什么国民革命，我看是没有指望的了。”这时，周榕对国民党的“满腹牢骚”忽又变作“满腹希望”：“咱们还有大敌当前，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蒋介石难道看不见？就说国民党，他们还有汪精卫呀，还有那个左派呀。咱们还是忍耐着瞧吧！”

看，这就是欧阳山笔下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心目中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竟然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倒是国民党领导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这一场革命中只是一名“吃小份儿”的，“抬轿子”的，“扛活儿”的！这不是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阶级关系完全颠倒了吗？这不是拱手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让给人民公敌蒋介

石了吗？这些“共产党员”对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革命前途，一会儿消极悲观，认为革命是“没有指望的了”；一会儿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和汪精卫身上，认为我们只能“忍耐着瞧”，向国民党蒋介石屈膝投降。这是什么人的观点？这是陈独秀的观点，即彻头彻尾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

《一代风流》的第二卷——《苦斗》反映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广东地区的农村斗争。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总结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向。但是，欧阳山根本不去表现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通过在农村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却通过“十大寇”和一些游魂似地飘来荡去的“共产党员”，放肆地鼓吹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调调。这些人先是盲动主义，念念不忘“攻打仙汾市”、“打进广州城”，说什么“只有占领了广州，夺取了政权，全省的工人、农民才能得救。其他一切都是没有用处的！”鼓吹“胜利，它总是突然而来的。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后是悲观主义，呼天抢地地绝望叫喊：“失败了，失败了，一切都失败了！”自称参加了延安整风“明确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欧阳山，难道不知道毛主席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吗？难道不知道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部伟大著作中提出的“肃清盲动主义”“肃清流寇主义”“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教导吗？当然不是。他是在故意歪曲党的历史，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为错误路线翻案。他企图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不是很清楚了吗？

## (二)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政治立场、政治理想，总是通过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首先是通过作品的主人公来表现的。《一代风流》中的“风流人物”是谁呢？第一名当推周炳。他是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刻划、竭力美化和歌颂备至的主人公，是表现所谓“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理想的“革命英雄”。

周炳何许人也？此人嘴巴上把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一个投机分子，是混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叛徒和工贼，是作者狂热地宣扬“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典型形象。

在《三家巷》中，参加省港大罢工工人的游行，是周炳的第一次投机革命。他身在游行队伍之中，心却在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美人儿”区桃身上。帝国主义的子弹射穿了区桃的胸膛，他就一下子从狂热变成了冰冷，从无限止的“自我扩张”跌进到无边的虚无之中。在他的心目中，整个世界只能为他和区桃而存在，而区桃也只不过是占有和享受的对象。因此，归根到底，世界就是为他一个人而存在的。奉行这样一种极端利己的唯我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必然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他可以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去投机革命，也可以为着同一目的而出卖革命。因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周炳一边东躲西藏，一边却为了追求买办资产阶级小姐陈文婷，不顾旁人的一再警告，连续发出了一封又一封的所谓情书，断送了“共产党员”周金的性命，甚至把地下兵工厂也向这个买办小姐告密！

周炳的第二次投机革命，仍然是抱着为个人复仇的目的而卷进了广州起义的。起义失败，个人的“一切美丽的希望都成了泡影”，于是又被“痛苦、寂寞和悲愤缠绕着，挣不脱身”，大叫

“无产阶级革命就算完结了！”并且可耻地接受了曾被他骂为“工贼”、“内奸”的陈文雄、何守仁的施舍，坐船逃到上海，躲进“金鑫里三号”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子豪的公馆当寓公，跟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太太陈文英过着不明不白的暧昧生活。欧阳山特意为他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安排了这样一段经历，他究竟想歌颂一类什么样的人，宣扬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不是很清楚了吗？

在《苦斗》中，周炳带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太太陈文英的介绍信，到震南村开始了第三次投机革命。“革”的什么“命”呢？当了“第一赤卫队”的政治指导员，一面唱着“左”倾盲动主义的高调，一面又亲从水底救了地主、买办、官僚、党棍何守仁、陈文雄、张子豪、李民魁等人的狗命，还凭着这点“救命之恩”，二次进城向何守仁乞求恩施，最后又钻进了他认为是“腐败、肮脏、混乱、荒唐”的三家巷，接受陈、何两家的庇护，俯首贴耳地成为地主、买办阶级共同豢养的一条小走狗！

从投机革命开始，到悲观绝望、叛变投敌告终，三次“革命”，三次背叛，这就成了周炳“革命”的三部曲。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周炳这类人物倒也并不罕见。每当革命巨流滚滚向前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残渣烂草夹杂其间，革命进入高潮，他们浮上浪尖，昂首翘尾，简直比革命还要“革命”；一旦革命进入低潮，马上沉淀下去，恬不知耻地投入反革命的怀抱。这类被欧阳山歌颂为“一代风流”的人物，分明是道道地地的一代渣滓。

欧阳山为了神化他所理想的周炳这个叛徒、工贼形象，在书中竭力颂扬所谓“美的魔力”。在遭受着三座大山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周炳凭着一副“好容貌”，居然不仅可以做地主、买办、官僚政客的堂上客、座上宾，而且是夫人小姐心目中的“王子”和宠儿，难道“美”的作用真是那么神奇吗？鬼

话！实际上，这不过是用来掩盖周炳叛变革命、投降地主资产阶级的障眼法。在阶级社会里，美同爱都是有阶级性的。买办资产阶级小姐陈文婷在讲到周炳的哥哥周榕时就曾赤裸裸说过：“他要把我们当做敌人，我们就把他俘虏过来！”其实，周炳和周榕一样，不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俘虏，而且是他们忠实的奴才。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投机革命而又叛买革命，对于革命阵营来说，固然是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而对于反动阶级来说，却起到了他们自己所不能起的反革命作用。这才是地主、军阀、官僚、买办所以如此欣赏周炳的真实原因。

这种通过对异性的“美的魔力”的描写，来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阶级投降，是资产阶级和新老修正主义作家早已用滥了的卑劣手法。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中，不是就大量充斥着通过对立阶级男女的“一见钟情”，来宣扬劳动人民只有背叛本阶级、投靠反动统治阶级才是自己唯一出路的恶毒描写吗？在现代修正主义文艺作品中，不是充斥着诸如那种为了一双蓝眼睛就可以把肉体 and 灵魂统统出卖给反革命之类的反动情节吗？事实证明，欧阳山只不过是跟在资产阶级和新老修正主义作家屁股后面的一个可怜的爬行者而已！

欧阳山曾经自鸣得意地同别人谈到《三家巷》与《红楼梦》的对比，认为它们的不同之点仅仅在于：“第一，《红楼梦》里没有闹革命，也不谈打仗；第二，《红楼梦》里也没有那么多广州话。”这是无耻地歪曲古人以吹捧自己。两者根本不能相比。《红楼梦》支持了十八世纪中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三家巷》和《苦斗》却是支持了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向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投降者。如果《红楼梦》曾经起过揭露地主阶级内部黑暗、腐朽、没落的作用，那末，《一代风流》则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它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都

是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 (三)

欧阳山在《三家巷》和《苦斗》这些自称是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作品中，不表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专写“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不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却专门歌颂叛徒、工贼，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这正是反映了他一贯的阶级本性。《三家巷》和《苦斗》只不过是一次集中的暴露。不是还有人曾经认为欧阳山炮制《三家巷》和《苦斗》的“动机”还是好的吗？有些不了解底细的天真的人们不是还曾经认为欧阳山是个“老革命”吗？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通过欧阳山一生的主要作品，看一看他本人的“来龙去脉”。

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当欧阳山以罗西的笔名刚走上文坛的时候，就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美化革命阵营中形形色色的叛徒、工贼。他笔下歌颂的人物，其卑鄙的程度，据他自称“怕未必让张资平氏专美于前”。正是由于这一点，欧阳山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青睐，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成为专写反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人物的“专业作家”。

欧阳山不是吹嘘自己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国民革命军里做些政治教育工作”了吗？不错，他同精心塑造的周炳这个人物一样，曾经被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风暴卷进了大革命的洪流。但当蒋介石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九二七年四月底，革命烈士的鲜血还在蒋介石屠刀下流淌，他却完成了一部以极端利己主义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玫瑰残了》，向刽子手去邀宠。他公然在《后记》中自供道：“做完这篇长篇创作以后，或许不久就要跑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

科当中尉编辑”去了！第二年五月又写了《桃君的情人》，不仅无耻地歌颂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头子，而且还借书中另一所谓正面人物“P君”极其反动地大骂：“把性命做工具，这完全是共产党的行为！”欧阳山咒骂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出生命的无数先烈，这恰恰证明了他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反共宣传的“工具”。他的所谓“政治教育工作”，原来就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

欧阳山早在一九二八年写成的《爱之奔流》的序言中，就曾公开宣称他反对无产阶级政治。他说：“政治这个东西是未必能解决一切纠纷的”。那么，什么东西能够解决一切纠纷呢？他在三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找到了这个答案，这就是胡风后来提出的“原始的强力”和“疯狂性”、“痉挛性”。欧阳山用自己作品为反革命政治服务以后不久，就结识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胡风，这可真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从此，欧阳山在他的反革命创作实践中，完全遵照着后来由胡风提出的“精神奴役创伤论”这种反动文艺理论，成了一名忠实地实践周扬、胡风反革命理论的“作家”。

在这个时期中，叛徒、工贼经常成为欧阳山小说的“理想英雄”。他在一九三四年写的短篇小说《康波父女》，一九三六年写的短篇小说《失败的失败者》，就都是以工贼和奸细为主人公的。前者竭力歌颂和渲染康波的孤傲性格，把他的出卖工人运动说成是完全值得同情的，而那些谴责康波叛卖行为的工人们倒是不通情理的，是欺弱怕强的“孱头”。后者则描写职业奸细郭胜锐临死前突然天良发现，发出“懊丧地追悔的、濒于灭亡的呻吟”，发誓“下一辈子投生”要给被他出卖了的革命者“做牛马”！对这样一个极端卑鄙、狡猾的敌人，欧阳山竟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怜悯！

欧阳山这些反动作品，是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一支

乔装着革命面目的别动队，其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也是反对文化革命新军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的。在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后不久，他假惺惺地打着“纪念鲁迅”的旗号，在“哀痛”中抛出了中篇小说《鬼巢》，但它却是一篇典型的胡风式的作品。这部作品让在广州起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的几百个“鬼魂”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疯狂性”、“痉挛性”，莫名其妙地“殴打，斥骂，调情”，“撕裂了自己的衣服”，“用可怕的野兽般的喉音咆哮起来”……这是在“纪念鲁迅”吗？不，这是对伟大的鲁迅的污蔑！

在抗日战争时期，欧阳山大肆鼓吹和积极创作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国防文学”，反对鲁迅根据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革命口号。他通过一系列的“作品”，鼓吹阶级斗争“已经停止了”，进行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宣传。欧阳山在参加延安整风后写成的长篇小说《高乾大》，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它违背毛主席一贯的教导，片面强调农村合作社要保证农民“发家致富”和“将本求利”，把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边区农民写成是一群浑浑噩噩的可怜虫，面临着日、蒋、汪对边区的包围，却丝毫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心目中念念不忘的只有“红利”两字。书中的主人公高乾大，竟被写成是一个带有“精神奴役创伤”的共产党员，怕鬼怕得出奇，几乎成了一病不起的精神分裂者。这难道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解放区的贫雇农的形象吗？

当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欧阳山一面公开扬言要为文艺黑线抓“干部、金钱和摊子”，扩大实力；一面继续拼命赶制《英雄三生》、《前途似锦》等毒草，为贯彻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舆论。他在一九五九年抛出的那本专写



广州起义的历史小说《红花冈畔》，不仅明目张胆地抹煞和贬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歌颂了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不惮其烦地为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树碑立传，一本四万字的小小说吹捧陶铸竟达六次之多。直到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他肆无忌惮地抛出了《乡下奇人》、《在软席卧车里》这样一些毒草小说，疯狂攻击大跃进搞糟了，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公然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鸣“不平”，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鸣锣开道。这些作品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在当时曾博得周扬等反革命分子的大声喝采。

作品是作家的一面镜子。我们从欧阳山成堆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到了欧阳山的真面目：从二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欧阳山一贯顽固站在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立场上，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铁证如山，赖得掉吗？

欧阳山的反动作品，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的社会渣滓为生活源泉，反映了这些没落阶级的黑暗、腐烂的精神面貌，是一种道地的流氓文学即工贼文学。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欧阳山在《七年忌》这本集子里，有一篇叙述自己阶级出身的文章，叫做《我与文学》。他谈到他的从小官僚沦为赌棍的父亲，谈到他自己从小在广州这个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思想十分浓厚的都市中长大，“过着下流顽童底放荡生活”，阅读了大量颓废色情的封建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他的朋友“有嫖赌诈骗的无赖汉”，“有在山脚挖洞，做旅店营业的老板”，“有画符念咒的神巫”，“有在城墙上放马的伏卒”，还有“私娼底弟弟”，等等。

总之，这是一伙随着时势浮沉漂荡的灰色杂乱人群，他们是欧阳山笔下最心爱的人物。

欧阳山在其中生活过和进行热烈歌颂的这个社会阶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他们极易投机革命，也极易叛卖革命。叛徒、汉奸、特务王明就是这种渣滓的一个代表。欧阳山却把这些“渣滓”，一个个当作“英雄”来歌颂。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为着巩固自己的政权，或者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都需要制造反革命舆论，特别需要在无产阶级内部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阶级投降的反革命舆论，鼓吹美化无产阶级的叛徒、工贼的反革命舆论。按照这个反动的政治标准，欧阳山的作品，当然成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理想的选择对象。正因为这个缘故，当蒋介石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间发动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时候，当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遭受迫害屠杀的时候，当许多革命的和进步的书籍遭到查封查抄的时候，欧阳山用罗西署名发表的许多小说却可以一版再版，国民党检查官大放绿灯，书店老板列为“畅销书”。又因为这个缘故，这样的一个反动作家，这样的一些反动作品，在解放后还会被刘少奇等一伙捧到了九重天，一遭革命群众批判，立即周扬抚慰，陶铸保驾，几乎搅动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文艺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要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重要的一项，就是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采取掉以轻心的态

度，草率的态度，马马虎虎走过场的态度，都是不行的，都是不能真正把兴无灭资的斗争搞到底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需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毛泽东思想的觉悟和水平，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夺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十一期)

# 欧阳山为青年设置的一条死胡同

——评叛徒、工贼周炳的道路

中山大学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用什么思想来教育青年，引导青年走什么样的道路，做什么样的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欧阳山自称，他创作《三家巷》《苦斗》，就是为了教育青年。用他的话来说，他“介绍给读者们的一些男、女朋友，读者们会同情他们，敬佩他们，爱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连在一起”。在小说中，欧阳山抬出了一个要青年“同情”、“敬佩”的榜样，这就是他苦心孤诣地炮制的“理想英雄”周炳。

那么，让我们剥开周炳“迷人”的画皮，看看欧阳山究竟要把青年引向什么样的道路！

## 买办阶级的忠实代理人

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搏斗中，阶级敌人最阴险、最毒辣的一手，就是通过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对于机会主义者，列宁曾经作过一针见血的揭露，指出：“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

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同盟者。”

周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小就当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干儿子，靠吮吸买办资产阶级乳汁长大。投机革命以后，一贯迎合买办资产阶级的需要，忠实地为买办资产阶级服务。这一点，周炳是直言不讳的。当他带着国民党官太太陈文英的介绍信来到震南村的时候，他就当面对汉奸林开泰声称：“这敢情是无巧不成书，你的后台老板，也是我的后台老板。”巧吗？其实一点不巧！周炳用他的全部经历说明，他和林开泰是一丘之貉，都是买办资产阶级豢养的哈巴狗，是他们的代理人。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不过是周炳比林开泰多了一副假面具。

参加省港大罢工活动，是周炳投机革命的开始，演出《雨过天青》是他这一时期最主要的“革命”活动。《雨过天青》，演的是罢工时期，一个所谓海员工人和买办资产阶级小姐恋爱的故事。这个工人希望女的和他一起参加罢工，女的动摇，“事情弄得不可开交，罢工几乎流产”。后来女的坚定了，罢工也就胜利了。在这里，买办资产阶级成了决定罢工命运的主人。这是一出彻头彻尾吹捧买办资产阶级的戏。这样一出戏，周炳特别请求买办资产阶级小姐陈文婷和他合力扮演。怪不得陈文婷欣然接受，在演出后还把他夸奖一番：“英雄，英雄，你完全是个激动人心的小英雄。”这个买办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受宠若惊，感到从此“人生的前景光明灿烂”。正当中国人民跟三大敌人进行激烈的生死搏斗的时候，周炳捧出了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小姐，演了一出吹捧买办资产阶级的闹剧，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一切机会主义者，从来就是实用主义者。为了迎合反动派的需要，要右有右，要“左”有“左”，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变色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前后，机会主义者从右的方面葬送了大革命的成果后，又从极“左”的方面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千方百计要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欧阳山的“理想英雄”周炳，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完全拜倒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脚下，在他看来，这些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是“爱国的人”，“有抱负的人”。他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永远跟随”他们，他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认为“只要这些人，大家齐心就行了”。党的领导，工农群众的主力军作用，被他完全抹煞了。这和陈独秀把领导权奉送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完全是一路货色。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从极右跳到极“左”。在震南村，大搞形“左”实右的所谓斗争。他根本不去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根本不去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根据地，他极力鼓吹的，是搞什么“城市暴动”、“打回省城去”。以“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为指导思想，他要赤手空拳的赤卫队攻打乡公所，火烧稽查站，最后为了一个女人，几条大汉全体出动，和国民党的正规军干了一仗，落得个全军溃散的下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轻易暴露革命力量，使革命导致失败，实际上是充当帮助反动派扑灭革命火焰的消防队。这就表明，“左”和右，不过是机会主义者的不同表现。极“左”只是极右的伪装，一切机会主义者，本质上都是极右的。周炳在震南村“左”得出奇的时候，就曾一再晋谒大地主何守仁，乞求他大发慈悲，说什么：“大哥，我来请求你”给佃户“借点粮食”，“把今年的租子免了”，为胡杏“说一说话”，救救这个丫头。周炳就是这样制造对反动派的幻想，欺骗群众，用苦苦哀求来代替革命斗争。他的一副极右面目不就原形毕露

了吗？

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混在革命队伍里的机会主义者，就是反动阶级的代理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在革命队伍里制造混乱，进行破坏。在革命发展过程中，他们妄图通过破坏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从根本上扑灭我们党和我国的革命。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就必然撕去“革命”的外衣，公开投进反动派的怀抱，充当可耻的叛徒。陈独秀如此，王明如此，刘少奇也是如此。周炳从三家巷爬出来，钻进革命队伍，忽“左”忽右，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竭尽犬马之劳。每当革命到了转折关头，他就不惜出卖革命，出卖同志，公开叛变投敌，最后溜回三家巷，舐食买办资产阶级恩赐的剩菜残羹。这就是这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所走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深知，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就是要分裂无产阶级，采用拉出去、打进来等手法，在无产阶级队伍里寻找和安插他们的代理人。这是狠毒的挖心战术。一切革命同志，务必提高警惕，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谨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

### 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阳一套，阴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打着“红旗”反红旗。被欧阳山大肆吹捧的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工贼周炳，就是惯于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人物。因此，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周炳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就有助于我们及时

识破资产阶级代理人。

周炳，从小就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了一套圆滑机诈的手段，既会向他的买办干妈邀宠，又会讨女工们的欢心。此后，在革命队伍中，他这种手段便发展为欺骗无产阶级，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卖命的政治手腕。周炳之所以能迷惑一些青年，同他善于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撕下他的假面具，看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是怎样表演的。

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这是周炳爬上政治舞台后的第一次公开表演。在《雨过天青》这出戏中，他扮演了一个“痛斥”买办的“英雄”。在台上，他慷慨激昂，口沫横飞，把买办骂得狗血淋头，颇有一点不共戴天的模样。满嘴革命词句，这是周炳迷惑人的一招，他在政治上出头露角，也是靠着这一手。然而，就是这个在台上痛骂买办的“英雄”，在台下，对买办却显出一副阿谀谄媚的奴才相。就在演这出戏的时候，他为了博得买办陈文雄“一百块港币”的“资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们真是热心家！我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可是说不出来——你们……就……等于……用不着说，不只罢工工人感激你们，凡是中国人都会……感激你们！”

台上骂买办是卖国贼，台下赞他们是“热心家”；台上骂买办为了几个钱当走狗奴才，台下却向他们伸手要钱，甘当奴才的奴才，走狗的走狗。一副反革命两面派嘴脸，真是跃然欲活！

明里装人，暗里做贼，这是周炳在大革命失败后进行罪恶活动的“连贯动作”。周炳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保护下，逃亡上海，做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子豪的座上客。明明是叛变投敌，却打着“找党”的招牌。张子豪要和他达成一宗“交易”，要他充当工贼、暗探，他装模作样地拒绝，还说什么“我一不要



钱，二不要官”，只要大卖国贼“老蒋下台”，要“打倒帝国主义”云云。信誓旦旦，道貌岸然，好一个可敬可爱的“革命家”！可是，唾沫未干，他就和小蒋介石林开泰大搞政治交易。他拿着张子豪的臭婆娘的大洋和荐书，千里迢迢跑到震南村，第一件事就是和专为日本帝国主义搜集情报的卖国贼林开泰握手言欢，“当面约定：此后河水不犯井水，各行其是”。从此和平共处，狼狈为奸。这就清楚地表明，周炳革命是假，叛变是真。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什么要“老蒋下台”，其实是和卖国贼穿一条连裆裤。他口头上声言不做张子豪的暗探，实际上却在震南村破坏农民斗争，葬送革命力量，充当了维护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帮凶，起了敌人所不能起的更大的破坏作用。

列宁曾经指出：“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周炳就是这样的角色。随着他的日益“成长”，其反革命伎俩更加狡猾、阴险。当胡杏要求参加革命时，他说什么“用不着你来革，你乖乖地坐着，我们替你革”，他还发誓说：“我不只救一个人，还救所有的人。”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势。

“我们替你革”，这是弥天大谎！你出卖同志，出卖原则，革的什么命？！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其实是愚弄群众，欺骗群众，不许群众起来参加革命。

“救所有的人”，这是招摇撞骗！你在震南村“苦斗”三年，大搞“左”倾盲动主义，给广大贫下中农带来重重灾难，而舍生忘死去救的，却是何守仁、陈文雄等几条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落水狗。

尽管周炳革命的口号喊得最凶，发誓发得最厉害，但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他推销的不过是扼杀革命、使反动阶级得以苟延残喘的最坏的货色。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反革命两面派，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他们是埋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定时炸弹，我们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革命两面派总是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分析一切，辨别一切，一切妖魔鬼怪必将无所施其伎，无法遁其形。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都必然遭到彻底的破产！

### 极端唯我主义的腐朽灵魂

周炳走上叛徒、工贼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周炳虽然出身于所谓工人家庭，但他从小就泡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黑染缸之中，饱受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熏陶。他向往的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的腐朽寄生生活，决心长大后要做陈文雄那样的“上等人”。资产阶级思想的病毒，早在他的灵魂深处蔓延滋长，形成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恶瘤。他成为叛徒、工贼的总根，就在于此。

“万物皆备于我”，这是唯我主义者的信条。在他们看来，世界因“我”而存在，世界为“我”所占有。离开了“我”，世界万物荡然无存。周炳就是这样看待他和世界的关系的。当他得意的时候，便“觉得天高地阔，遍体舒畅”，“想叫喊”，“想发狂”，自我膨胀到了极点。当他失意的时候，则“觉着眼前一片漆黑，好象到了世界的末日”，失掉一个爱人，他就哀叹“一切全都完了，全都不存在了”，“生命不过象一颗露珠，一根小草，一片破瓦，一块烂布”。“我”完了，世界也就完了。这就是周炳的极端唯我主义的世界观。

以这种世界观为指导，参加革命，必然成为投机分子。在周炳心目中，革命只不过是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阶级的利益，人类的解放，他统统置诸脑后。他心力交瘁，孜孜不倦地“苦斗”的，就是为了在革命成功后，能够过着“一天对着她（区桃）十二个时辰”的“美满”生活。区桃死了，他就觉得革命没有什么“奔头”，没有什么值得去“留恋”、“奋斗”的了。后来，他想到通过革命可以“重新建立一种美好的生活”，人生又有了奔头，于是再一次投机革命。总之，周炳的“革命”，完全是以“我”为轴心的投机生意。

以这种世界观为指导，处理个人与革命的关系，必然出卖革命原则。毛主席指出：“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然而，周炳爱的正是那些敌视革命的地主、买办阶级的少爷小姐，和他们臭味相投，如胶似漆，把革命原则抛得一干二净。在他当第一赤卫队指导员时，林开泰绘图通敌，他为了保存自己，不但不去干涉，还禁止别人干涉。想当初，林开泰摸了一下区桃的脸蛋，他就不顾一切，狠狠地打了他一锤。两相对比，周炳的“原则”是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以这种世界观为指导，在革命斗争中必然是怕死鬼、软骨头，一有风吹草动就成为可耻的叛徒。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便吓破了周炳的胆。他一面仓惶逃命，一面加紧和陈文婷勾搭，用“共产党员”周金的头颅和党的机密，作为卖身投靠的见面礼。广州起义失败，他惊恐万状，赶忙放下武器，连脖子上被红领巾染上的一点红色，也洗了又洗。即使如此，他还觉得不够安全，于是一头栽进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子豪的怀抱。震南村溃散，他慌忙逃回三家巷，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地对地主小姐何守礼说：“革命……危险得很哪！性命都

……。”为了保住一条狗命，周炳就这样三次叛变投敌，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唯我主义者，只能得到这样的结局。

唯我主义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最腐朽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刘少奇之流鼓吹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的赤裸裸表现。周炳从圆滑机诈到大搞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从机会主义者堕落成叛徒，唯我主义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动。这就是周炳的道路，也是欧阳山塑造他的“理想英雄”所贯穿的一条黑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要具有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我们必须大破资产阶级唯我主义世界观，肃清周炳形象的流毒，斗私批修，以杨子荣、李玉和等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为榜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 一场对年青一代的争夺战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争夺年青一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关怀年青一代的成长，最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他教导青年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年青一代培养成为革命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根本大计。

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正在用反革命两手，妄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它们一方面疯狂扩军备战，加紧侵略战争的部署；一方面大搞“和平演变”，幻想中国党的第三代或

者第四代变质。臭名远扬的战争贩子杜勒斯就公开叫嚷：在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是可能的，“从几百年来说那是绝对肯定的。这大概是几十年的事”。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刘少奇一伙，对此心领神会，他们打着“关怀”、“爱护”青年的旗号，通过各种渠道，拚命向青年灌输最反动、最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企图把青年引上绝路。这是一场在青年问题上的争夺战，我们决不可以等闲视之。

《三家巷》、《苦斗》这类反动小说的出笼，适应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争夺青年的需要。在腐蚀青年方面，大叛徒刘少奇的黑《修养》是首屈一指的，欧阳山这两本黑书，则和黑《修养》一唱一和，异曲同工。他通过周炳这个形象，狂热地宣扬唯我主义和叛徒道路，要青年把自己的命运和周炳的命运“连在一起”，这就是要把年青一代，引上他所设置的死胡同，变成帝、修、反的马前卒。因此，对欧阳山这两本反动小说以及他的一切毒草，必须批深批透，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历史在前进。历史证明，中国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革命斗争中起着某种先锋的作用。历史还将证明，中国革命青年能够依靠毛泽东思想，在最后消灭帝、修、反的伟大的斗争中作出新的贡献。美帝国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刘少奇之流，企图把我国青年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不过是痴心妄想。中国革命青年对他们的回答是：

“红灯高举闪闪亮，”

“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原载《南方日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 阶级投降主义的一个黑标本

——狠批反动小说《东风化雨》

巩 旭 黎

一九五六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跳了出来，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反动谬论，配合国际上的魑魅魍魉，顿时乌云翻滚。时隔不久，大毒草《东风化雨》出笼了，它扯起“阶级投降主义”的破旗，紧密配合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为当时国际上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增加了一个音符，妄图把强劲的东风化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妖风黑雨，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早春”气候。

正当逆流滚滚的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提醒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彻底宣判了刘少奇阶级投降主义的死刑。

### 颠倒历史的妖风

在《东风化雨》这部大毒草中，刮的是一阵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妖风。

小说的炮制者精心刻划了两个资本家的鬼影。一个是“暴

发户”王少堂。此人从一把雨伞，一件旧长衫，一双破布鞋，“平步青云”，“大展鸿图”，直至成为上海橡胶行业中有名的大老板。作者以十分赞赏的笔调，描写了王少堂的“发家史”，大肆推销刘少奇所提倡的“合法剥削”，把资本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那套“大鱼吃小鱼”的“黑吃黑”手段誉为“发财有术”。

另一个孙敬煊则是“本固枝荣”、“实业雄厚”的正统资产阶级代表，他是作者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也是刘少奇所欣赏的“红色”资本家。作者对“孙氏三代含辛茹苦的创业史”极为称赞。为了把这个形象拼命拔高，不惜歪曲史实，编造了一通资本家“抗日有功”的神话，把资本家一个个打扮成“不畏强权”、“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作者还借孙敬煊之口，胡说什么资本家“办实业的宗旨，是发展民族工业，振兴国家”，是“为人民服务”，“以工业救国”。妙极了！资本家办企业榨取工人血汗，被叫做“振兴国家”、“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剥削赚钱，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奇谈吗？！作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目的是为了掩饰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替资产阶级树碑立传。听了资本家的这番“慷慨陈词”，不禁使我们联想起刘少奇在天津大声疾呼的一副丑态，他说：资本家“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资本家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看！这部小说的作者和他们的黑主子一呼一应，配合得何其紧密。

小说中为了给资本家浓施粉黛，突出这些“英雄”的“爱国精神”，竟不择手段地把工人看成是“群氓”，竭尽了丑化、歪曲之能事。在小说中，工人阶级仅仅放在陪衬地位，出现的工人阶级的形象，都被一个个丑化得不象样子，读者看到的只是一群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毫无斗争精神，只能逆来顺受，任凭资本家摆布的可怜虫。不仅如此，作者还别有用心地把工人写成是有“浓厚的行会性与流氓性”，恶毒地把他们分成势不两

立的两大派。当工人内部发生冲突时，工人自己无法解决，却由资本家出面调停。

够了！够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恶毒污蔑，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主席指出：“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反动小说的炮制者正是这样的反革命文艺家。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这部毒草小说中，历史却完全被歪曲了：敲骨吸髓的吸血鬼变成了“光明正大”的“英雄”人物，而历史的真正主人——工人阶级却变成了无所作为的“阿斗”！小说的炮制者丑化工人阶级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其黑主子刘少奇对工人阶级的污蔑，把工人阶级看成是一辈子为资本家当牛作马的“驯服工具”，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刘少奇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 调和阶级矛盾的黑雨

《东风化雨》化的是什么雨呢？化的是刘少奇调和阶级矛盾的黑雨。

让我们听一下反动资本家王少堂对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自强讲的一段黑话：“赵师傅，弟兄们和我们都是困在一条船上的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怎么能是“一条船上的人”呢？可是，在场的工人竟没有一个进行反驳，这是为什么呢？说怪也不怪，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不是宣扬过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还不能“搞破裂”，“资产阶级和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如果反对资本家，那就错了”。作者就是按照其黑主子这个黑指示心领神会地来描写的。他们别有用心地设计了“长江橡胶厂”，在这个厂里，资本家与工人“称兄道弟”，“风雨同舟”。当厂方工资



发不出时，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自强发动工人肩背车胎，满街叫卖。当资本家王少堂叹苦经，讲恢复车胎生产资金、销路成问题时，赵自强又大献良策：“资金，我们工人可以暂时少领一部分工钱，你们再想想办法。销路也不成大问题，我们愿意帮助厂方到乡下去，到外地小县城去推销。”赵自强从讲的到做的，哪里还有一丝一毫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气味？！他与资本家完全成为穿一条裤子的“手足兄弟”了！

这部毒草的炮制者还抓住了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打着“共同抗日”的旗号，别有用心地用民族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当长江厂工人组织浩浩荡荡的队伍冲出厂门参加抵制日货大游行时，资本家竟“感到无比亲切，感佩”，居然“笑嘻嘻地迎上前去”，翘起大拇指，赞扬“工人弟兄”的行动好得很。当“八·一三”战争爆发时，为了“共同抗日”，劳资双方都为内迁问题操心。当机器内迁中途碰到日寇飞机轰炸，汽车损坏，在这样危险的时刻，押运内迁机器的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自强，千方百计地动员工人，披星戴月地起运，吃尽千辛万苦，总算把机器抢救回厂。工人的行为感动了资本家，以至资本家为工人洗尘，请工人上馆子庆功。作者在此着力刻划了一幅“阶级合作”的图景：资本家王少堂在馆子里举杯赞扬工人，“你们在那么危险的情形下，将轮胎部机器抢救回来，可以说是本厂的有功之臣……真所谓乱世见人心，烈火现真金呀！”他还要工人今后“不分资本家、工人，不计以往的恩怨，同舟共济……”挂着党支部书记招牌的赵自强竟然点头哈腰地回答：“王经理，为了抗日，总好说话”。真是一唱一和，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露骨地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在小说第二部的第三十六章，炮制者精心安排了工人和资本家同坐一间牢房的场面，并一起进行绝食斗争，一起唱囚歌。当资本家出牢时，怀着激动的心情与工人“拉拉手珍重道

别”，赵自强还对资本家王少堂、马仲伯无微不至地关怀，劝告他们“出去以后，要多加小心”。资本家也“深受感动”地说：“赵师傅，太谢谢你们了！在牢里蒙诸位难友关照，出狱了，你们还这样关心我们。说心里话，要能保出你们，我真愿意来保。”在这里，作者宣扬“阶级调和论”已到了何等地步，哪里还看得出他们是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两个根本对抗的阶级？！

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无产阶级不去专资产阶级的政，资产阶级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阶级调和论”是一帖麻醉剂，人们思想上阶级斗争熄灭了，那就正好上了阶级敌人的当。长江厂的工人在作者笔下都成了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信徒，成了一堆软骨头，“为了有一口饭吃，工人们只得忍气吞声”，安分守己，从来不敢越资产阶级的半点轨，没有与资产阶级进行过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作者笔下，长江厂党支部书记赵自强成为一个刘少奇一贯自我标榜的、向阶级敌人屈膝投降的“白区工作模范”的工贼典型。然而，反动派并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妨看一下一群反动资本家在董事会上为镇压工人的一场争吵：有的说，“共产党是我们的冤家对头。你要不掐着他的脖子，他就会把你掐死”；有的说，“以后再找机会吧！刀把子在我们手上嘛！”他们对共产党是多么的刻骨仇恨啊！刘少奇胡说什么“资产阶级不造社会主义的反”，这是弥天大谎！实质上，他是要工人阶级俯首贴耳地向资产阶级投降，束手待缚，跪在敌人面前，伸出脖子让敌人砍脑袋，浑浑噩噩地等待资本主义复辟。

### 走合法斗争的邪路

小说的炮制者把资产阶级的一条乏走狗，大工贼刘少奇

“合法经济斗争”的狂热追随者和忠实的信徒赵自强，描写成一个敢于同资本家斗争的“工人领袖”，说他是“替人家办事，人人都敬佩”的“英雄”，其居心是十分险恶的。

请看：在第一次罢工的高潮中，赵自强怀着对资本家王少堂特殊的“深厚感情”，说什么：“工人弟兄要求成立工会，好有个代表大家的组织替大家办福利，交涉事情，我想成立了工会对厂方也有方便的地方。”真是一言道破了天机，成立工会是为了“厂方”也即资本家的“方便”。至于说“办福利”不过是块遮羞布罢了。伟大导师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罢工只是一种斗争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赵自强这样百般地为资本家着想，无怪乎当赵自强被日本人逮捕时，资本家王少堂竟慷慨地拿出了十根“大条子”，十只“莱卡”照相机，十只“亚米茄”手表和一辆“奥斯特”小汽车，把赵保了出来。这是一场何等可耻的交易啊！赵自强，一副内奸的嘴脸，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请再看：在工会选举中，工贼朱元山和汉奸许阿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长江厂建立了工会筹备会。对此，工人非常气愤，都要求把汉奸许阿根轰出厂去。按理，此时长江厂的党支部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发动工人和工贼、汉奸作坚决斗争，把工会的大权夺过来。可是，恰恰相反，听一听赵自强说些什么：“根据这个形势，区委指示要迅速改变斗争方式，今后以进行合法斗争为主，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还说要“争取在合法的选举中有更多的自己人当上理监事”。赵自强左一个“合法斗争”，右一个“合法选举”，在“合法斗争”、“合法选举”的幌子下，出卖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里，连小说炮制者也难以自圆其说，不得不写道：“中共长江厂支部为形势所迫，不好出头发

动斗争。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只得把气一直闷在肚皮里。”戳穿假面具看真相，赵自强想的“合法”，就是要“合”资本家的“法”，“合”国民党的“法”。他所羡慕的就是经过“合法选举”，有更多的“自己人”当上工会的理监事。赵自强这个工贼的所作所为，总是行不离“议会迷”刘少奇的“合法斗争”之轨。他那工贼的丑象不是毕露无遗了吗？

打开刘少奇的丑史，在一九四六年他就抛出了《时局问题的报告》，狂吠：“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又说：“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我们的一切组织要改变，转变到以非武装斗争为主”。这完完全全是一派胡言，是骗人的鬼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旧中国“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就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英明论断的无比正确，这也是对刘少奇“合法主义”的有力还击。

不是吗？就在书中，赵自强恬不知耻地鼓噪“合法斗争”、“合法选举”的背后，工贼朱元山和汉奸许阿根不是恶狠狠地说：“就让他们多来两个人好了，量他们也造不起反来，现在刀捏在我们手上呀！”汉奸、工贼们的嚎叫，给了大弹“合法斗争”、“合法选举”滥调的刘少奇和他的徒孙赵自强一记响亮的耳光。

剥去伪装，露出真相，人们就会发现，在作者笔下的“工人领袖”赵自强，原来是和刘少奇一模一样的、出卖工人阶级利

益的工贼，是混在党里的内奸，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怒涛，以横扫千军之势，把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刘少奇及其徒子徒孙们的阶级投降主义统统淹没！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驱散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妖风黑雨，指引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 为复辟资本主义呼风唤雨的大毒草

——评反动小说《东风化雨》

上海采矿机械厂工人 程继尧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乱云飞渡，国内外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激烈，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总后台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配合国际上帝、修、反的反华叫嚣，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这时，反动小说《东风化雨》第一、二部相继出笼了。

《东风化雨》为谁呼风唤雨？只要把它拿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这面照妖镜下一看，就完全清楚了。毛主席在报告中为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制定了一整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刘少奇立即跑到天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天津讲话”，竭力鼓吹反革命经济主义，鼓吹依靠资产阶级，鼓吹阶级合作和阶级调和，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抛出了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东风化雨》就是刘少奇“天津讲话”的艺术翻版，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呼风唤雨的大毒草。

## 为“权”斗争，还是为“钱”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向全

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任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权”字进行的。

在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政权，向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展开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反动小说《东风化雨》鼓吹为什么而斗争呢？

答：钱，钱，钱！

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头号工贼刘少奇说过：“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他闭口不谈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东风化雨》中长江橡胶厂的那个“党支部”就是刘少奇的这种为“钱”而斗争的活样板。这个厂的“党支部”经历了中国革命的三个历史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可是，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没有听到他们说过一次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的话。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斗争，没有一次不是为了钱。除了“补发工钱”，就是“增加工钱”。这些钱迷心窍的家伙，活着就是为了挣钱。“袁大头”引路，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大老板扔出几个铜板，他们马上就心满意足地命令工人“不要罢工”，打发他们重新“走进工场”为资本家卖命；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他们为了“争到工钱里面搭发一部分银洋”，“解救一下”“眼前的饥渴”，竟然不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手接住国民党反动派“国防部”丢下的几块银洋，驱使工人“又欣喜又感激地”为蒋该死生产攻打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定货”！

长江厂的这个“党支部”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出卖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可是，他们居然还敲着银洋，厚着脸皮对工人说：斗争“胜利”了。好一个“胜利”！我们必须戳穿这个大骗局；资

本家照样在工人头上挥舞皮鞭，工人照样“日夜不停”地为资本家建筑压在自己身上的“天堂”，这种“胜利”丝毫也损伤不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根毫毛，这种“胜利”等于零，比零还糟糕！因为它用几个臭钱挡住了工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了自己的斗争任务。

长江厂的所谓“党的积极分子”眉飞色舞地说：“有那么一天，我们忽然有了钱，自己开个工厂，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多好啊！”千万不要听信这种鬼话！在保存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的条件下，这是一幅迷人的，但永远也不会实现的幻景。这种谎言，只能是为了冲淡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腐蚀他们的革命意志，使他们放弃夺权斗争，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向着被压迫的工人散布这种幻想的人，哪里还有一丝无产阶级的味道，他只能是工贼，是暂时还没有发财的资本家！

《东风化雨》所竭力鼓吹的就是这样一条只要钱不要无产阶级政权的反革命经济主义路线。把财迷当作“英雄”来歌颂，把资本主义冒充社会主义来吹捧。这完全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黑货。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曾大放厥词，说什么：资本家“开工厂就是为的赚钱”，“我们国家开工厂也是为的赚钱，如果开工厂不赚钱我们就不开了”，“一定要赚钱”，要“赚大钱”，刘少奇说：将来国家“发展”了，人人“都挣了好多薪金（几十块、几百块）”，就是“社会主义”了。这种“社会主义”不正是《东风化雨》里那些整天想“自己开工厂”赚钱的所谓“党员”、“积极分子”们的“理想”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里竭力鼓吹反革命的经济主义，腐蚀、瓦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阴谋把我们的党变成象《东风化雨》中的“党支部”那样的“经济党”、“福利党”，想把我们广大革命群众都变成只顾眼前利益、不要无产阶级政权的财迷，完全是为了重新从胜利了的人民手中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东



风化雨》这部反动小说在全国胜利十年之后又拉出“长江厂”里这帮“财”迷们，把他们当作“英雄”来吹嘘，就是为刘少奇的这条“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敲锣打鼓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就是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根本利益。

我们并不排除必要的经济斗争。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坚决反对单纯的经济斗争。无产阶级长期以来遭受资产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痛苦教训和他们无数次斗争取得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得翻身，除了向反动统治阶级夺取政权，没有别的办法；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除了不断巩固自己的政权，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也没有别的办法。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前，如果搞单纯的经济斗争，争来争去，不过是向资产阶级争得了一个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只不过是使工人更心安理得地为资本家赚钱而卖命；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单纯从事生产建设，忘记了要不断巩固夺得的政权，就会有失去政权的危险，就会有使政权变质的危险，那样，建设得再好，生产的财富再多，也只能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这一切仍会落到资产阶级手里。

### 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在建设和巩固自己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应当依靠谁？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

级”。可是，反动小说《东风化雨》却鼓吹说：必须依靠资产阶级。这个疯狂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主张也是从刘少奇“天津讲话”里贩卖来的。

七届二中全会一结束，工人阶级的可耻叛徒刘少奇立即跑到天津，纠集一帮大资本家大哄大闹，疯狂反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胡说工人阶级“不可靠”“不如资本家”。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成为以后十几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基本问题。

《东风化雨》的炮制者领了刘少奇的旨意，对资本家大吹大捧，对工人阶级大骂大贬，在反动小说《东风化雨》里，除了资本家“领导”反帝，资本家“领导”抗日，资本家“领导”反蒋之类一戳就穿的谎言外，就是对刘少奇所谓的资本家那套“经营管理有方”的无耻吹捧。

这部小说完全是用资本家的“行话”写成的，炮制者津津有味地向人们描述资本家王少堂如何“一件长衫，一个小包，一把雨伞进上海”，怎样“耍花腔、摆门槛”，靠着“耳朵灵，眼睛尖，嘴巴活，鼻子快”的“特殊本领”，在“一块空地”上，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轮胎工场”。又如何左一个“绝招”，右一条“妙计”，“打垮”了他的对手英国佬。《东风化雨》对资本家王少堂、马仲伯之流的“魄力和手腕”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称赞他们“胆大心细，随机应变”“经营得法”，是办工业的“两根柱子”。

提到工人，则完全是另一副腔调，小说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他们“信神怨命”、“呆头呆脑”，整天“相骂殴打”。只有一条“好处”：“力气大”，“搬搬扛扛”“倒很顶用”。在《东风化雨》炮制者的狗眼里，工人就是这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活工具”，这完全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腔调。

《东风化雨》还公然让资本家直接出面，夸耀他们的“历史

功绩”，说什么不是他们这些人“出钞票绞尽脑汁开办工厂，不晓得有多少工人会饿死。”这完全是刘少奇的黑话。刘少奇在天津就公然为资产阶级帮腔说：要是资本家的“工厂关门、倒闭，生产降低”，工人就会“失业”，“就会饿肚子”。

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坚决揭露资产阶级这种颠倒历史的谎言，教育工人认清自己是社会财富和人类文明的创造者，自己有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可是，《东风化雨》里的“党”又是怎样的呢？“党支部书记”赵自强根本看不到也不愿让工人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们把工人的命运完全拴在资本家的裤腰带上，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说：“老板会去交涉的”，资本家“会有办法的”。完全如王少堂所说：只要他“略施小计，工人就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刘少奇不是说：资本家“富有管理经验和技術知识”，“熟悉市场情况，善于精打细算”吗？刘少奇不是说：资本家的“管理能力超过我们的共产党员”吗？刘少奇不是污蔑工人阶级“没有文化知识，没有文化修养”“管不好”工厂吗？《东风化雨》和刘少奇的这套谬论板板合拍！按照他们的逻辑，工人阶级没有资格管理工厂，管理国家，只有资本家才有资格管理工厂，管理国家。刘少奇不就曾经断言：要是工人管理工厂，“一个月最多两个月”就要“垮台”，“还要把他（资本家）请来的”吗？

工人阶级究竟可不可靠，依靠工人阶级会不会“垮台”，历史早已作了结论。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登上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伟大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出来。这个问题还用得着跟刘少奇及《东风化雨》的炮制者们辩论吗？用不着了！但是，他们鼓吹依靠资产阶级的罪恶阴谋必须揭穿。

毛主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

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这直接关系到按照哪一个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大问题。实际上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刘少奇这条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一心按照资本家设计的蓝图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一心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刘少奇一伙利令智昏，觉得“复辟”的机会来了，工人阶级马上要“垮台”了，便跳出来破口大骂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急急忙忙“请”出如《东风化雨》里的“王少堂”“马仲伯”之类的资本家，大肆兜售他们做生意的“门檻”，发家的“诀窍”，用资本家这一套来“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认为，这样，“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真是荒唐！反动！

资本家的“管理经验”，资本家的“门檻”、“诀窍”，是这些吸血鬼吮吸工人血汗的经验，是压迫工人的“门檻”，是镇压工人的“诀窍”。他们的管理之“方”，就是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之方，是复辟资本主义之方，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之方。他们这一套“生意经”、“剥削经”、“害人经”，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格格不入，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根本对立。刘少奇竟然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去依靠这些害人虫，“学习”他们这一套，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自己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国家民族之复兴”寄托在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歪道路上。真是狼子野心，恶毒透顶！

“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当前，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条战线的轰轰烈烈的斗、批、改运动，就是按照我们工人阶级的意志改造世界的伟大措施。这是使我们国家永远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的道路胜

利前进的根本保证。资产阶级总是要咒骂工人阶级的领导的，那些目光短浅的庸人也总是要怀疑工人阶级领导的能力的，让他们去咒骂，去攻击，去怀疑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工人阶级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的胜利的事实，彻底粉碎了他们的谰言！

## 阶级斗争，还是阶级合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全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对中国资产阶级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并提出了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照亮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光辉道路。

毛主席对全国胜利后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形势的科学的、深刻的分析，象一把钢刀触到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代理人身上。刘少奇跳出来了，跑到天津叫嚷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没有历来的矛盾”，把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是路线的错误”，今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尚不能互相脱离”，我们“要和他们搭伙”，“把重点放在联合上”，将来也要“长期合作下去”。刘少奇完全否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完全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

《东风化雨》的炮制者秉承刘少奇的反革命旨意，用他们那支惯于颠倒历史的黑笔，在小说里描绘了一幅“劳资合作”“同舟共济”图。

请看：长江橡胶厂第一只车胎出世了，资本家为能赚到“袁大头”“狂声大笑”，工人为从此有了饭碗“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英国佬抢去了长江厂的生意，长江厂遇到危机了，大老板为了“民族工业”，不顾“九死一生”，坚决“硬撑下去”，工人也为使老板“不在洋人面前脱裤子”，“勒紧裤带”，全力“支持厂方”渡过“非常时期”。正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哪里有什么“历来的矛盾”！

请看：资本家和工人，在一个“雅座”里喝酒，在一张桌子旁吃饭，称兄道弟，“无话不谈”。资本家和工人还同蹲“一间牢房”，同唱“一首战歌”，“一道绝食斗争”，齐声大骂国民党。工人向资本家伸出“温暖的手”，资本家向工人投以“欣喜的笑容”……。在这幅“劳资合作”的图画里，中国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一面完全没有了，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工人的一面被抹掉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调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不见了。他们成了“一条船上的人”。在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的隆隆炮声中，资本家和工人居然“身份都一样”地站在一起“迎接黎明”，迎接“社会主义”了。照《东风化雨》这种说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简直是患难兄弟，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搞什么斗争呢，一切合作，长期“搭伙”就是了。真是活见鬼！

刘少奇的“阶级合作”究竟是个什么玩意？看看《东风化雨》里那个“党支部书记”赵自强，就清楚了。这位被捧为“老成持重”的赵自强，也是一个少得出奇的人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

级合作迷”。他比资本家还关心长江厂的命运，老板为“轧不出头寸”大伤脑筋，他也跟着大皱眉头，要工人“少拿钱多流汗”，“帮助老板渡过关”；车胎销不出去，资本家急得穷抓头皮，满城奔走，他也跟着穷想点子，叫工人背着车胎“自愿帮厂方下乡”推销，四出叫卖：“车胎要哦？”他比资本家还害怕工人造反，工人一起来，他就急忙摆手：“切勿轻举妄动”。工人不听资本家的鬼话，他就出来替资本家帮腔：厂方“确有难言之隐”，“让我们相信他这一回吧！”工人要揍资本家，他赶紧“把住经理室的门”，还无耻地向老板献媚：我们“帮你想一点平息工潮的办法。”一副工贼、走狗的嘴脸！赵自强就这样成了资本家王少堂“另眼相待”的“工人”，他们酒肉相交，烟茶相迎，一个心眼，一副嘴脸，简直要“合”成一个人了。这就是刘少奇长期以来实行的“阶级合作”！这是资本家和狗腿子的“合作”，是工头和工贼的“合作”，他们“合作”起来是干资本主义的，是剥削工人的，是镇压工人造反的。

《东风化雨》从头到尾连篇累牍地描绘“劳资合作”、“互相谅解”、“互相扶掖”，而只字不提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反对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刘少奇的阶级合作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充分暴露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丑恶嘴脸！《共产党宣言》说得好：“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无产阶级必须向资产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尤其是这样。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的，是“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刘少奇以及《东风化雨》的炮制者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

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卫道士”！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国民党！他们鼓吹“阶级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永远在中国保存和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永远保存并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刘少奇说：“只要我们现在合作搞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刘少奇在天津怎样向大资本家们描述他的“社会主义”的，这已是人所皆知的丑闻了。这里，请看刘少奇在天津的对大资本家说的另一段黑话：“（社会主义）怎么搞法？马克思列宁的书上告诉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本家，打倒资本家才能搞社会主义，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这是马克思的结论”。“我研究这一门也有二三十年，……在这一方面，倒也是专家”，“我们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不采取革命手段实行社会主义”“这叫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不须再加一个字，这个刘“克思”修正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老牌修正主义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了！鼓吹“阶级合作”的大毒草《东风化雨》所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出笼，其罪恶目的，不也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严峻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不向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不革资产阶级的命，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好事，从来就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但是，倒有另一种“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坚持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不进行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么，社会主义就要“和平”过渡成为资本主义。眼前的苏联就是一个明证！刘少奇及其同伙日夜盼望的，不就是中国也有“和平演变”的这一天么？“有朝一日风雷动，得会腾云上九重”，《东风化雨》中资



本家王少堂的这两句唱词集中表达了刘少奇这一伙失去了“天堂”的资产阶级分子盼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心理。

但是，他们盼望的“腾云上九重”的这一天是永远也不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的迷梦，经过阶级斗争急风暴雨考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变得更加坚不可摧。让刘少奇及其同伙抱着资本主义的尸体去痛哭吧！

胜利属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原载《解放日报》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 评为王明路线招魂的反动作品

### 《红旗谱》《播火记》

冀 红 文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正当国际国内出现一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逆流，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梁斌先后抛出了他多年苦心经营的反动小说《红旗谱》及其续篇《播火记》。小说一出笼，立即博得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赏识，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劈头就封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发专论，搞座谈，吹捧的文章连篇累牍。紧接着，又是搬上舞台，又是拍成电影；一再用中文、外文出版，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鼓噪一时，煞是热闹！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两部小说之所以得到资产阶级司令部如此垂青，就是因为它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效劳的。两部毒草，主要描写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三个“左”倾盲动主义的历史事件，即发生在一九三〇年冀中平原的“反割头税”和一九三二年七月间的保定“二师学潮”、九月间的“高(阳)蠡(县)暴动”。为王明叛徒集团扬幡招魂，树碑立传，为帝、修、反摇旗呐喊，完全适应了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难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它吹捧到九天之上！

梁斌在谈《红旗谱》《播火记》的创作时，十分露骨地宣称：

他写的是“历史小说”，而且“不受任何束缚”。

那么，他写的到底是什么“历史”，是哪一家的“历史”呢？书中表现的时代，正是叛徒王明窃踞了党中央领导大权，在全国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当时叛徒王明在北方的代理人，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全面贯彻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就是这次会议的直接产物。学潮之前，保定二师曾不顾条件地多次盲动。当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查封二师，登报开除五十名学生等镇压革命的反动措施后，盲动主义者，硬是召回了五十多名已经离校的学生（几乎全部是报上公布的那些人），强行进校。结果，九人当场被打死，其余全部被捕，使保属党团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然而，盲动主义者并没有从此接受教训，两个月之后，又毫无准备地发动了高蠡暴动。暴动前，对革命力量和敌人的反动本质，都作了极其错误的估计，不顾保定地区驻扎大量反动军队，统治阶级基础相对稳定的客观现实，硬说“暴动条件早已成熟”。便派河北省委书记湘农——即小说中的贾湘农，限令七天（实际只有五天时间），发动高蠡暴动。其结果，也和王明在全国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样，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使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四、五天时间损失殆尽。这就是历史事实的真象，这就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梁斌所写的“历史”，就是不折不扣地早已为中国人民唾弃了的苏修豢养的走狗、叛党叛国的汉奸、特务王明的这一段反革命罪恶历史。

梁斌叫嚷的写历史“不受任何束缚”是什么意思呢？中国革命的历程，证明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无比英明正确，历史已经宣判了王明路线的死刑。梁斌所谓“不受任何束缚”，就是要推翻

历史结论。在梁斌的笔下，为王明路线翻案，确实是不受任何束缚的。他肆无忌惮地贩卖王明路线的黑货，为所欲为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比如，对当时北方革命形势的估计，梁斌把处于京、津、保反革命包围的保定地区，说成是以二师为轴心，早就成了“抗日堡垒”、“党的摇篮”了；这里“有雄厚的党的工作基础”，“积蓄了坚强的群众力量”，组织暴动“条件已经成熟”，可以立即“攻下保定城”。经我们与档案查对，这些都是抄袭的当时王明集团的观点。是王明“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谬论的翻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早就英明地论证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当时北方的情况，经过长期的军阀混战，人民苦难加深，斗争情绪增长，革命形势发展，但敌人的统治渐趋统一，暂时稳定，革命势力还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不顾这些主客观条件，唱着极“左”的高调，把英勇斗争的革命群众，引入歧途，绞杀群众运动。二师学潮中，在敌人想抓捕而抓不到的情况下，硬是把几十名学生推到敌人的陷阱；高鑫暴动，尚无一兵一卒，便念念不忘“攻下保定城”。当队伍起手之后，又是一味蛮干，忽儿要杀回锁井镇，忽儿又要“合击十四旅”，“攻打保定城”。结果，四、五天时间，几千人的队伍，毁于一旦。这哪里是什么“革命”，纯粹是帮助敌人屠杀革命人民。王明的盲动主义路线，正是毛主席尖锐批判的那种“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而梁斌对这条十恶不赦的机会主义路线，却当“圣经”去反复鼓吹。如果谁对王明路线提出一点怀疑，不是以思想“落

后”予以申斥，就是处以“杀头血祭”的下场，给予“无情打击”。完全暴露出一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卫道士的面孔！

梁斌真的“不受任何束缚”吗？否！他只是不受毛泽东思想的“束缚”，却自觉地“束缚”在叛徒王明的极“左”错误路线之下。他为了给王明路线涂脂抹粉，费尽了心机，呕尽了心血：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的失败，本来是王明路线的必然结果，但梁斌竟明目张胆地为之开脱。在《红旗谱》中，居心叵测地编造了一出江涛与夏应图关于“路线”之争的丑剧：江涛代表新路线，夏应图是旧路线的信奉者，由于夏应图“反‘左’倾盲动”时不彻底，“还停留在旧的路线上”，“新的思想还没有和同志们的智慧结合起来”，因此，造成了二师学潮的困境。请同志们注意：这里的所谓“旧”者，即立三路线也；所谓“新”者，即王明路线也！对王明、立三路线之争，毛主席曾明确指出：“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立三、王明本是一丘之貉，梁斌却妄图用“旧”与“新”的障眼法，把王明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对于高蠡暴动失败的开脱，梁斌连这点戏法也不想变了，干脆说成是因为“缺乏经验”造成的。什么“立三路线残余”，什么“缺乏经验”，这都是当年王明集团为自己的失败辩解时的陈词滥调，在这里，梁斌原封不动地端了出来。梁斌还吹嘘二师学潮“震惊了华北”，它的影响“可以与日月同辉”，高蠡暴动“在河北平原上插上了红旗”。并凭空捏造什么朱大贵拉着队伍到太行山打游击，朱老明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胭脂金粉一个劲地向王明机会主义者脸上涂去，这就是梁斌的所谓“不受任何束缚”的真象。

梁斌一直打着歌颂群众斗争的旗号，这是骗人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

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而梁斌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去表现和歌颂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却放肆吹捧助纣为虐的王明路线及其追随者。可见，梁斌所谓的歌颂群众斗争是幌子，歌颂反革命的王明路线，才是他的真实目的。

梁斌在《红旗谱》《播火记》中，塑造、歌颂的所谓正面人物，不论是群众的代表也好，干部的代表也好，都是为歌颂王明路线服务的，他们不是拚命推行王明路线的狂热分子，就是盲目追随王明路线的忠实信徒。凡此种人，皆吹嘘为“英雄好汉”、“真革命”；否则，便诬蔑为“落后分子”、“胆小鬼”。书中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一曰贾湘农，一曰朱老忠，是作者精心雕刻、狂热歌颂的“英雄”。这是两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贾湘农，是作为贯穿《红旗谱》《播火记》两部书的“党的领导人物”出现的。他实际上是“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他继承着立三路线的衣钵，而在贯彻王明路线中又给以恶性发展。使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精髓，在他身上得到了更加具体而形象的表现。书中描写的历史事件，是三次盲动，三次失败，他三次逃跑。反割头税，“一轰而起，一轰而散”，根本不搞政治斗争，仅是满足中农以上的一点经济利益，却引来了严重的白色恐怖，他落荒而逃；二师学潮，盲目断送了几十名学生，他连个交代也没有，便逃之夭夭了；高蠡暴动，使几千人的队伍，一败涂地，他却为了自己活命，连残局也不收拾便溜之大吉！对这号人，毛主席作过一个很好的画像：“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贾湘农就是这样一个人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

更为恶毒的是梁斌在《播火记》中，竟敢盗用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硬往“左”倾机会主义者贾湘农脸上贴金。他苦心孤诣地让贾湘农手里拿着《游击战术》的书，在高鑫暴动的一次决策会议上，详尽地叙述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和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等问题。这是梁斌耍的一个大阴谋！他让贾湘农手里拿着《游击战术》，口里讲着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而偏偏到处都在打败仗。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大的诽谤！

更露骨的是，他赤膊上阵，恬不知耻地吹捧贾湘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革命的“英雄”，群众的“父亲”，“党的化身”，极力宣扬忠于贾湘农，就是“忠于党”；保卫贾湘农，就是“保卫党”，并歇斯底里地嚎叫：“只要跟着湘农司令，到什么时候，都会有路走的！”甚至当贾湘农断送了革命，在危机关头丢下群众只身狼狈逃跑时，梁斌还寄予无限深情，顶礼膜拜，借群众之口高叫：“天哪！苍天！你睁开眼吧！要保护湘农司令员福体健康，就算给俺庄稼人们降下吉星了！”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叛徒王明及其错误路线歌功颂德、祈祷祝福又是什么！

由此可见，梁斌所描写的“党的领导人物”，就是王明；他所颂扬的“党的路线”，就是王明路线。他是借贾湘农之尸，还王明之魂。

在梁斌的笔下，朱老忠是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高大的农民形象”来撰写的；是被周扬之流吹捧为“集中地体现了为党所启发、所鼓励的农民的革命要求”的典型。实际上，这是个被歪曲得不象样子的人物。

在朱老忠身上，根本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更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他周身灌注的是“闯荡江湖”的“豪侠义气”，不过是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绿林英雄”。这是早被毛主席批判了的那种“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

“党”所给他的“启发”和“鼓励”是什么呢？是不折不扣的王明路线。当他遇到贾湘农——所谓找到“党”之后，就第一个参加了反割头税运动，成为“左”倾盲动分子的得力助手。接着他就参加了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极力为王明路线奔走呼号。他对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贾湘农，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声嘶力竭地跟在贾湘农屁股后头摇旗呐喊，擂鼓助威，他对贾湘农“急行军冲击保定”的“左”倾盲动计划，“算佩服透了”。虔诚地向贾湘农表示：“你叫我上东”，“我不能上西”。看！他对王明路线是多么忠诚啊！可见，他的“忠”和“勇”、“智”和“谋”，他的闯荡江湖、豪侠义气，都是为王明路线服务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明路线的忠实信徒。

对这样一个人物，梁斌卖尽吃奶的力气，大肆吹嘘。炫耀朱老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鸡群里的凤凰”，农民的“主心骨”，“军事领袖”。甚至让农民一再给他跪下磕头，称他为“天神下界”。梁斌如此煞费苦心塑造朱老忠这个人物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证明王明路线是有“群众基础”的，是为贫下中农所“拥护”的。企图借贫下中农之口，招王明路线之魂。这是对贫下中农的极大歪曲和丑化。

两个人物，一主一奴，一唱一和，一个“吉星”、一个“天神”，两具僵尸，一个目的，就是为王明错误路线扬幡招魂，妄想使叛徒王明在政治舞台上死灰复燃。这是《红旗谱》《播火记》包藏的全部祸心。

梁斌为王明路线树碑立传，是由来已久的。早在一九三五年，他就开始写歌颂王明路线的反动作品，什么《夜之交流》、《三个布尔塞维克的爸爸》、《抗日人家》、《千里堤》、《五谷丰收》，先后抛出了几十万字，还觉意犹未尽，建国后，又“不分寒暑”，绞尽脑汁，“一气呵成”了两部大毒草。实现了他“必须



淋漓尽致而后快”的心愿。

一九五七年春天，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文艺界掀起为王明路线翻案的狂流的时候，刘少奇亲自跑到保定，狂叫什么“二师不错呀！有革命传统，有斗争历史。”刘贼在这里肯定的并不是二师真正的革命传统，而是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六二年，当我国遇到暂时经济困难，帝、修、反掀起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刘少奇又跳出来叫嚣什么“革命的胜利，是从城市到农村，还是从农村到城市，其结果都是一样，这不是原则问题。”更加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红旗谱》《播火记》就是在这两阵狂吹之中应运而生的。所以，当它受到革命同志的批评时，刘少奇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立即跳出来庇护，气势汹汹地说：“不管立三路线，还是其他‘左’倾路线……我看还是按照历史真实写，谁对就是对，谁不对就是不对！”“中央（应该作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编者）都说梁斌好，你们怎么说他坏呢？”可见，两部黑书及其炮制者梁斌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成了一种什么关系！

资产阶级的庇护，使梁斌忘乎所以。他又是写“代序”，又是抛“后记”，翻来复去地介绍他的所谓创作经验。一九六三年，梁斌在《播火记》“后记”中，直截了当地肯定了王明路线。他写道：“昙花一现的东西，未经肯定的东西，不能写进文学。”白纸黑字，不打自招。梁斌在这里公开宣称了他所歌颂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肯定”了的东西，因此，才“写进”了他的“文学”。紧接着他又自鸣得意地说：“文学作品也象一件有重量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后一代，使他们明白，历史生活是循着什么样的轨迹前进的。”这就赤裸裸地道出了他炮制两部黑书的政治目的，是妄图把王明路线标榜为“历史前进的轨迹”。党的“九大”政治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

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才是我们党的历史前进的轨迹。叛徒王明，三十多年来，从极“左”到极右，从献媚国民党反动派，到投靠苏修叛徒集团，一直是出卖革命、断送革命的历史罪人，这就是他的反革命轨迹。梁斌如此颠倒历史，混淆黑白，真是反动之极。

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文学艺术两个极其重要的批示，发出了向反革命文艺黑线开火的战斗号令。周扬胆战心惊，慌忙部署退兵的策略，亲自跑到河北召见梁斌，为他出谋划策。梁斌心领神会，马上变换策略，以守为攻，继续对抗。把刚刚出版的《播火记》的五十章之后，全部删掉。

不管梁斌耍什么花招，都无法掩盖《红旗谱》《播火记》这两株大毒草的反革命面目。《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红旗谱》《播火记》就是这样的反动作品。

“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卷席”之势，“横扫”了和正在“横扫”着一切枯枝败叶，魑魅魍魉。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他们妄想“传给后代”的“黑旗谱”、“鬼火记”彻底砸烂！连同刘少奇、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让王明、刘少奇之流哭泣吧！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万丈光芒，将永远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 两个躯壳 一个幽灵

——评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贾湘农

何 达

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梁斌炮制的《红旗谱》《播火记》就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反动作品。他打着描写“革命历史”的幌子，“专写错误路线”，为大叛徒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小说中精心刻划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名叫：贾湘农。

贾湘农何许人也？梁斌说：贾湘农是贯穿全书的“党的领导人物”，“正确路线的代表”，人民的“吉星”，群众的“父亲”。我们说，完全不对。贾湘农的丑恶历史表明，他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大叛徒王明的化身，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不服气吗？让我们翻开这两部大毒草，看看事实吧！

### (一)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这就造成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特别是经过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影响，造成了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毛主席英明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

但是，以大叛徒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王明主持的临时中央成立以后，这条路线更得到了恶性发展，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建立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幻想“由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贾湘农走的是哪条路线？从思想到行动，他狂热鼓吹、顽固推行的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制订出“到处点火，四面开花”等一套盲动计划。

从城市到农村，贾湘农一手策划的“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这两个盲动事件，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他不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他不是什么人民的“吉星”，而是革命的罪人。

对于在敌人长期占领的暗黑的城市，我们党的斗争方针、路线、策略等等重大问题，毛主席都做了极为英明、正确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在这样的地区，“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二师学潮在白色恐怖下发生。当时敌人对二师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撤换校长，查封学校，开除进步学生，并在反动报纸上公布了“政治犯”名单。在这种情况下，贾湘农策划、“领导”的二师学潮，不是“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而是“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在斗争的

策略上，不是“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而是采取了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把党的力量，党的组织公开暴露给敌人。敌人发愁对“政治犯”不能捕获归案，贾湘农就下令“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敌人怕这一批“政治犯”跑掉，贾湘农就一个劲地喊着“坚持”，帮敌人设下圈套；敌人的大屠杀还没布置就绪，贾湘农就一再指示：“现在是”和敌人“磨时间”的问题，替敌人争取时间。贾湘农就是这样，帮着敌人把一切部署完备，开始了血腥的屠杀，使保属地下党组织几乎遭到全部破坏，使革命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贾湘农在这个事件中充当了“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的卑鄙角色。

贾湘农一手葬送了保属地下党组织后，又匆匆忙忙跑到农村，策划高蠡暴动，开始了更严重的罪恶活动。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左”倾错误路线时，尖锐地指出：“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高蠡暴动时期，反革命势力正处于相对稳定时期。蒋介石的特派员钱大钧，坐镇保定，把持着北方的党、政、军大权。就军事力量来说，保定驻有陈贯义的十四旅，定县驻有骑兵十七旅，山海关驻有关麟征的机械化师，另有七县联合保安队，“肃反”总队等等。国民党政府、反动军阀和农村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控制了北方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命脉。二师学潮后，保属地区更是处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

我们再看看当时的革命势力。贾湘农匆匆跑到农村，根本不做深入的阶级发动和思想发动工作，在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只是一味煽动盲动主义情绪，提出：“我们要组织红军剿他们，你们敢不敢？”“打起仗来，你们怕不怕。”贾湘农组织起来

的队伍，根本不懂得为谁打仗，怎样打仗。其中有的甚至莫名其妙地发问：“这不成了土匪吗？和‘明火’‘劫路’有什么两样？”朱老忠是贾湘农依靠的得力干将，但他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时而想的是：“有个风吹草动，跳墙就跑”；时而又以亡命徒的嘴脸出现，要与敌人拚拚。这就是贾湘农所组织的革命力量。

贾湘农对当时敌我力量的估计是极端错误的。他“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错误地提出：“锁井镇地区的党员，阶级觉悟高，工作也很积极，你们提前开始游击战争吧！”在暴动开始时，他表现了极端的盲动主义；暴动起来以后，红军陷入重围，他不但不想法突围，却又表现了可悲的拚命主义，高喊什么：“新起的红军，有我无敌！”念念不忘“合击十四旅”，“冲击保定城”。就这样一直把几千人的革命队伍拚散、拚光，最后落荒而逃。

贾湘农又一次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绞杀了革命以后，他还说什么：“嗨，这一仗打了个痛快！”这真是只有最无耻的人，才能说出最无耻的话。对这一仗，谁感到“痛快”？只有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之流才感到“痛快”！贾湘农的这一句话，也正好撕去了他“左”派的伪装，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正如马克思所痛斥的那样，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大叛徒王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使革命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在城市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在农村损失百分之九十。如果对王明这段罪恶历史不太清楚，那就请看贾湘农的这段历史表演。这两个人物，一副嘴脸，都是绞杀革命的罪人。

## (二)

一切“左”倾机会主义者，“左”只不过是其表象，而其实质，

都是右的。他们或以极“左”来掩盖极右的本质，或以极“左”来达到极右的目的，或以极“左”来起到极右所不能起的破坏作用。斯大林对于右派和极“左”派作了深刻的分析：“右派和‘极左派’实际上是双生子，所以他们都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不同的只是右派并不经常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左派却经常用‘革命’的词藻掩盖他们的机会主义。”

大叛徒王明就是一个忽“左”忽右的家伙。他“左”起来“左”得出奇，右起来右得要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极“左”面目出现的。可是，曾几何时，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又一头栽进了蒋介石的怀抱。

反动小说中的贾湘农，也是一个“左”得出奇、右得要命的人物。他“左”起来确实比左还“左”，比革命还“革命”，一遇到紧急关头，常是举起右手，颤抖着说：“要斗争，斗争。”在敌人包围的情况下，红着眼珠子喊：“有我无敌！”看起来象一个了不起的“英雄”，而实质上是一个形“左”实右的家伙。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更暴露了贾湘农右倾机会主义的嘴脸。

伟大领袖毛主席精辟地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份。可以说：没有军队，便没有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贾湘农创建的所谓“红色政权”，是个什么货色？他把起义红军全部拉出去攻打保定。锁井镇剩下来支撑苏维埃政权的，只有一个瞎老头、两个姑娘、三个小孩。由这些人所组成的“苏维埃政权”，连村里都不敢住，在河套里搭了一个茅草棚，几个人相依为命。这哪里是什么“红色政权”，纯粹是贾湘农站在取消主义立场上对“红色政权”的极大诬蔑。

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是不相信革命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军事路线上，扩大红军不是采取从革命根据地和人民群众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方针，而是采取种种机会主义态度，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

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对建军问题作了极为英明正确的指示：“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的支援下，扩大人民武装“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毛主席这一建军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

贾湘农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推行“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错误路线，把希望寄托在土匪、白军、地痞、流氓身上。他安置曹局长的任务是：“专门团结那些地痞、流氓，和那些干‘明火’‘劫路’的家伙们”。他感到兴趣的是：“垮地一下子成立起来，把肃反总队变成我们的”。他看得“顶重要的一件事”，是张嘉庆去收编土匪李霜泗。他萦緲于怀的是，“十四旅有我们一个团”，“十七旅有我们一个连”等等。正因为他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当他听到定县车站那个连开走了时，“浑身打了一个冷战”，当他听到十四旅兵暴不成时，“由不得从脚底升起一股凉气，好象一股什么力量撼动他一下，心上微微抖动。”甚至在他心上，马上出现一种“可以动摇信心的想法”。这些都无情地揭露了他骨子里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实质。

贾湘农的右倾机会主义，还表现在他以过激的口号，来掩盖他的失败主义情绪。他一面狂喊着：“我们就要拆他们的台”，“掀他们的锅子”，一面却感到：“也许我们要失败”。贾湘农内心深处埋藏的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也正是他后来逃跑的思想基础。开始他以极“左”面目出现，这种失败主义情绪还可以掩盖



一下，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就一步步暴露无遗了。当运动遭到挫折时，他苦闷徬徨，惊慌失措；当运动失败时，他变成了逃跑主义。反割头税，二师学潮，高鑫暴动，他三次盲动，三次逃跑。我们从贾湘农的由“显”到“隐”的全过程中，可以清楚看到他“左”到右的全部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丑恶面目。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毛主席给王明的这幅很好的画像，拿来与贾湘农相比，何其相似乃尔！

马克思对机会主义分子痛斥道：“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贾湘农，就是工人党中的冒牌货，是工人阶级的蠢贼，是屠杀革命群众运动的罪犯。在《播火记》中，贾湘农还没走完自己的路，然而，大叛徒王明却在现实中走完了贾湘农的路，由“左”到右、当叛徒，最后认贼作父，投敌叛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就是他们的必然下场。这也就是历史对他们的严正判决！

### (三)

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贾湘农这个葬送革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家伙，梁斌是什么态度呢？他爱若珍宝，奉为神灵。他不仅赤膊上阵，直接称颂贾湘农是“一个有长期革命修养的人，在政策精神上表现了高度的准确性和高度的灵活性”，而且，把这种可耻的思想强加给

群众，让群众称他为“父亲”，拜他为“吉星”。是可忍，孰不可忍！

梁斌为了美化王明的化身——贾湘农，甚至卑鄙到不择手段的地步。他对于贾湘农的可耻失败，千方百计地为其寻找借口，进行辩护。他不只一次通过贾湘农之嘴散布什么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组织工作没有作好”等等。这实际上是为王明的错误路线开脱罪责。

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在贾湘农的错误路线遭到可耻的失败以后，梁斌还借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通过贾湘农的嘴翻来复去重复这段话：“高蠡游击战争，不只震撼全国，而且会改变目前中央苏区的形势，减少蒋介石对苏区的军事压力，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这段黑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尽管高蠡暴动失败了，然而，在南方它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北方它“播下了革命火种”。今天的胜利，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梁斌撒下的弥天大谎！

众所周知，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毛主席已被大叛徒王明排除出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但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红军中的影响是深入人心的。红军中一些指战员，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而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军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使这次反“围剿”遭到了极为严重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这段历史，雄辩地说明：王明是葬送革命的罪人。然而，梁斌却颠倒历史，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功劳记在大叛徒王明的簿子上，这只能进一步暴露他为叛徒王明的错误路线扬幡招魂的祸心。

总之，在《红旗谱》《播火记》中，梁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

立场上，对革命历史任意颠倒，对革命群众肆意糟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攻击，对大叛徒王明百般美化。这究竟是想干什么？结合着作品的内容和它出笼的背景，是不难看出其反动目的的。一九五七年当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文艺界掀起为三十年代王明路线翻案的逆流时，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跑到保定，大嚷：“二师不错呀！有革命传统，有斗争历史”；刘贼是真的赞扬二师的革命传统吗？不！赞扬二师革命传统是假，为王明错误路线翻案是真。一九六二年在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中，刘贼又跳出来叫喊：“革命的胜利，从城市到农村，还是从农村到城市，其结果都是一样，这不是原则问题。”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暴露了他妄图篡党复辟的野心。“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梁斌就是为刘贼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吹鼓手。

梁斌为刘贼篡党篡政的反革命需要服务，为什么抬出王明来？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重提历史事件，表现历史题材，都是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的。我们知道，早在三十多年前，大叛徒刘少奇就追随王明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用右的或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叛徒刘贼的罪恶历史和大叛徒王明的丑恶历史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为王明翻案，就是为刘贼的罪恶历史翻案，美化大叛徒王明，就是美化大叛徒刘少奇。他们抬出王明这具三十年代的政治僵尸，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妄图“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刘贼幻想的“历史新场面”是什么？一句话，就是复辟资本

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彻底粉碎了刘贼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为刘贼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反动作品《红旗谱》《播火记》，随着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场围剿反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的战斗打响了。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两部反动透顶的大毒草批深批透，随同它的主子一起，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

## 叛徒王明路线的忠实走卒

——评《红旗谱》《播火记》中的主人公朱老忠

何诗元 红 宣

历史上，任何阶级总要通过文艺塑造本阶级的理想人物，来为本阶级的专政服务，为本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朱老忠是反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中的主人公，是梁斌精心塑造的所谓“英雄人物”。这个朱老忠，曾被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吹捧为“十年来文学创作中第一颗光芒最明亮的新星，第一只羽毛最丰满的燕子”。朱老忠究竟是哪个阶级的“英雄”？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在文艺黑线所制做的“美丽的纱幕”后面立着的朱老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忠实走卒，货真价实的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

### 叛徒王明路线的狂热追随者

《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塑造什么样的英雄人物，是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斗争的焦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全力塑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赤胆忠心、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检验革命还是反革命，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大叛徒王明窃踞了党中央的领导，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用“一次革命”和“城市中心”的谬论，反对毛主席“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革命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危害，“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在这关系着中国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力挽狂澜，领导全党彻底粉碎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的航程。

梁斌笔下所谓“高大的农民形象”朱老忠，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究竟是站在哪一边的？是死心塌地站在王明路线一边，为错误路线摇旗呐喊。且看朱老忠在几次“左”倾盲动事件中的表演：

“反割头税”时，朱老忠虽然还是一个群众，但对“左”倾路线已是心心相印。江涛一提“反割头税”，他立即响应，高喊：“舍着咱八十年的拳房底子，上城里逛荡逛荡”，积极参加“飞行集会”，而且在县衙门前扮演了“闯帐”的角色。初次上阵就充分显示出朱老忠是“左”倾盲动路线的急先锋。

“高蠡暴动”时，朱老忠已经是“共产党员”，因为对贾湘农这个“党的化身”唯命是听，当上了“红军大队长”。他对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贾湘农，崇拜得五体投地，肉麻地吹捧：“我的老上级，我算是佩服你这两下子！你的领导，早在我的心里扎下根了。”是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确实在他心里扎下了根。贾湘农呼拉一下把党、团员全部抽走，取消党的地方组织，去进行“左”倾盲动冒险，朱老忠积极响应；贾湘农提出“合击十四

旅，打开保定城”的盲干口号，朱老忠“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兴奋的筋络都涨起来了”。朱老忠的每根“筋络”都与盲动路线息息相通，朱老忠的灵魂浸透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毒汁，他跟着贾湘农，领着队伍东闯西荡，把群众引向绝境。这就是梁斌所吹嘘的朱老忠“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什么“英勇”，这是毛主席早就批判过的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这种“勇”，是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狂热性和破坏性的表现，对革命危害极大。王明路线领导下的“高蠡暴动”，历时几天，使革命力量丧失殆尽，朱老忠实际上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帮助敌人绞杀革命的可耻角色。

再看梁斌所吹嘘的朱老忠的所谓“智”。朱老忠有一个口头禅，叫做“出水才看两腿泥”。在没有找到贾湘农这个“靠山”时，面对恶霸冯老兰，朱老忠想：“等着他，看着他”，“总有看到他败家的那一天，出水才看两腿泥”。每到关键时刻，他总搬出这个口头禅。这种所谓“智”，貌似革命的策略和“韧性”，其实是阿Q精神，是取消主义和失败主义。

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无产阶级英雄杨子荣，顶天立地，光彩照人。杨子荣之所以身处险境而临危不惧，面对凶敌而应付自如，就是因为他“胸有朝阳”。杨子荣的大智大勇来源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杨子荣的大智大勇就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锋陷阵的彻底革命精神。而朱老忠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根本对立，有什么智勇可谈！在无产阶级大智大勇的英雄形象杨子荣面前，朱老忠的丑恶本相暴露无遗。

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无产阶级英雄和群众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英雄扎根于群众之中，是群众的一员，又是群众的代表和榜样。无产阶级英雄必须善于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朱老忠和群众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凤凰”和“鸡”的关系，“救世主”和“群氓”的关系。梁斌借群众之口吹捧朱老忠是“鸡群里的凤凰，庄稼伙里的英雄”，唯恐不足，还特意渲染：“朱老忠回来，好象给严冬带来了春天，好象旱天逢甘雨，小屋子立时豁亮起来”。似乎没有朱老忠地球就不再转了。在“高蠡暴动”中，朱老忠不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宣传和组织群众，而是用“劫富济贫”式的流寇行径去愚弄群众，完全是一副“恩赐者”的姿态。尤其令人作呕的是朱老忠竟然以“天神”自居。“开仓济贫”之后，老猪他奶奶跪下向朱老忠磕头，喊着“咳！天神！天神！天神下界了！”朱老忠居然得意忘形，厚颜无耻地说：“乡里乡亲，过不着那个”。这哪里有半点无产阶级的气息！

“凤凰”和“救世主”式的人物与无产阶级的英雄不仅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水火不相容的。而这种对群众的“恩主”姿态，和作为王明路线驯服工具的特质则是完全统一的。把群众视同“草芥”，看做施舍对象，正是王明路线的反动本质所在。

### 灵魂丑恶的假共产主义者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无产阶级英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理想最远大，品质最高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们的世界观，是闪耀着“公”字光芒的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所谓“英雄”的根本标志。革命样板戏中的杨子荣、李玉和等英



雄人物，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英雄！

朱老忠究竟是什么思想体系的体现者？他所谓的“理想”又是什么货色呢？在梁斌笔下，朱老忠也有他的“共产主义”。“高蠡暴动”刚刚准备，朱老忠就夸下海口：“红军一起手，什么都有了”，“好日子来了，还有什么你的我的，都是老伙里的东西”。照梁斌的描述，这种“共产主义”“虽然没有人跟朱老忠说过”，可是早在“他心上融会贯通了”，而且他“自然会按着这些法则去处理问题”。

朱老忠心目中的所谓“共产主义”，是货真价实的假共产主义。所谓“红军一起手”就来到“共产主义”，完全是王明“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的翻版。所谓“什么你的我的，都是老伙里的东西”，实则不过是扩大了的个人私欲。暴露出他的灵魂深处，是个利己主义的王国。

朱老忠的利己主义世界观，还表现在他的所谓“一文一武”的主张上，朱老忠对严志和说：“你院里巴结个念书的，我叫大贵当兵去，这就是一文一武。你看大财主家的孩子，不是上学堂，就是入军队。”尽人皆知，大财主家的孩子上的是培养地主、资本家的后继者的学堂，入的是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效劳的反动军队。而朱老忠竟然对封建地主、资本家统治下的学堂和军队羡慕万分，照样仿效，可见，朱老忠的“一文一武”和无产阶级的“枪杆子”、“笔杆子”风马牛不相及，而和反动统治阶级反革命的“文武两手”却是一模一样。

朱老忠的那个“一文一武”，核心是“作官”，是光宗耀祖。运涛在北伐军中当了连长，朱老忠欢呼“作了官”，“‘起’咧‘祖’了”。大贵参加反动军队，朱老忠说：“说不定将来就是个军官咧！”对于朱老忠来说没有什么革命和反革命的分别，只要是“作官”，能“起祖”，一律欢迎，真是“官”迷心窍。朱老忠正是

妄想通过“作官”发财，换得地主阶级的“富贵荣华”，朱老忠卑鄙齷齪、利欲熏心的灵魂暴露得多么淋漓尽致！

朱老忠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突出表现在对待生和死的态度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李玉和，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从容对敌，视死如归。“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浩然正气，直冲云霄。李玉和是顶天立地的刚强铁汉，而朱老忠是地地道道的贪生怕死的软骨头。

朱老忠平时总是把“天不怕地不怕”挂在嘴巴上，可是一到革命紧要关头，他那怕死鬼的原形立刻毕露。什么“同志们不是这个落难，就是那个被捕，我心里怕了”，什么“自打运涛入了狱我心里也害怕了”。左一个“怕”，右一个“怕”，一个劲地悲鸣哀叹，惊惶万状。一听“马快班”里有了他的名字，象触电一样，马上想到一个“跑”字。又是“怕”，又是“跑”，怕死鬼的丑恶形象真可谓活灵活现。尤有甚者，在“二师学潮”中，当敌人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时，他“手脚战慄个不停，心里抖啊，抖得厉害”。眼见张嘉庆被反动派一枪打倒，他“偷偷站在一边看着”，“嘴唇打着颤，说不出话来”。朱老忠那种贪生怕死的恐惧、卑鄙的心理表现得何等充分，何等露骨。

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为了吹捧朱老忠，说他“有点象李秀成”，这倒是被他们说着了。岂止“有点象”，简直是象极了。象朱老忠这样一个灵魂丑恶的假共产主义者，叛徒的行列就是他的归宿，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

## 浑身匪气的江湖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

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自从人类划分为阶级以来，人与人的关系，都是阶级关系。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关系，是革命战友和阶级弟兄的关系。阶级利益高于一切，阶级情义重于泰山。《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无产阶级文艺塑造革命英雄形象，必须在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指导下，全力揭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鲜明的阶级爱憎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之间深厚的革命情义。

梁斌着力刻划的朱老忠的所谓“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性格”，和无产阶级英雄那种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党性立场是根本对立的。

朱老忠“闯荡江湖”，从关东回乡，一听严志和打输了官司，把胸膛一拍，说：“这天塌下来，我朱老忠接着。……有朱老忠的脑袋，就有你的脑袋。”回到锁井镇，一把洋钱扔给朱老明，叫道：“有朱老忠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朱老忠穿的，就有你穿的。”运涛入狱，朱老忠又是“血充红了脸”，对春兰说：“只要你肯等着，我朱老忠割了脖子，丧了命，没有翻悔，说什么也得成全你们！”朱老忠的这种“侠义性格”，纯粹是一种以个人恩怨为准则的狭隘的私人交情，是一种以金钱来往、吃喝穿戴为内容的渺小的私人情感。当严志和对于朱老忠要为江涛念书花钱表示过意不去的时候，朱老忠有一句话：“那将来，运涛回来，江涛念好了书，就不能帮助大贵和二贵？将来大贵和二贵有了孩子们，运涛和江涛能不巴结他们念念书？”寥寥数语，道出了朱老忠“侠义性格”的本质。不仅如此，朱老忠对阶级敌人也“讲义气”。在去地主冯老锡家和警察局抢枪时，竟然说什么“咱

是好乡亲，好邻居”，“是朋友的行个方便”。无产阶级英雄必须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革命战士，必须是仇视阶级敌人，坚决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而朱老忠则认敌为友，居然在地主和反动警察那里找到了“讲义气”的“朋友”，他的“侠义性格”到底是什么货色便一目了然了。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通过对李玉和一家祖孙三代深厚的阶级情义的描绘，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他们的结合，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旗帜下，团结战斗，共同对敌的。所以，他们才能“前赴后继走向前”，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气贯长虹的革命气节。相比之下，朱老忠以“讲义气”“交朋友”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用来处理敌我关系，他的这种“侠义性格”的阶级实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无独有偶。《播火记》中还有个土匪头子李霜泗，他的性格乃至语言，和朱老忠竟是如此毫无二致。李霜泗不也是口口声声“重义气”，“重友情”，“为朋友两肋插刀”吗？不也是“闯荡江湖”的人物吗？一样的满嘴黑话，一样的浑身匪气，都是江湖客、绿林汉。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象朱老忠之类的人物，正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推行“招降纳叛”，在政治上推行“左”倾盲动，在军事上推行流寇主义的社会基础。但梁斌却说：“在旧社会来说，这样的人就容易靠近、奔向党的怀抱。”什么“容易靠近、奔向党的怀抱”，分明是“容易靠近、奔向机会主义路线的‘怀抱’”！

《红旗谱》《播火记》中的朱老忠，就是这么一个死心塌地效

忠王明路线的无耻丑类，这么一个满脑子利己主义的卑鄙角色，这么一个满身匪气的江湖侠客。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为什么对他大加吹捧呢？不正是因为他适应了大叛徒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需要吗？现实的阶级斗争告诉我们：文艺斗争从来都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文艺舞台总是政治舞台的缩影。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阶级对阶级的专政，离不开文艺。而在文艺作品中塑造什么样的主要人物形象，又是体现一定阶级的专政的重要手段。敬爱的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英雄的光辉典型，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发挥了强大的革命威力，从根本上结束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在文艺舞台上的反革命专政，彻底摧毁了刘少奇利用文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迷梦。让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所炮制的朱老忠之类的丑恶形象见鬼去吧！无产阶级文艺将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沿着革命样板戏所开辟的光辉道路，全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的光辉形象，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把彻底消灭帝、修、反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

## 《保卫延安》——利用小说 反党的活标本

文红军 左红兵 新北文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代理人、反党阴谋家彭德怀，就是毛主席所痛斥的这样一个反党的大“发明”家。长期以来，他在野心勃勃地大抓枪杆子的同时，也狠抓反革命的笔杆子。为了替自己篡党篡军制造舆论，他收买一些反党文人，通过各种文艺形式，篡改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反党小说《保卫延安》，就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例。

《保卫延安》是在彭德怀的亲自策划、支持下炮制出来的。一九四八年秋，野心勃勃的反党阴谋家彭德怀接见了这部黑书的作者，对他写的一些直接间接地为彭德怀捧场的战地通讯大加夸奖，进而要他用文艺作品来“好好反映一下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情况。”主子垂青赏识，奴才心领神会。这部黑书的作者“听到彭总的当面指示”以后，就“下定决心，不管能力高低，一定要写一部书”，好让人们去“瞻仰”这个反党野心家的形象。在小说写作过程中，彭德怀及其亲信为作者提供了种种方便条件。小说出笼之后，彭德怀特意召见小说作者，给予盛情款待，夸奖他在文学事业上的“成功”。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反党野心家，是多么重视这部大毒草在为他篡党篡军制造舆论准备方面的作用！

## 颠倒历史、贪天之功的大骗局

一九四七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这一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特别是在西北战场上，毛主席亲自指挥陕北军民，粉碎了蒋匪帮二十几万兵力的重点进攻，从而使我军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反党小说《保卫延安》却恶毒地篡改这段历史，一笔抹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作用，无耻地美化、吹捧反党老手彭德怀，极力为他捞取反党的政治资本。这就清楚地暴露了小说作者的罪恶目的以及彭德怀一伙篡党篡军的狼子野心。

在小说《保卫延安》中，作者竭尽谄媚之能事，把彭德怀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吹捧为“伟大的军事家”、“天才的军事家”、“西北战场的统帅”、“意志和力量铸成的人”，把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统统归之于他，把整个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丰功伟绩统统归之于他，说什么：“彭总指挥部队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彭总把敌人提到这里，拉到那里，直到把敌人拖得七死八活的时候，狠狠地猛扑过去，把敌人一网打尽”，“一切都在彭总的意料之中”，……甚至肉麻地称彭德怀为“善于在艰难困苦的关头扭转一切危机局面”的了不起的人物。

历史不容颠倒！举世闻名的延安保卫战，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部署和直接指挥的。彭德怀不但没有“在艰难困苦的关头扭转一切危机局面”，相反，每到这种关头，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一边来加剧“危机局面”。当着蒋介石、胡宗南以重兵向延安疯狂进犯的时候，就是这个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搞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彭德怀，又提出要“在延

安大门外斩断敌人魔爪”这一“左”的机会主义主张。在这一关键时刻，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出了极为英明的决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和敌人生打硬拼，而应运用我军的有利条件，诱敌深入，采取“蘑菇”战术，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而歼灭之。在我军撤离延安之前，毛主席就预先布置我军以一支小部队引敌人主力到安塞方向，而以我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敌人的侧翼。结果，在刚离开延安的第六天，就吃掉了敌军三十一旅。彭德怀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军阀，却根本不能理解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思想。青化砭胜利之后，他不肯再和敌人周旋下去，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要我军立即北上打榆林，或南下攻敌后，急于同敌人决战。毛主席当即复电批判了彭德怀的这种军事冒险主义思想，指示我军继续采取原来的办法，同敌人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使敌人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正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部署和调度下，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我军才先后又在羊马河和蟠龙镇打了两场十分漂亮的胜仗。

在这些战役中，彭德怀任意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使战斗险遭失利。就拿蟠龙镇攻坚战来说，当镇内敌人一度凭着坚固的工事和猛烈的炮火顽强抵抗，而小部分敌援军也逐渐逼近的时候，作为前线指挥官的彭德怀，竟然动摇害怕起来，想掉头就走，几乎使我军这次作战前功尽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向广大指战员发出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的战斗号令，终于攻下了蟠龙镇，歼灭了胡宗南的王牌军李昆岗部七千多人，并且获得了大批给养。同过去的青化砭、羊马河战斗一样，蟠龙镇战役也完全是克服彭德怀的错误指挥才取得胜利的。至于成为西北战场转折点的沙家店战役，更是由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战斗



前，毛主席直接召集作战会议，制订作战方案；战斗打响之后，毛主席彻夜不眠，亲自用电话指挥作战。为了诱敌北上，毛主席从攻打榆林时起，亲自带领几百名中央机关人员和警卫战士，同五、六万蒋匪军周旋，最后把敌人牵引到预定的作战区域——沙家店东北的黄河边上，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这里表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所特有的“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惊人胆略。而彭德怀，不仅在沙家店战役的第一阶段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佯攻榆林的战略指示，而且在沙家店战役后，又背着毛主席擅自决定第二次攻打榆林，再度给我军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扯破了彭德怀及其心腹们吹嘘的所谓“天才的军事家”的谎言。

整个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完全是毛主席英明指挥的胜利，是毛主席光辉的人民战争理论和实践的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战胜彭德怀的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

反党小说《保卫延安》篡改历史，颠倒黑白，一笔抹煞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同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只字不提彭德怀的错误和罪行，相反，对他百般美化，极力吹捧，甚至偷天换日，将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延安保卫战的胜利，统统记在彭德怀的名下，把毛主席光辉的战略思想，完全移植到彭德怀身上，妄图使之贴金成佛，真是无耻之极。这是一个为大野心家彭德怀策划的篡党篡军制造舆论的大阴谋，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大骗局！

### 肆意诽谤我们伟大领袖的大毒草

一九五二年，彭德怀在“接见”反党电影剧本《延安保卫战》的编剧人员时曾说：“中央留在陕北，就是为了吸引敌人。”这

句黑话充分暴露了这个大阴谋家的反党野心。他早就把陕北解放战争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功劳”，从根本上否定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留在陕北的伟大意义。反党小说《保卫延安》很投彭德怀的“意”。书中从头到尾，只字不提毛主席在此重要历史关头对全国解放战争的英明指导作用，只字不提毛主席留在陕北指挥军民一起奋战所给予群众的巨大鼓舞，反而在具体描写中别有用心地突出渲染我们伟大领袖受人保护这一点。在第六章《沙家店》中，作者一面竭力宣扬彭德怀如何出入枪林弹雨，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另一面，作为对照，精心安排了一段在这紧急的决战时刻，在我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还得把纵队警卫连派去保护毛主席的情节。作者运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把毛主席和党中央写成西北战场的一大包袱，把彭德怀捧到九天云上。

小说作者为了达到贬低毛主席、抬高彭德怀的罪恶目的，伪造历史，编造谎言，无所不用其极。小说开头描写在我军撤离延安的当夜，敌人“已经进到城南的七里铺”，这时，许多“等着出发命令的人，不停地望着”“王家坪半山坡一个窑洞”的灯光，那里，据说彭德怀和指挥员们还在研究作战部署。与此同时，小说又用灰暗低沉的色调，描写毛主席在“战斗部队”保护下，从枣园村那边悄悄地离开了延安。经过这样一番对照之后，作者借我军指战员的口写道：“天明敌人就可能到延安，可是彭副总司令还在这里！”而“我们中央机关和毛主席，大概撤退到延安北边什么地方了！”一褒一贬，何等鲜明！小说炮制者在这里的罪恶企图，就是妄想把彭德怀这个小丑美化为肩负中国革命重任的“统帅”，是扭转战局的伟大人物；而真正在战斗前夜运筹帷幄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人。其用心何其毒也！

事实上，我军撤离延安前，王家坪那盏照彻全国的不熄不灭的灯光，不是什么彭德怀的，而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从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前夜起，毛主席为了有力地指导战局，特地由枣园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来住。胡宗南匪帮进犯延安期间，毛主席不顾敌机野蛮轰炸，在王家坪亲自部署和指挥了七天七夜的阻击战，消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蒋、胡匪帮“三天占领延安”的美梦。三月十六日，敌军付出巨大代价后，进抵金盆湾、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的大门。然而，王家坪依然彻夜亮着灯火，我们敬爱的领袖泰然自若，坚持指挥全国和全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日夜操劳。直到三月十八日晚，敌人窜到延安城郊，枪声已清晰可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同志才离开延安。小说的炮制者狗胆包天，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歪曲历史真相，贬低我们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历史作用，他们的反动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小说大写黑话，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例如，书中写了连长周大勇和李振德老汉的一段对话。李老汉说：“咱们毛主席一算就知道敌人的心思啦”，“毛主席在那里划个圈，敌人走到那里就倒楣。”这本是陕北人民对毛主席无限信仰的最真挚的感情，而作者对此却很反感，他借周大勇之口，冷冷地说：“没有这么回事”，“照你的说法，毛主席就成了神仙啦！”竭力否定毛主席的英明预见和英明指挥。这样还不够，作者又特意通过周大勇的内心活动向人们解释：“我军能打胜仗，那是因为凭着怎样的军事思想。”这里所说的“怎样的军事思想”，就是全书极力宣扬的“彭总思想”，是属于彭德怀这个所谓“伟大的军事家”的。小说炮制者对待我们伟大领袖和对待他的黑主子，是何等的“憎爱分明”！

小说《保卫延安》就是这样一部秉承彭德怀的意旨，肆无忌惮地诽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毒草。

## 射向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的大毒箭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保卫延安》的炮制者出于他反动的政治目的，却把彭德怀打扮成“救世主”，把边区人民群众和我军广大指战员糟蹋得不成样子。

出现在《保卫延安》里的陕甘宁边区的一般群众，不是害怕国民党军事进攻的软骨头，就是等待彭德怀派人去拯救的可怜虫。

请看，小说把延安人民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的疏散丑化成了什么样子：“田地里到处是被打坏的车子、农具、家具，还有衣服、被子、棉花，正在吐火冒烟”；“女人尖锐的喊声，孩子们的哭声”；“老乡们老的老，小的小，去逃难，可是逃到哪里去呢？”……

请看，小说把延安人民面临蒋匪帮进攻时的精神状态歪曲成了什么样子：“老太太望着大车上的尸首跟受伤的孩子，失魂落魄地发呆”；“成千上万的老人、妇女、娃娃，带着苦难和失去亲人的痛苦，向前走去。他们沉重的脚，趟起了漫天尘土”；“唉，仗要打到什么年月，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这哪里象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党领导下的有计划的撤退？这哪里象英雄的延安人民？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对人民的莫大污蔑！

陕北人民群众长期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懂得我军主动放弃延安的战略意义。在胡宗南匪帮的进攻面前，延安人民从

容不迫，处之泰然。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们战斗在一起，他们心里感到无比踏实。他们满怀胜利的信心，组织起来，坚壁清野，让敌人吃不上，喝不上，只落得一座空城。在整个陕北战争中，他们支前，带路，配合正规部队作战，严密封锁消息，使敌人到处扑空挨打，对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保卫延安》的作者出于他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却故意违背这一历史事实，制造出一幅所谓人民“逃难”的凄惨图画，以便压低人民群众，衬托和抬高彭德怀的形象，好让他成为拯民于水火的“大救星”“大英雄”。这就是作者恶毒而又卑劣的用心。

出于同样目的，这部反党小说对我军战士也进行了严重歪曲。作者所描写的许多指战员形象，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而是所谓“彭总怎样决定，我们就怎样执行”的活机器。他们被安排在那里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众星拱月般地突出全书真正的中心人物彭德怀。除了旅长陈兴允经常肉麻地吹捧彭德怀之外，小说描写战斗英雄王老虎经过一场血战，处于昏迷状态中，想到的竟然不是别的，而是他自己又当上了战斗英雄，朦胧地感到“彭副总司令向他走来了，眼里闪着又严肃又亲热的光……”（看，作者为了吹捧彭德怀，把英雄人物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团参谋长卫毅在战场上考虑的，也是“彭副总司令在望着他，要求他把最大的忠诚拿出来。”快板歌手李江国一再编唱：“彭总撒开满天网，又抓俘虏又缴枪。”连长周大勇则用他的行动体现了彭德怀那套单凭军事、硬拼硬杀的资产阶级货色。小说炮制者曾经煞有介事地声称，他要探索“什么力量使我们的战争获胜？什么力量能使那些看来平凡的人，做出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保卫延安》提供的答案是：“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自彭德怀。看，《保卫延安》的炮制者

是何等的肆无忌惮！他们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达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的军队，是按照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创立起来的伟大的军队。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我军指战员心中的红太阳，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是我军战无不胜的精神源泉。《保卫延安》的炮制者却妄图把彭德怀的反动思想打扮成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把彭德怀这个小丑吹捧为我军广大指战员精神力量的源泉，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这个大军阀篡党篡军的政治野心！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小说为了迎合彭德怀篡夺军权的狼子野心，竟然把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作为进身礼品，送给了这个野心家，称他们为“彭总的战士”。这是对一个野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反党阴谋家所唱的肉麻的赞歌。而在这赞歌声中，我们的战士和革命群众都被当成了祭品。我们在这里要严正警告彭德怀以及《保卫延安》的炮制者：不许你污蔑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士永远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忠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江河不会倒流，彭德怀想让我们战士归你个人所有，这是痴心妄想！

###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作

《保卫延安》直接鼓吹彭德怀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军事路线，以对抗和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事路线。这是小说反党罪行的又一重要方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纲领，历来都是主张用政治统帅军事，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的。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小说《保卫延安》则反

其道而行之，拚命地鼓吹军事第一，实际上是鼓吹资产阶级的反动军事路线，把参加陕北战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别有用心地写成一支只顾打仗的单纯军事力量。它不但没有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任务，而且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一窍不通，完全不懂毛主席提出的主动放弃延安的伟大战略意义。当部队听到我方暂时撤离延安的消息后，指战员们一个个都恸哭起来，狂喊狂叫：“拚呀！拚呀！”“我们豁出来咯，拚呀！”这简直是对我军政治工作的莫大的嘲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总结解放战争经验时曾指出：西北作战之所以取得一系列胜利，原因很多，“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文中，毛主席也着重指出部队“三查”“三整”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到“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打着反映这一时期西北解放战争旗号的小说《保卫延安》，却丝毫没有表现我军开展的这些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小说虽然用极其有限的篇幅写了周大勇自发的诉苦场面，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介绍一下周大勇的身世，完全不是作为一项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政治运动来写的。小说里描写的一些我军政治工作干部，如团政委李诚等，实际上只是贯彻彭德怀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工具。李诚津津乐道的，就是单纯的练习军事技术。作者之所以在部队的战斗间隙不厌其烦地大写练兵，让干部和战士的精力都贯注在单纯军事技术的提高上，无非是想说明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胜利，而是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胜利。彭德怀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一贯地反对在军队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胡说什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各级干部

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保卫延安》所宣扬的打仗单凭军事、不靠政治的资产阶级货色，也正是彭德怀这种反动观点的大贩卖，是为彭德怀妄图使我军演变为反革命复辟工具的目的效劳的。

毛主席在许多著作中，历来都把人民的游击战争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毛主席还一再教导我们：“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彭德怀这个老牌机会主义者，始终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片面强调正规部队而极力抹煞游击队、人民武装地方兵团的作用。全国解放以后，彭德怀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支持下，打着所谓“正规化”“现代化”的幌子，疯狂地反对大办民兵，反对所谓“游击习气”，疯狂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小说《保卫延安》的炮制者同主子彭德怀一样，蓄意贬低人民游击战争的作用。全书百分之九十九的篇幅都是写正规部队的活动，丝毫也看不到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陕北解放战争中的贡献。书里提到的唯一的一支游击队，则是一些不会打仗、一切全靠正规部队扶持的人，根本不是能征善战、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的人民英雄。小说作者企图通过这样别有用心地描写，使人产生一种假象：延安保卫战的胜利，既不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也不是广大陕北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而只是所谓“西北战场的统帅”彭德怀指挥的这一支正规部队的功勋。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人民群众的污蔑，更是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最露骨的攻击！



## 彻底砸烂彭德怀的黑纪念碑

《保卫延安》这株反党的大毒草在一九五四年出笼并且大量印行，这决不是偶然的。一九五四年二月，我们党举行了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罪行。作为高、饶反党联盟实际领袖的彭德怀仍然贼心不死，暗中更加紧了活动，进一步为自己篡党篡军捞取政治资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保卫延安》正是彭德怀采取“以攻为守”策略，加紧反党阴谋活动的一个工具和信号。果然，经过几年处心积虑的准备，到一九五九年，这个反党阴谋家便赤膊上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正在这时，西安上演了根据反党小说改编的话剧《保卫延安》，替彭德怀的反党活动擂鼓助威。在党的庐山会议彻底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进攻并且罢了他的官之后，斗争并没有完结。直到一九六二年，歌颂彭德怀的反党话剧依然被作为重点保留剧目在各地演出，反党小说则继续在一些刊物上受到吹捧。这一切都是受到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支持的，是他们篡党篡国的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刘少奇在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九年两次为彭德怀的进攻做掩护，一九六二年前后又亲自为彭德怀翻案，并且策动炮制大毒草《海瑞罢官》，鼓励彭德怀东山再起。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冯雪峰之流，更是老早就跳出来大捧特捧反党小说《保卫延安》。文艺黑线的另一个头目林默涵，到一九六四年还说《保卫延安》是“好书”，鼓励作者把它扩充修改成四、五部长篇巨著，妄图使彭德怀永载史册。斗争就是这样尖锐复杂，惊

心动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进行生死搏斗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彭德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彻底批判反党小说《保卫延安》，砸烂彭德怀的这块黑纪念碑，彻底清除它的流毒。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 《保卫延安》是一株反党的大毒草

解放军某部 红 哨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英明地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实质，有力地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卵翼下的大小野心家、阴谋家制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党活动的要害。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军内的代理人，高、饶反党联盟的实际头目彭德怀，就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一大“发明”家。在他亲自授意、多方支持下炮制出笼的反党小说《保卫延安》就是一个为他反党篡军制造舆论、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黑标本。

### 一幅反党野心家的丑恶“肖像”

反党小说《保卫延安》的要害在什么地方？早在这株毒汁四溅的大毒草刚刚出笼的时候，臭名昭著的大右派冯雪峰就一语破“的”：小说的“史诗意义”在于“画出了彭德怀将军的这一幅肖像”，“真实地反映了彭德怀将军的精神”。那么，究竟画的是什么“像”，反映了什么“精神”？让我们剥开画皮看一看它的真面目。

《保卫延安》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从一九四七年三

月我军主动撤离延安、至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军转入反攻这段历史。当时的情况是，人民公敌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遭到彻底破产以后，为了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又向我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所谓“重点进攻”。在敌众我寡、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伟大领袖毛主席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革命胆略和伟大的军事思想，英明地预见和分析了形势，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战争，使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二十三万敌军，犹如一群冲入火阵的野牛，晕头转向，处处挨打，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被我军消灭近十万人，我军即从战略防御胜利地转入解放大西北的进攻。但是，反党小说《保卫延安》却在这无比辉煌壮丽的历史天幕前，演出了一场偷天换日、颠倒黑白的大丑剧。它用篡改历史的卑劣手法，一笔抹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扭转乾坤的伟大作用，无耻地把大野心家、阴谋家彭德怀捧上“统帅”的宝座，极力为其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捞取反党的政治资本。它在“把彭总的企图变成战士的决心，把战士的决心变成胜利”这个反动主题贯穿下，使所有事件、全部人物都围绕着“彭总”这个中心人物而旋转，众星拱月似地捧出一幅反党篡军野心家的丑恶“肖像”。

小说一开头，就居心险恶地描写了两种情景：一边是在“天地间是黑漆漆的一片”的气氛中，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撤退”的队伍，正在“向延安东川缓缓地移去”；而另一边却是“王家坪半山坡一个窑洞的窗子，让灯光染成淡红色”，彭德怀正在那里“镇定地”部署和指挥作战。一明一暗，一褒一贬，何等鲜明！小说妄图用这种颠倒黑白的描写，告诉读者：毛主席处在被保护的地位，仗刚一打响，就已经“撤退到延安北边什么地方去了”，而肩负着“西北战场全盘责任的重担”的彭德怀，才是扭

转战局、保卫延安的“统帅”。这是一场颠倒历史、欺世盗名的大骗局！

铁的历史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开创了陕甘宁边区，点燃了延安这座照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灯塔，并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早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四个月之前，毛主席就英明地预见到：“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在敌人的进攻刚开始不久，又英明决策：“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并号召全体军民“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在延安保卫战打响的前两天，毛主席为了更有力地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特地从枣园搬到王家坪解放军总参谋部。在王家坪那永不熄灭的灯光下，毛主席亲自指挥了延安南线七天七夜的阻击战，粉碎了蒋、胡匪帮妄图“三天占领延安”的迷梦，直到三月十八日深夜，即我军全部撤离前十多个小时，毛主席还在这里接见了延安地区部队团级以上干部，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撤离延安后，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直转战在陕北，亲自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和西北解放战争，成为全国人民和西北人民胜利的希望。他以“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雄才大略，亲自率领党中央首脑机关几百人，牵引着五、六万敌人，迫使敌人错误一犯再犯，最后集中优势兵力，逐步歼灭了大量被拖得精疲力尽的敌人。历史证明，由于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才保卫和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拯救了陕北人民。彭德怀妄图利用一

纸谎言，贪天之功为己功，一笔抹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作用，不过是枉费心机。狂犬吠日，太不自量；反革命面目，欲盖弥彰！

小说还用大量篇幅，通过青化砭、羊马河伏击战和蟠龙攻坚战等几个重大战役的描写，不遗余力地吹嘘彭德怀的所谓“指挥艺术”和“军事天才”，把他吹嘘成为什么“天才的军事家”、“西北战场的统帅”等等，在这个反党篡军野心家的头上加上了一道又一道光圈，戴上了一顶又一顶桂冠。这样还嫌不够，为了贴金成佛，小说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剽窃，把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统统贴上所谓“彭德怀思想”的标签，记到彭贼名下，真是达到了无耻的极点！

众所周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善于按照战争规律指导战争的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被生动运用的一个光辉典范。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了战争的规律，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使胡匪从进犯延安的那一天起，就象一匹被套上鼻圈的牲口，按照毛主席早已划定的路线，走到毛主席预定的地点，被我军消灭。毛主席给敌人早就布好了天罗地网。我军撤离延安刚六天，就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歼灭战；不到四十天，就迅速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辉煌胜利。这一切，都是毛主席英明指挥的结果，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而这时的彭德怀，利用他在军内窃取的领导权，不仅不执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反而在每个关键时刻总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进行对抗和破坏。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之前，他提出“在延安大门之外斩断敌人魔爪”的冒险主张；青化砭伏击告捷后，他违反毛主席的“蘑菇”战术，企图北上打榆林或南下攻关中，急于同敌决战；蟠龙攻坚战打响后，由于镇内敌人顽抗和敌人小股

援兵将来，他竟准备掉头退走，几乎造成重大胜利战机的失误；沙家店战役后，他背着毛主席擅自决定第二次攻打榆林，再度给我军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延误了把战争引向外线的时间。铁的事实撕碎了“天才的军事家”的画皮，把彭德怀这个老牌机会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沙家店战役，是扭转西北战局的决定性战役，也是反党小说《保卫延安》用以美化彭德怀的重要篇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该书于一九五六年再版时，在这一章里，增添了一个情节，让彭德怀这个一贯贪生怕死的家伙，在沙家店战斗攻打敌三十六师指挥所的最紧要的关头，出现在我军最前沿的团指挥所，进行面对面的“指挥”，把他美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狂妄地叫嚣：“彭总……伟大的军事思想被生动运用而产生了战争的转折点——从防御转入反攻。”

事实果真如此吗？完全不是！人们清楚地记得，正当胡匪象热锅上的蚂蚁，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年七月，亲自主持召开了小河会议，部署了沙家店战役。战斗打响后，毛主席住在离沙家店十几里的梁家岔，彻夜不眠，亲自指挥，直接掌握前线的一切情况，甚至连前沿战士工事挖得怎样都一一问到。这一战，一举歼灭蒋匪王牌三十六师，扭转了西北战局，使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的转折关头，领导着西北军民和全国人民，“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它已把《保卫延安》精心描绘的所谓“西北战场的统帅”的“肖像”撕得粉碎，连同那反党野心家本人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 一条篡军反党的反动黑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科学地、精辟地总结了我军建设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这是我军的生命线，革命战争的胜利线。我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每一页历史，无不闪耀着毛主席伟大军事思想的灿烂光辉。

但是，作为反映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史实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不去歌颂边区军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指引下，为人民解放事业创建的奇勋，闭口不提我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取得的伟大胜利，却明目张胆地大肆宣扬反党篡军野心家彭德怀的所谓“军事思想”，狂热鼓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借此抽掉我军的革命灵魂，篡夺我军的政治思想领导权，使之成为反党野心家手中的工具。真是猖狂至极，反动透顶！

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灵魂，是我军战无不胜的决定因素，是我军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头脑，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核心。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军就会改变性质，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然而，《保卫延安》在洋洋三十万言的庞大篇幅中，没有一处歌颂毛泽东思想，有的只是诋毁和诽谤。书中有一段触目惊心的对比：我军一个高级干部，说他对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几年来看了至少有十几遍”，“花费了很多力气以后才能比较深刻地领会一点”；同是这个人，在听了彭德怀的一席话之后，却感到：“他的一句话，一投入你的脑子中，你那很多模糊感觉到而说不出的凌乱、片断的经验，便联贯起来了，系统了，明确



了，提高了。”多么恶毒的对比！在这一褒一贬之中，充分暴露了彭德怀之流疯狂仇恨和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狼子野心，活脱脱地反映了他们妄图用彭德怀的所谓“军事思想”取代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狂妄心理。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主席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给我军指明了一条用无产阶级政治建设军队的光辉道路。我军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壮大，胜利前进的。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否把毛泽东思想贯注于军队之中，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焦点，也是无产阶级军队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

反党小说《保卫延安》公然打出军事第一、技术第一的黑旗，诋毁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小说卖力吹捧的“彭总”，的确是“文如其人”，除了到处卖弄军事技术外，根本不懂得政治工作，也从来不过问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本不了解指战员的思想。他手下的一班人马，从高级指挥员到战士，都对政治不感兴趣，满脑子“单纯军事观点”。团政治委员李诚，是个只管军事的“政工干部”。他“要政治处所有干部赶快把‘评纪律’的工作结束”，然后“集中力量搞练兵工作”。其他指挥员，也都是一提起练兵，就“觉得浑身都是力量，脸上闪过兴奋的光”。至于周大勇率领的所谓“英雄连队”，更是只知道硬拼硬杀，盲目蛮干，对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和战略部署毫无所知。当他们听说我军要撤离延安时，便感到“天昏地暗”，只知道“捶胸慟哭”，只知道“拚呀！拚呀！”“我们豁出来咯，拚呀！”所有这些描写，正是彭德怀一贯反对在军队中坚持无产

阶级政治挂帅，极力鼓吹所谓“部队军事成绩的优劣，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的反动谬论的形象化注脚。纵观全书，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作用不见了，我军一整套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不见了，广大指战员高度的革命觉悟不见了，满篇写着的就是练兵、打仗，打仗、练兵，干部津津乐道的是军事技术，战士一心向往的是打仗拼命。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夺了我军的魂，篡了我军的权，专了我军的政。这完全适应了彭德怀妄图篡夺军权、演变我军的反革命需要。

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要搞资产阶级政治。小说用许多笔墨写了又写的所谓“政治工作”，正是这种货色。什么战士“努力的目标”就是要“象连长和指导员那样，打仗指挥百把人，平时背个驳壳枪多威风”，什么当上战斗英雄就“比普通人升高了一级”，提拔你当干部是因为“你有超过平常人的精力”……够了，够了，难道这不明明是在用资产阶级的“名利地位”、“物质刺激”来腐蚀瓦解我们的部队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如何看待人民和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分水岭。

英雄的陕甘宁边区人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伟大的西北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用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战争，给部队送情报，封锁消息，坚壁清野，把敌人困死，饿死。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指引下，边区人民组成无数支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箝制和消灭了敌人大

量有生力量，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是，这一切，在反党小说《保卫延安》里，被歪曲和丑化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边区的人民被诬蔑成一群“穷家难舍，熟土难离”的难民，一伙听到打仗就“失魂落魄”的怕死鬼。书中仅有的一支小游击队，也被写成乌合之众，敌人来了，谁也不顾谁，各自逃命；打起仗来，连敌人也没看清就乱放一通枪，“瞎糟踏子弹”；见到敌人连气也不敢吭，据说“一喊，敌人就知道咱们不是正规军”。我们的部队也只是行军，打仗，宿营，练兵，根本不“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反而鼓动群众逃避战争，把家搬到山沟躲起来，“免得东奔西跑，担惊受怕”。总之，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被淹没了，埋葬敌人的“汪洋大海”不见了，人民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和伟大力量被抹煞了，人民军队的职能和本质被歪曲了，一条光芒四射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被偷换成一条不要群众、不要人民战争、不要无产阶级政治的军阀主义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正是反党野心家彭德怀一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的真实写照。

谁人不知，彭德怀这个老牌机会主义分子，在混入革命的三十余年间，一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狂热推行一条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反对毛主席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忠实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和王明狼狈为奸，在华北根据地积极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反动谬论，无耻吹捧独夫民贼蒋介石是“抗日的英明领袖”。从解放战争到建国以来，他更加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反对全民皆兵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正规化”、“现代化”的幌子下狂热推行一整套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保卫延安》一再鼓吹的所谓彭德怀的“军事思想”，正是他三十多年来喋喋不休吹烂了的资产阶级、军阀主义黑货的集大成。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竭力为彭贼歌功颂德的《保卫延安》，恰恰成了他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有力罪证。

### 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

反党小说《保卫延安》的出笼和大肆泛滥，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而延续十多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

大野心家、阴谋家彭德怀以及支持他的刘少奇一伙，凭着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能，深深懂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重要。因此，他们在大抓枪杆子的同时，始终不忘抓笔杆子。早在一九四八年中国革命即将走向全国胜利之际，彭德怀野心勃勃，数次接见了《保卫延安》的作者，当面指示他“好好反映一下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情况”。于是，反党小说便开始积极准备、加速炮制出笼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使它的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疯狂和狡诈。彭德怀和高、饶反党联盟暗中勾结，阴谋篡党篡军。与此同时，为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保卫延安》，也在加紧炮制之中。彭、高反党集团的主要干将习仲勋亲自给予关照和支持。作者也被调进北京，用一年多时间专门对小说进行修改，并得到老右派分子冯雪峰的青睞，亲为其审稿，将书名改成《保卫延安》。经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反党小说公然于一九五四年党中央揭露和粉碎高、饶反党联盟两个月之后、适应彭德怀掩护自己、以攻为守的反革命策略的需要出笼了。仅几年光景，这部反党小说竟一版再版，发行达百万余册，流毒全

国。

在这一阵阵反革命的紧锣密鼓声中，反党急先锋彭德怀得意忘形，赤膊上阵，抛出了杀气腾腾的“意见书”，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三面红旗猖狂进攻。

耍尽威风、出尽风头，走到绝路上的彭德怀，终于给自己准备好了垮台的条件。在党的庐山会议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彻底揭露了他的反党阴谋，给了他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正如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此后，彭德怀贼心不死，在刘少奇一伙的纵容和支持下，一次又一次掀起翻案妖风。为他树碑立传的反党小说《保卫延安》也并没有销声匿迹，一有风吹草动，便有人把它捧将出来，改头换面，送上舞台，一而再，再而三地发泄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疯狂仇恨，为已倒了台的反党野心家彭德怀扬幡招魂。

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和大叛徒刘少奇及其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之流围绕《保卫延安》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通过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来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它使我们认识到，要从政治上打倒反动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还不是最困难的事情；而要彻底清除他们的流毒和思想影响，却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气力，经过长期的努力。因此，在阶级完全灭亡之前，我们要始终牢牢掌握革命大批判这个锐利武器，在斗争中提高鉴别力，分清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而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坚持无产

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陕西日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 一部狂热鼓吹刘少奇叛徒 哲学的反动小说

——批判《战斗的青春》

冀 向东

一九五八年，一个名叫孙振(笔名雷克)的反革命小丑，抛出了一部反动小说《战斗的青春》。小说一出笼，立即博得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赏识。小说一版再版，吹捧的文章连篇累牍，又是搬上舞台，又是改编成电影剧本，鼓鼓噪噪，煞是热闹。

一本小说，为什么会得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如此重视呢？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周扬在得意忘形之际，一语泄漏了这个“天机”。周扬说：《战斗的青春》“很好，好就好在把区委书记写成叛徒。”

周扬的吹捧，从反面道出了这本书的要害。

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已经公之于众的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资产阶级司令部大肆吹捧这部大毒草的真实目的，就不言而喻了！他们的所谓“好”，就是“好”在它狂热地鼓吹了刘少奇的叛徒哲学。

### 叛徒的赞美歌

《战斗的青春》写的是所谓冀中平原抗日战争的故事。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区委书记胡文玉，就是一个叛徒。

叛徒，是为了一条卑贱的生命而跪倒在敌人脚下的历史罪人，是靠出卖革命、出卖同志，向敌人摇尾乞怜的癞皮狗。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描写叛徒，必须揭露叛徒卑鄙污浊的灵魂，谴责叛徒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批判叛徒活命第一的腐朽的人生哲学。

《战斗的青春》却反其道而行之。整个作品中，作者对叛徒胡文玉不是无情的揭露，愤怒的斥责，猛烈的鞭挞，而是狂热的吹捧，无限的同情，百般的辩解。在胡文玉叛变之前，作者肉麻地为这个资产阶级的大少爷叫好；在胡文玉叛变之时，作者想方设法为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开脱；在胡文玉叛变之后，作者还明目张胆地为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翻案。十分清楚，作者想用这些硬抹上去的脂粉，掩盖叛徒脸上罪恶的血迹；想用这套卑劣的手段，使叛徒逃脱革命人民的严厉审判。

请看，在胡文玉叛变之前，孙振是怎样为这个资产阶级的花花公子歌功颂德的。

胡文玉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富商家庭，从小过的是公子哥儿的浪荡生活。因为不满意父母的包办婚姻，他离开家庭，混进了革命队伍。他没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却很快入了党，并当上了区委书记。对于这样一个灵魂深处还是资产阶级王国的知识分子，小说没有一点揭露，没有一点批判，相反，却从外表到灵魂竭力加以美化。在孙振的笔下，胡文玉是一个出类拔萃、不可多得的好干部；他“魁伟俊秀”，“举动潇洒”，“干净利落”，“显得十分精明强干”；他“工作上有魄力，有办法”，一到区上“就生龙活虎地干起来，工作特别活跃”；他“坚持发动群众展开反资敌斗争”，获得了“最突出的成绩”；工作上，他不辞辛苦，常常“三夜不睡”，废寝忘食，生活上，他爱护同志，“知冷知热，处处关心”……。在孙振狂热的吹捧下，胡文玉俨



然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

强盗杀人，有一套强盗逻辑；叛徒为自己开脱，也有一套叛徒的理论。大叛徒刘少奇曾经说过：“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人……本来是真想革命的，但是后来当了叛徒。”按照这种逻辑，叛徒过去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只是“后来当了叛徒”，自然有“功”也有“过”，叛徒就成为“功过相抵”的可以原谅的人了，或者简直是“功大于过”的“英雄”了；按照这种论调，叛徒“本来是真想革命的”，只是“后来当了叛徒”，自然他的叛变没有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他可以“站过去”，也可以“站过来”了。《战斗的青春》贩卖的正是刘少奇的这套货色。叛变前的胡文玉，不就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英雄”，“真想革命”的“好汉”吗？这完全是欺人之谈！是作者夫子自道的叛徒赞美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无产阶级看来，叛徒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蠹虫和投机分子。为了卑怯地求活而跪倒在敌人的脚下，正是他们丑恶灵魂的总暴露，正是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质的总暴露。对于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来说，有什么“功劳”可讲？有什么“真想革命”可言？刘少奇和孙振一伙大肆美化叛徒的历史，目的是想用叛徒的“功绩”来掩盖他们自己的叛徒罪行，用“偶然的失足”来抹煞他们自己及其同伙背叛革命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粉饰他们的叛徒行径。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们不过是将自己的叛徒嘴脸公诸于众，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 叛徒的辩护士

为了保命而跪倒在敌人的脚下，出卖革命，出卖同志，出

卖自己的灵魂，这是永远不能饶恕的罪行，这是永远不能洗刷的耻辱。《战斗的青春》的炮制者却站在叛徒的立场上，使尽力气为叛徒的变节行为辩解，千方百计为叛徒的叛卖行径遮丑。

为了宣扬“叛变无罪”，孙振精心编造了一个“不自觉”叛变论。小说的第一版是这样描写胡文玉的叛变的。在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的大“扫荡”中，胡文玉与党失去了联系。在“无目的”的“漂流”中，他“稀里糊涂”地落进了特务赵青兄妹的圈套，“不知不觉”地被他们拖下了水。当胡文玉“发觉”自己已经成为叛徒时，“突然面容惨白，垂下眼皮，身上打了两个寒战”，“好象是在做梦”。甚至在游击队发现了他的叛徒罪行，把他拘留以后，他还惶乱地喊道：“我什么也不理解，我现在完全不明白我是怎么回事，……我是个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好一个“不理解”、“不明白”、“不知道”！三个“不”字，表明胡文玉的堕落是何等的不自觉；三个“不”字，表明胡文玉的叛变是何等的不情愿；三个“不”字，表明胡文玉对自己叛徒的命运是何等的委屈和不平。胡文玉真的“不理解”、“不明白”、“不知道”吗？不对！革命与反革命，界线清楚，壁垒分明，难道“不理解”？出卖党的组织，帮助敌人建立反革命的秘密武装，和特务赵青一起密谋暗害游击队……，自己干了什么勾当，难道“不明白”？在革命队伍中混了一阵，为了一条狗命，不惜向敌人屈膝，从狗洞里爬出来，自己是什么东西，难道“不知道”？什么“不自觉”，这是叛徒用来掩盖自己嘴脸的遮丑布，逃避人民审判的遁词！孙振用“不自觉”叛变论来为叛徒鸣冤叫屈，证明他与胡文玉是一丘之貉！

为了宣扬“变节有理”，孙振大肆鼓吹活命哲学。小说的第三版是这样描写胡文玉的叛变的。日寇大“扫荡”那天，他被伪军抓住了。在敌人的威逼下，他感到十分恐怖。他“仿佛看见

了自己的血污的尸体”，他仿佛觉得自己“真的就要死了”。正是在这种生死的关头，他在敌人限定的最后一分钟里，“突然象掉在海里的人抓住救生圈一样抓住了钢笔，在自首书上签了字”。

好个“仿佛看见了自己的血污的尸体”！难道为了保住脑袋，就可以丧失革命的气节，出卖自己的灵魂吗？这完全是从刘少奇那里贩来的。刘少奇胡说什么共产党员要有“自爱心”，要“钟爱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在他看来，个人就是一切，脑袋就是一切，只要能“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什么党的利益，什么革命的原则，什么民族的尊严，统统都可以出卖。他还厚颜无耻地散布说：“在某种转变关头，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要发生一些动摇和变化是很自然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刘少奇这一整套无耻透顶的活命哲学，其实就是他一生叛卖革命的“经验之谈”。

对于这种为叛徒辩护的反动谬论，孙振是很能心领神会的。胡文玉不正是在“某种情况下”，“发生一些动摇”，才乖乖地在自首书上签字的吗？不正是为了“钟爱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才投到敌人的怀抱中去的吗？不要脸的人说出不要脸的话，刘少奇和孙振是那些可耻叛徒的可耻的辩护士。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是对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热情赞美，也是对那些活命第一的可耻叛徒的严厉斥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我们党的光荣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是冲锋陷阵的勇士；在暗无天日的敌人的监牢里，是坚贞不屈的硬骨头；在刺刀对着胸口的刑场上，是脸不变色心不跳、视死如归的英雄。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

可丢。他们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孙振不去歌颂这些真正的英雄，却按着刘少奇的调子，极力兜售叛徒哲学，大肆鼓吹活命第一，公开为叛徒胡文玉的投降变节行为开脱，真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

## 叛徒的翻案书

叛徒既然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将受其叛徒立场所制约。

然而，在《战斗的青春》里，这一切都变了样。作者大肆渲染胡文玉叛变后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极力颂扬胡文玉的所谓赎罪行为。

对敌人的屈膝，就意味着对革命的背叛。《战斗的青春》里的胡文玉，却是个“特殊”的叛徒：他投降了敌人，却与敌人貌合神离；他背叛了革命，却对革命依依不舍。你看，他身在敌人据点，心还向着游击队，对于敌人的胜利，他只是“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更使人不能容忍的是，在胡文玉叛变之后，孙振还让胡文玉说什么“共产党抗日救国总是真心真意的”，表示胡文玉的心还是真诚的，思想还是革命的。胡文玉投敌变节，表明他已成了残杀革命者的刽子手，成了革命人民的死敌，孙振硬要把一个叛党分子写成对党一片真心，真是颠倒黑白，漫天撒谎！

对革命的叛卖，就意味着对敌人的忠心。《战斗的青春》里的胡文玉，却是个“特殊”的叛徒：他不是死心塌地地追随敌人，而是在痛心地批判自己的堕落和罪恶。你看，这个叛徒已经认识到自己“给敌人开了名单，写了宣传品，罪恶更深了”，已经觉悟到自己“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可怜虫”，活着“没有价值”，死了“也毫无价值”了，已经深深感到对不住游击队，“没

有脸”见他们了。他悲痛欲绝地呼喊：“给我一条回头路！”叛徒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可以出卖党的事业，可以出卖革命的原则，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根本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孙振却硬把一个厚颜无耻的叛徒写成一个“知耻”、“后悔”的人物，真是可恶至极！

孙振极力把胡文玉打扮成一个当了叛徒还念念不忘革命的“二重人格”的人物，力图为叛徒翻案，这是枉费心机的。所谓的“二重人格”，不过是刘少奇的“对敌人忠实，对党也忠实”的谬论的翻版。事实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叛徒，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对党的忠实是假，对敌人的忠实是真。叛徒胡文玉的种种忏悔式的表白，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叛徒嘴脸罢了。

为了给胡文玉树牌坊，在小说结尾，孙振竟然丧心病狂地让这个已经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汉奸、刽子手“良心”发现，想用枪打死日本队长渡边，以此“赎回自己的罪过”。不料渡边发现了胡文玉，先开了枪，打伤了胡文玉。你看，在孙振的笔下，这个叛徒、汉奸、刽子手不是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英雄”了吗？

由“真心革命”到“偶然失足”到最后又“悔过自新”，这就是孙振为叛徒胡文玉树碑立传精心安排的三部曲。

孙振这样描写，不是什么“新创造”，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里兜售的是刘少奇的“一念之差”论。刘少奇曾经公开说：“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他要反动，也是‘一念之差’。我们就有很多共产党员，本来是真想革命的，但是后来当了叛徒”，“就个人来讲，是可以自由的，可以站过来，也可以站过去，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也可以不革命。基本问题是一个想头，一念之差的距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孙振真不愧为刘少奇的忠实门徒，他完全按着刘少奇这种叛徒理论来塑造胡文

玉的形象。你瞧，胡文玉多“自由”，他今天还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明天就成了敌人的顾问，后天呢，忽然又由叛徒变成了“英雄”，而这中间都不过是“一念之差”！

什么“一念之差”！完全是胡说八道。革命和反革命之间，难道仅仅是“一念之差”、“差之毫厘”吗？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和那些可耻的叛徒，是根本对立的。前者“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们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后者为了活命，为了一己的私利，就可以跪倒在敌人脚下，出卖革命、出卖党、出卖自己的灵魂。这难道仅仅是什么“一念之差”的距离？不！这决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孙振通过胡文玉的形象，狂热地鼓吹刘少奇的“一念之差”论，企图把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打扮成“英雄”，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用心何其毒也！

孙振为什么不去歌颂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人物，而去歌颂那些不齿于人类的可耻叛徒呢？现在已经查明，孙振本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跪倒在敌人的脚下，也是从敌人“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出来的可耻叛徒。同病相怜，物伤其类，难怪孙振要肉麻地为叛徒胡文玉唱赞美诗，难怪孙振要声嘶力竭地充当大叛徒刘少奇叛徒哲学的吹鼓手！

这样一部露骨地宣扬叛徒哲学的大毒草，当工农兵群众在一九五九年奋起批判时，为什么那些“大人物”要利用权势，调动力量，疯狂镇压，不准批判呢？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揭穿了这个谜底。原来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不仅早在一九三六年就亲自策划一批人向敌人自首，而且他自己也曾数次跪倒在帝国主

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脚下，是个无耻的大叛徒。刘少奇为了庇护以他为首的那个隐藏在党内的叛徒集团，长期以来，大肆宣扬叛徒哲学。在他的掩护下，一小撮无耻的叛徒打扮成“老革命”的模样，混进了我们的党、政领导机构，窃取了重要的领导职位。刘少奇通过招降纳叛而拼凑起来的这个反革命别动队，在党内形成了一个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篡党、篡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战斗的青春》极力美化叛徒，归根结底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刘少奇和在他的包庇下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变新中国为旧中国，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以刘少奇为首的隐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揪了出来，剥去了他们“老革命”的外衣，使他们显出了老反革命的原形。无耻透顶的叛徒文学《战斗的青春》，也随着它的主子的灭亡，而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 刘少奇叛徒哲学的黑样板

——批判反动小说《战斗的青春》

驻沪空军 卫红鹰

长期以来，刘少奇苦心经营了一个叛徒集团，还呕心沥血地炮制了一整套叛徒哲学。《战斗的青春》是宣扬刘少奇叛徒哲学的一个黑标本。它在文艺黑线头目阳翰笙的直接指使和策动下，由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内的刘金，伙同叛徒孙振（雪克），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多次密谋策划，经过五年的精心炮制，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在上海出笼的。毒草一出笼，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文艺黑线的头目就喜笑颜开，鼓掌喝采：“好书！好书！道道地地的好书！”在这群魔鬼的喧嚷声中，接连再版，印刷十七次，发行一百零七万两千册，并且编成剧本，到处放毒。

这部黑书出版后，上海文艺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予以痛击。一九五九年七月，在上海作协举行的第二次讨论会上，姚文元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小说是歌颂叛徒、美化叛徒的大毒草。这个批判，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一下子触动了刘少奇黑司令部的中枢神经。阎王殿的二阎王周扬马上到上海，指使他的喽罗进行反扑。同时面慰叛徒孙振，拍着胸脯大叫：“我是支持你的”，你要“更大胆”，“更放手”地干。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派陈丕显，这个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也连声说“好书，好书”，并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式，恶狠狠地下令：“谁批判这本书，就



要检讨。”

为什么会惊动了这么多“庞然大物”，象屎克螂见了粪堆一样，群起为这株大毒草保驾呢？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不打自招地供认：《战斗的青春》“好就好在把区委书记写成叛徒”，“写了三级叛变”，最能“教育”青年一代。几句黑话，再清楚不过地从反面道出了其中的奥妙，也点明了围绕这本书展开的激烈斗争的焦点。原来，《战斗的青春》精心刻划的“英雄”许凤（孙振原来把小说订名为“凤姐”），就是宣扬了大叛徒刘少奇的叛徒哲学，这也就是全书的要害。

### 怕死的“英雄”

许凤，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作者叛徒孙振说她是庄严地象座雕像的英雄；反动小说的吹捧者、反革命小爬虫刘金，则誉她为“精神境界极高的英雄形象”。然而奇怪的是，就是这个被吹捧得天花乱坠的“英雄”，却是道道地地的怕死鬼。全书从许凤开头出场到最后蹲进监狱，始终具有顽固地活命第一的“精神境界”，活龙活现地显示了一个怕死鬼的“雕像”。

许凤当枣园区的乡亲们遭到敌人“第一次袭击”的时候，她就撇开当地革命群众，连滚带爬地“狂奔”起来。她“化了装”，“混在人群中间，一阵急跑”，当她累得跑不动时，“心想躺下等死算啦。又一想，不，不能！还是咬牙坚持着跑。”与大叛徒刘少奇一样，面临着敌人，都是无耻的逃兵，可是，这本书的作者居然把她描写成为“英雄”。无怪乎《战斗的青春》的吹鼓手们夸奖孙振写“绝处逢生”有“点石成金”的本领，看来一点也不算过分。

许凤由于怕死的“精神境界”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她怀疑周围的一切人，她在枣园区内游动，活象只惊弓之鸟，“行动十

分秘密”，时而“突然出现”，时而“不翼而飞”，“谁也摸不到她的规律”。甚至当游击队开会时，她和她的哼哈二将秀芬和小曼，总是形影不离，“一个在左，一个在右”，“紧紧跟在身后”，唯恐丢掉狗命。

贪生怕死，活命第一，是投敌叛变的思想基础。一切怕死鬼，在敌人的法庭上、牢房里必然要成为叛徒，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大叛徒刘少奇没有违背这个逻辑，他多次投敌叛变，用同志的鲜血换回了自己一条狗命。许凤，当然也不会例外。尽管作者玩弄了一个反革命障眼法，没有公开让她从狗洞里爬出来，不过，叛徒孙振是决不会过于“歪曲”他主子的“英雄”形象的。剥去伪装，露出真相，人们就会发现，许凤身居牢房，并不打算同敌人如何斗争，她想的是“活着出去”，“向往那自由的生活”，羡慕的是“象那黄雀一样海阔天空地去飞翔”。许凤所想的“活着是美好的”，究竟美在那里？好在何处？这一点，大叛徒刘少奇在抗日根据地里，耍的那套装病引诱、隐瞒年龄、软硬兼施、骗取女护士的鬼把戏是一个绝妙的回答。许凤活着也就是干的这个。小说开头，许凤就和“匀称的高个儿，干净爽利，举动潇洒”的胡文玉一见钟情，一日不见，就象掉了魂似的，连做梦说胡话也害怕胡文玉死掉。甚至在胡文玉自首叛变后，许凤见到他还“一颗心不禁热呼呼地跳起来”。只是当她发现胡文玉已经和小鸾勾搭上之后，才“气得浑身直抖”，马上掉转身去，又和新来的游击队长李铁勾搭上了。这哪里有一丝一毫革命干部的气味！分明是一个满脑子塞满了“爱情至上”、争风吃醋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叛徒孙振所以要大肆渲染许凤“爱情”生活的缠绵悱恻，同时又很不自然地往她身上堆砌一些“英勇”、“坚强”的词藻，戳穿了，就是要力图通过许凤来宣扬“革命加恋爱”的反动邪说，以蛊惑人心，腐蚀青年，达到潜移默

化、和平演变的罪恶目的。什么“革命加恋爱”？完全是在搞反革命！

## 叛徒的“政委”

许凤，不仅仅是个怕死的“英雄”，没有公开降敌的叛徒，按照小说中游击队长李铁的话说，她还是一个“够格的政委”。究竟她是哪一家的政委？够的什么格？剥开画皮一看：她“关心爱护”的是叛徒，推销的是刘少奇的叛徒哲学。许凤这个叛徒政委的所作所为，与刘少奇这个叛徒“司令”的一言一行，完全合拍。

翻一翻刘少奇的丑史，巧得很，书中的许凤大搞叛卖勾当的那个年月，也正是刘少奇炮制叛徒哲学最起劲的时候。大叛徒刘少奇继一九三九年抛出那本黑《修养》之后，四十年代初期又集中编造了一系列黑文，例如：《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关于建党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等等。和盘托出了他的“叛徒经”。叛徒的“政委”许凤手捧这本“叛徒经”，口传身教，上了三节“政治课”。

第一课叫“被迫自首”论。

刘少奇大言不惭地说：在敌人面前自首是“被迫”的，是因为“被敌人抓到了，强迫他非自首不可”的，甚至“做特务”也“大部是被迫的”。这种奇妙的“被迫”论，刘少奇自己是身体力行了的，所以，胆敢那么“理直气壮”。许凤由于明显的原因，不可能直接了当地脱口而出。但是，在孙振那枝“神来之笔”的描绘下，通过叛徒胡文玉和杜玉良的配合，终于使许凤“成功的”上好了这一课。

区助理员杜玉良，在敌人面前签字画押，当了叛徒，又接受敌人密令回来，搞特务活动，身为区委书记的许凤，明知他

“特别接近”内奸赵青、蔡二来，竟然很“诚恳地”用“那温和善良的眼神”对他说：“你被捕以后，尽管有人说你叛变了”，“那不是事实”，“不过，你的表现有些软弱就是了”。就这样，妙语回春，竟把叛徒的罪责推得干干净净，把大叛徒刘少奇的“被迫叛变”论表达得淋漓尽致。

更有甚者，当胡文玉这个叛徒在许凤面前“悲痛地”诉说自己是因为一时“动摇”而被迫“走上歧途”的经历时，许凤竟然“心如刀刺，热血翻滚”，“咬咬牙”才“忍住感情”。这是什么“感情”？难道不正是胡文玉的感情，不正是大叛徒刘少奇“被迫叛变”的感情吗？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艰苦的环境，死亡的威逼，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正是锤炼革命意志的大好时机，回顾历史，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或是刀光血影的刑场，无数革命先烈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遵照毛主席“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教导，排除万难，勇往直前，面对魔鬼的屠刀，慷慨陈词，对死高歌，表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革命品质和英雄气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低下高贵的头。只有那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才会在敌人面前出卖灵魂，出卖革命。叛徒就是叛徒，那有“被迫”和“自愿”之分！刘少奇和许凤妄图用“被迫”叛变的外衣来掩盖其叛徒的狰狞面目，其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越搞越臭。

第二课叫“一念之差”论。大概是因为许凤对刘少奇“叛徒经”里这方面的内容最有研究，所以这节课她现身说法最具体、最生动。

例如：她一旦发现胡文玉政治上“可耻的动摇”，马上就细心的“觉察到了胡文玉在暗自懊悔、惭愧”、想象他“内心斗争一定很激烈”。这种细心的觉察、丰富的想象，一方面，固然说明了许凤作为“政委”对叛徒“思想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她对刘少奇提出的叛变“基本问题是一个想头”的论点有深刻的理解。

又如，当叛徒胡文玉已经公然投入日寇怀抱，并且“领着敌人都快把咱们的堡垒户烧光了”、“地道也快给破坏完了”的时候，许凤突然又想起了胡文玉，竟然当着她的新情人李铁的面，“叹息”这个“象是很革命的人”，想不到“一阵狂风”打得“左右摇摆”。妙就妙在这“一阵狂风”“左右摇摆”八个大字，简直把刘少奇的又一个论点：“一念之差”，“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体现得活龙活现。

什么“一念之差”？叛变就是一生之差！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差！刘少奇之流在敌人面前“差”了过去，以后，他们隐藏在党内几十年，打着“红旗”反红旗，坏话说尽，坏事干绝，一天也没有“差”过来。刘少奇用他本人的实际行动，打了他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把从他嘴里吐出来的“一念之差”论顶了回去，同时，也给许凤狠狠的一脚，把她从“一念之差”的讲台上踢了下去。

第三课叫“继续革命”论。刘少奇反复叫嚷，叛徒可以“继续革命”。理由呢？说是“因为他们翻个筋斗，以后可能不再翻筋斗”。所以“是更加可信的”，甚至“还可以在革命事业中建立功勋”。大叛徒刘少奇的这个叛徒哲学，“女政委”许凤原封不动的用上，并加上她的示范和发挥，使这堂课也颇有声色。

当胡文玉叛变以后，回到枣园区，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的时候，许凤认为他“究竟还是同志”，对他的所谓“个人主义”感

到“难受”、“耽心”，“不能不提出”批评，“帮助他进步”，还“分配他工作”，劝他“忘记过去”，“振作起精神来”。胡文玉居然没有辜负许凤的期望，下了决心，要“做出点成绩来叫你许凤看看”。说到做到，后来他真的“踏踏实实地整了整几个村的工作”，“的确做出了成绩”。

寥寥数语，刘少奇的那套“继续革命”的谬论又被许凤讲得形象化了。

什么“继续革命”？这是继续反革命！刘少奇及其同伙彭真、安子文之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以后，究竟干了些什么？他们革的什么命？革了谁的命？他们革了无产阶级的命！他们的出“洞”之日，就是无数革命同志被他们出卖之时，就是许多党的组织被破坏之时。他们革了中国人民的命！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和蒋该死干了出卖国家民族的可耻勾当。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大搞交枪投降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全国解放后，他们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几十年来，他们在“继续革命”的烟幕弹后面，搞的是什么鬼，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他们正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来对待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他们的反革命本性决定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其结果，只能是遭到可耻的失败。

### 宣扬刽子手的“功勋”

在孙振的笔下，不仅叛徒许风能变成巾帼英雄，而且还描绘她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作者不惜笔墨，用了“光荣的孤立”这整整的一章来描写许凤在错误路线的重重包围下，面对着绝大多数干部的错误指责，慷慨陈词，神气活

现，似乎是站在鸡群中的一只矫“凤”，真是光荣的孤立。她并且神通广大，居然使枣园区“打开了局面”，成了根据地的“模范区”，建立了卓著“功勋”。

要知道许凤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请翻开小说，再往下看看“云开雾散”这一章。枣园区天空乌云滚滚，游击队连遭惨败，一个个蜷缩在玉米地里，一筹莫展，以期待的眼光仰望着“北方”。正在这个时刻，许凤来了，用她那“纯净”、“清脆”的声音，把带来的“北方局”的“指示”，一字一句地送到人们的耳朵里。于是，人们“由沉闷到明朗、到喜悦，最后都咧着嘴笑了”，“高兴地相互捶打着脊梁”，顿时“云开雾散”，见了“青天”。

原来，许凤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就是早已声名狼籍、臭不可闻的刘少奇的“北方局路线”。事实上，以许凤为首的枣园区委，就是刘少奇的“北方局”的缩影。她“打开的”只能是国民党“曲线救国”的“局面”，她建立的只能是帮助日寇屠杀人民群众的刽子手“功勋”。

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北方局路线”，是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想当初，窃取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一到天津，就假借中央名义，给关押在敌人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下黑指示：“你们可以履行自首手续。登报，写反共启事出狱”。于是几十个叛徒，从狗洞里爬了出来。使北方局成了叛徒、特务、土匪、野心家，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的大黑窝。

孙振笔下的枣园区委，也是这样的一个大黑窝。区委书记许凤本人是个没有公开下跪的叛徒，她的前任胡文玉，原来是个纨绔子弟，叛变投敌后成了日寇的走狗，原游击队长朱大江、李铁是没有政治头脑、紧跟许凤指挥棒打转转的绿林好汉，游击队指导员赵青则是打进来的特务，区委副书记江丽是“林黛

玉”式“名门闺秀”，许凤的保镖、区妇女部长秀芬则是整天“恨不得马上结婚”的恋爱迷。

枣园区由这么一堆乌龟王八蛋组成的“领导班子”，又同北方局连在一根藤上，许凤有了困难就找县委书记周明，周明有了困难就找地委魏书记，魏书记有了困难就跑到路西找刘少奇手下的黑干将彭真。显然，枣园区委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叛党投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刘少奇无耻已极，后来还居然吹嘘北方局在他那条路线的指导下，“创造”了比“马列主义还好”的经验，即所谓“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和“以特反特”的两点经验。这两点“经验”，也都在许凤为首的枣园区委得到了形象化的贯彻。

在日寇残酷扫荡面前，许凤不是坚持武装斗争，而是叫八路军骑兵排长高铁庄把枪埋起来，到“据点”里去，当伪军的“分队长”，并“派遣”赌棍嫖客窦洛殿打入敌人内部，通过“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了解情况，“拜盟结义”，联络“头面”人物。大搞所谓“合法斗争”，刘少奇的那条“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经验，通过许凤的发挥，表现得更加具体更加迷人了。

刘少奇的那套“以特反特”的鬼把戏，许凤也耍的不错。胡文玉叛变以后，许凤仍百般信赖，大胆使用，胡文玉工作干出了“成绩”，许凤还从“内心里感到满意”，予以表扬鼓励。对于已经投敌叛变的游击队员高升，发现他的“良心谴责”以后，也是坚信不疑，委以重任。

许凤死心塌地兜售刘少奇的反革命经验，不折不扣地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根本违背毛主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教导，依靠象寒露那样的地主婆、谢长君那样的富农分子，丢掉枪杆子，不是发动革命人民打一场人民战争。因此，在敌人



反复“清剿”面前，枣园区人民只有束手待毙，任其宰割。这里，连叛徒孙振也难自圆其说，不得不承认，“在敌人的铁蹄践踏的平原上”，“尸首遍地，血流成河”，“滹沱河边的人们被杀光了”，枣园区“毁灭”了。许凤，就是这样把枣园区人民活生生的推向日寇的屠刀之下，许凤，是个比胡文玉更阴险，比日寇军官宫本还凶残的人物，她做了胡文玉、宫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不过，这些与其说是许凤的卓著“功勋”，倒不如说是大叛徒刘少奇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写照，在人们眼前，刘少奇这个双手沾满了冀中平原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的凶相，不已跃然纸上了吗？

——《战斗的青春》\*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通过对《战斗的青春》和书中许凤的剖视，可以说：这部宣扬叛徒哲学的黑标本，是由一个叛徒执笔，按照叛徒头子刘少奇的模样，塑造了一伙“好”叛徒，说出了许多叛徒想说而没有说出的心里话，它必然要得到一窝大小叛徒的赞赏。这部黑书是紧密配合刘少奇推行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为他的叛徒集团篡党篡政篡军，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株大毒草，也是一些叛徒赖以藏身隐相的一张隐身符。因此，把这本黑书端出来，痛加批判，肃清它的流毒，对于开展对敌斗争，深挖叛徒、特务、反革命，以及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必要的。

——《战斗的青春》\*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战斗的青春》\*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战斗的青春》\*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战斗的青春》\*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战斗的青春》\*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战斗的青春》\*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战斗的青春》\*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战斗的青春》\*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李西\*

## 叛徒小说出笼前后的一场政治斗争

李 新 弓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早在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围绕反动小说《战斗的青春》出笼所展开的一场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是一场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的政治斗争。

反动小说《战斗的青春》的作者孙振（笔名雪克），早在一九五三年就计划炮制一部美化叛徒、宣扬叛徒哲学的电影剧本。这个打算得到他当时的“上级”、文艺黑线小头目阳翰笙的鼓励和赞赏。阳翰笙给他出谋献策，说什么“还是先写小说好，小说写出来不愁改编剧本，拍电影”。于是，孙振按照“老上级”的指示干将起来，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将小说初稿寄给新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前身）；经过两次退修，又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将修改稿寄给该社编辑部。稿件得到这个出版社的走资派的赏识，称赞这部小说是这个出版社历年来所出长篇中“最好的一部”。这部毒草小说竟以最快的速度于一九五八年九月正式出笼，第一版就印行了十二万册，创这个出版社初版本印数的最高纪录。

小说一出笼，立即受到姚文元同志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严正批判，指出这是一部美化叛徒，有着严重问题的大毒草，大造这部坏书的反。单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就收到一百多封对小说提出严肃批评的读者来信。湖南长沙一位农民把

《战斗的青春》读了五遍，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评论文章，指出这部小说应该彻底批判。这篇评论送到出版社后，小说的合伙炮制者、文艺黑线的一个小喽罗看了勃然大怒，竟亲自复信，逐条批驳读者的论点，蛮横地指责读者。这还不算，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一些文艺黑线的干将，紧密配合，遥相呼应，连篇累牍地在报刊上发表吹捧文章，反击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这部小说的批判，光是出版社的那个文艺黑线的小喽罗就一口气写了十七篇文章，对批评者进行反攻倒算。气焰之嚣张，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到一九五九年五、六月间，广大工农兵群众讨伐这部反动小说的声势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形势下，旧天津作家协会和旧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黑线干将以攻为守，举行了两次“座谈会”，讨论这部小说，妄图在会议上把肯定这部小说的调子定下来，而只在一些枝节问题上进行所谓“纯艺术”讨论。不料，会上大多数人对小说提出了批评。姚文元等同志尖锐地指出这部小说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一下可触怒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一个个跳出来定调子，胡说什么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水平比较高的”，以此掩盖它在政治上的反动实质。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派陈丕显，这个平时不读书不看报的反动家伙，三天就看完了这部小说，接着公然下令禁止批判，叫嚣“谁批判这本书，就要检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其五心领神会，马上召开会议，定调子，叫嚷这是“一部好书”，恶毒攻击姚文元同志和革命群众对这株大毒草的正确批判。他一面下黑指示不准点名批判，一面又召集他在旧作协和出版部门的爪牙开了一个大黑会，保护毒草，压制批评。这个家伙甚至狂妄地叫嚷“还要编个戏给你们看”。反革命的气焰嚣张透顶！

对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疯狂进攻，以姚文元同志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始终坚持原则，和他们作了坚决斗争。出版社的走资派为掩人耳目，蛊惑人心，以便更进一步毒害读者，指使那个文艺黑线小喽罗专程去天津，蜗居孙振家里十天，合伙偷偷修改这部毒草，把一些过于露骨的部分改得更隐晦含蓄。这样，至一九六五年为止，反动小说《战斗的青春》就出了四种情节不尽相同、宣扬叛徒哲学如一的版本，共印了十七次，累计印数达一百零七万二千册，流毒之广，令人发指！

一九六一年初，陈其五果然指使将这部小说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和全国其它城市公演放毒。后来又改编成电影剧本发表。这样，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鼓动下，从小说到话剧到电影剧本，移植成地方剧，在各地刮起了一股大黑风，和黑《修养》的大批出笼紧密配合，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广造舆论。

刘少奇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为使《战斗的青春》能以各种艺术形式流毒全国，在一九六一年他来上海看了话剧彩排后，按捺不住反党反人民的感情，胡说什么“写党的干部叛变，正可以教育青年一代”。尤其不能容忍的，到一九六五年这个家伙去天津时，还再次给叛徒孙振打气，为大毒草《战斗的青春》保驾。有了周扬这个大阎王的支持，旧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走资派更是胆大妄为，一九六五年七月，在筹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活动计划中，竟狗胆包天提议把这部反动小说列为重点内容之一，并指示出版社重版一次，刊登广告，作重点宣传。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之名，行反党放毒之实，这一伙刘少奇的黑爪牙真可谓用心良苦！

一部小说，竟引起从中央到地方一小撮走资派如此浓厚的兴趣，兴师动众，又是保驾，又是鼓动宣传，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巨浪，冲垮了以刘少奇为代表

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冲垮了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原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就是一个三次叛变革命的大叛徒。刘少奇一伙及其走卒孙振之流都是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无耻叛徒。刘少奇结党营私，正是依靠这批大大小小的叛徒组成的反革命别动队，阴谋篡党篡政篡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而叛徒小说《战斗的青春》就是为了适应大叛徒刘少奇篡党篡政篡军复辟资本主义这一罪恶阴谋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的。

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叛徒小说《战斗的青春》出笼后所进行的这场政治斗争，正是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的生动写照。回顾这场斗争，可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场斗争中所使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利用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压制和围剿；此计不成，就抛出第二套手法，即在肯定这部反动小说的前提下，把斗争引导到在枝节问题上进行所谓“争鸣”“讨论”。这套手法的目的，正如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其本质，就是用所谓“纯学术”讨论来掩饰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真相。“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以所谓“海瑞精神”鼓动大大小小被罢了官的“海瑞”们向党进攻，向党夺权。这是为大叛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的。《海瑞罢官》受到揭露批判后，彭真炮制的黑《二月提纲》就为吴晗保驾，其手法就是把一

场已经展开的政治斗争纳入所谓“纯学术”讨论。无独有偶，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死保《战斗的青春》，其手法也是把一场已经展开的政治斗争纳入所谓“纯艺术”讨论。文化领域里发生的这两场政治斗争，在时间上相距无几，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到孙振的《战斗的青春》，表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过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而斗争的焦点，仍然是个领导权的问题。无产阶级必须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战斗的青春》出笼后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向我们提供的重要启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工人阶级占领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按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上层建筑领域各个部门，使那里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换了人间”！让大叛徒刘少奇及其走卒孙振之流抱着他们的送葬墓碑《战斗的青春》去向隅哭泣吧！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 是“斗”还是“降”？

——评李英儒的大毒草《野火春风斗古城》

河北省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李英儒的反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及其同名电影（以下简称《斗古城》），是一株狂热鼓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大毒草。它名之曰“斗”，实则“降”，对敌伪反动派处处突出“一个‘降’字方针”，恶毒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斗古城》的炮制者就是利用文艺阵地向党“斗”的。他曾经煞有介事地说：“我以野火喻作敌人的凶焰，以春风比作党的力量，任你敌人的凶焰再高，烧不尽中国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乍一听，颇象正派人物的腔调，但实际上它在所谓描写“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背后，大做其反党文章。在中国人民与日伪反动派怎样斗、靠谁斗和真斗还是假斗等三个原则问题上，作品宣扬了一整套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黑货。

### 一、是突出武装斗争，还是突出地下斗争？

是地下斗争服从武装斗争，还是武装斗争服从地下斗争？这是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

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 and 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毛主席的教导，精辟地阐述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极力否定人民枪杆子的巨大威力，鼓吹反动的“白区工作中心论”，抛出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也尖锐地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里。

《斗古城》就是一部为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张目的反动作品。它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靠近我华北抗日根据地某沦陷区“古城人民的抗日斗争”。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开始对法西斯阵线发动英勇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抗击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中国人民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感到走投无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但是，在《斗古城》中，看不到我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人的致命打击，看不到八路军对敌伪占领区“发动广泛的进攻”，看不到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看不到“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

那么，在《斗古城》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地下工作者杨晓冬争取敌伪军上校团长关敬陶率部起义的荒诞故事。杨晓冬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最理想的英雄形象。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白区工作”时的反革命丑史的投影。

在作品中，把武装斗争安排为对地下斗争的配合，甚至为了突出地下斗争，公然用武装力量的无能为力或失败作为反



衬，来突出地下斗争的作用，歌颂地下斗争的所谓胜利。《斗古城》中，这样反动的对比，是不乏其例的：

例证之一，是杨晓冬刚进古城不久，就凭其特有的如簧之舌，完成了一项护送首长的重要任务。当时，一同负责护送首长的还有武工队梁队长，当他们行至一个堡垒户家里，突然和日本宪兵队特务兰毛等人遭遇。作者让梁队长昏头昏脑，一筹莫展，钻在堡垒户的夹壁墙里坐以待毙，而杨晓冬却有勇有谋，“智斗兰毛”，取得胜利。两相对照，有扬有抑、有褒有贬，作者的恶毒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例证之二，在我军民反击敌人夏季抢粮扫荡中，一边是我主力部队望风撤退，不敢阻击；一边是“古城”地下工作者夜闯伪商会，致使敌人不能组织起运粮队，从而粉碎了敌人这次抢粮扫荡。两者相比，作者竟用我武装力量的所谓“无能”反衬地下工作的神通广大，其狼子心肠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例证之三，在营救杨晓冬越狱的时候，一边是武工队的人，因暴露目标被敌人一网打尽，一边是地下工作者利用“内线力量”的援助，使杨晓冬脱险，并且拦劫囚车，救出了武工队的被捕者。这样的描写，旨在表明：革命的枪杆子没有什么作用，而地下斗争却是万应灵方，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关于“战争解决问题”的指示。

还有，作者为杨晓冬所精心设计的一个“幻景”：“杨晓冬想着，眼前闪出一幅敌酋向我军区司令员角力的图画，双方在难解难分的时候，在敌人背后，他猛刺了一刀。”于是乎，取得胜利。这仅仅是个“幻景”吗？不！它是个严肃的现实问题，是作者突出地下斗争，取消武装斗争的反动祸心的大暴露！在作者看来，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地下斗争配合武装斗争，而是只要搞地下斗争就能“斗”胜日寇，就能决定命运。这不是

刘少奇的“白区工作中心论”的翻版又是什么？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曾经叫嚷什么，“以全国范围来说，白区工作还是占着主要地位”，直接对抗“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抛出了不要武装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修养》，以后他又鼓吹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宣扬什么“合法斗争”，“搞上层统一战线”，公开向国民党反动派“交枪”。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一直鼓吹一条取消武装斗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动作品《斗古城》，就是鼓吹刘少奇这条政治路线的。它处处突出地下斗争，恶毒否定武装斗争，实际上是要人民放下武器，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它不仅不是什么“斗争”，而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是“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所以我们强调武装斗争，丝毫不意味着要忽视和放弃地下斗争。但是两者的关系不容颠倒，地下斗争必须服从和配合武装斗争。我国革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将近二十五年了，但是美帝、苏修正狼狈为奸，妄图重温日寇的迷梦。我们必须拿起革命的枪杆子，横扫《斗古城》之类鼓吹的投降主义路线，“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美帝、苏修胆敢把侵略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就一定把它们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 二、是依靠人民群众，还是依靠敌伪人员？

在白区工作中，我们的方针，应放在什么基点上？是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还是依靠敌伪人员，走反动的上层

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深刻地指出：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篡党和复辟资本主义，百般污蔑和丑化工人和贫下中农，大肆散布反动的“群众落后论”，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斗古城》的炮制者，以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灵魂，把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功勋一笔抹杀，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伟大教导。作者根本无视这样的历史事实：“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极大地增高了他们的抗日情绪。他们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在作品中，根本不去表现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在作者不得不写到“革命群众”时，又极尽歪曲、丑化之能事，把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例如书中的周伯伯，是作者描写的唯一的“工人阶级代表”。但他浑浑噩噩，不问世事，每天专注于下棋作乐，“似乎他这一辈子所关心的就是这盘棋了”。在敌人的铁蹄下苟安偷生，甚至还有一套刘少奇所鼓吹的“活命哲学”。书中的杨母，按作者介绍，是“革命的母亲”，但她所关心的就是如何给儿子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媳妇，思想陈腐落后，在她头脑中哪里有什么“革命”的天下！作品中，还有一个所谓“革命接班人”的形象，名为韩燕来，也被作者丑化得一塌糊涂：他“喝足了，是醉汉；睡醒了，是傻子”。参加革命以后，还是冥顽不灵，忽“左”忽右，是一个“乱撞乱碰的鲁莽家”。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但是

《斗古城》的作者，肆意丑化广大人民群众，恶毒污蔑广大人民群众“不可靠”，却把一群汉奸、叛徒以及敌伪人员推上了“革命功勋”的宝座，把他们描写成可靠的“英雄”。其中最主要的角色，一曰敌伪团长、反动汉奸关敬陶，一曰伪省公署代理科长苗逢雨，还有伪军苏兴旺等人。这些乱七八糟的人物，在作品里成为杨晓冬搞地下工作的依靠力量，成为“革命的功臣”，是他们每当杨晓冬遇到危机，就竭力救助，帮助杨晓冬等人化险为夷，遇难呈祥。从下列所述“过三关”，可以看到这帮家伙，实际上已成为杨晓冬的基干力量。

第一关，定居安身。杨晓冬进入“古城”后，没有“护身符”，难于定居下来。这时上级机关没有作什么安排，别的地下工作者也都无能为力，他身边的几个群众更是束手无策。在这关键时刻，多亏了伪省公署一等科员、代理科长苗逢雨。是他为杨报上户口，领来居住证。加上叛徒高自萍给杨一枚“证章”，从此杨晓冬就在“古城”站住了脚，苗逢雨等人还在伪警搜查杨晓冬时，挺身而出，使杨晓冬逢凶化吉。

第二关，越狱脱险。当杨晓冬被日寇逮捕眼看就要被害时，由于一个“通人情”的伪军伙夫老赵，使杨晓冬与外面取得联系，制订了越狱计划。越狱时还是靠伪军团部通讯兵苏兴旺等人搭救。但是，杨刚逃走，又被追捕的伪军围在某家。虽然杨已化装为病人，但伪军还是坚持把他带走审查。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来了个伪军团长关敬陶。这时，反动汉奸关敬陶，俨然是一尊主宰一切的“神”，由于他“本性改变”，“良心发现”，救助了杨晓冬一伙。

第三关，劫车起义。武工队梁队长因救杨晓冬出狱未成，反而被敌伪逮捕。靠什么把他救出来呢？又靠什么使关敬陶最后率部起义，取得这场“地下斗争”的胜利呢？全靠伪军团部通

讯兵苏兴旺和伪军团部传令兵小汤的“良心发现”，缴获武器，伏击囚车，搭救了梁队长。随后又靠对伪团长关敬陶“感化”及关某人的突然“明智”，一举率部起义，获得了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革命斗争中分清敌、我、友，特别是解决谁是依靠力量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大毒草《斗古城》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公然对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如此恶毒地歪曲、丑化工农群众，而又那样无耻吹捧汉奸、特务和敌伪官兵，这是别有用心的。在对敌斗争中，我们并不反对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缺口、矛盾。从政治上分化、瓦解敌军，是我党的一项重要政策和策略。但是这种争取、利用和瓦解，决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更不是把他们当成“革命党”依靠。象《斗古城》那样，实际上是让人们敌我不分，认敌为友，为刘少奇大搞招降纳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鸣锣开道。

### 三、对反动汉奸是斗争，还是投降？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对敌斗争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但是《斗古城》的作者，却根据刘少奇的对敌人“友好”、和敌人“联合”的谬论，要尽各种花招，大肆兜售刘少奇的投降主义黑货。作者主要玩弄了哪些花招呢？一曰“美化”，二曰“感化”。

美化谁？美化“古城”里“鼎鼎有名”的敌伪团长关敬陶。此人刚一出场，作者立即赋予他一张“英雄”的画皮：“身体魁梧而匀称”、“最守规矩”、“与众不同”。并说什么在所有的伪军

官里，唯独他“不打骂士兵”，“不喝兵血”。他所带领的汉奸队，竟能宣传“不拿民间一草一木”，“不扰民，不害民”。在作者笔下，一个敌伪汉奸团长竟如此“高尚”，如此“仁义”，如此“可敬可爱”！

然而，敌人的营垒中果真能有这样的“明智派”吗？全是鬼话！事实上，关敬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铁杆汉奸。出于其反动的阶级本性，在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高潮中，他主动考取了大汉奸齐燮元的“伪清河军校”，毕业后由于效忠日寇有功，当上了敌伪连长。在日寇疯狂“扫荡”我抗日根据地时，作者说他那个连“多少占了些便宜”（请同志们注意这句话：一个“便宜”，不知会有多少革命者人头落地！作者说得这样轻松，好象还嫌他占“便宜”不多，足见作者的立场反动至极！）实际上是为日寇大效了犬马之劳。以后他又积极为日伪反动派奔走卖命，受到日伪华北派遣军司令、大战犯冈村宁次的特别嘉奖，并提升为营长以至团长。杨晓冬进入“古城”后，他又被敌伪委以“代理城防司令”的职务，足见其是多么受敌伪的器重和信用。

毫无疑问，关敬陶是一个死心塌地效忠日寇的反动汉奸，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剑子手。作者为什么那样挖空心思地美化关敬陶呢？为的是在群众中制造对敌人的幻想，要人民群众与之“同感情共命运”，“合二而一”，以便推销投降主义黑货。

既然在作者笔下，反动汉奸关敬陶与众不同，又这样可敬可爱，自然就用不着向他“斗”什么了，只需人性“感化”就可以把他“争取”过来。怎样“感化”呢？杨晓冬及其同伙银环搞了个“三部曲”。一为“要良心”，二为“建友谊”，三为“找出路”。显然，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投降主义路线。

在一次战斗中，关敬陶被我逮捕。以武工队政委身份出现的杨晓冬，理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揭露和批判敌人的罪行，

让他低头认罪并服罪赎罪，而杨晓冬却不敢与之斗争，而是乞灵于敌人的所谓“良心”，他“态度温和，举止斯文”地向关说道：“你有良心吗？我们要的就是你这颗良心！”接着为这个汉奸评功摆好，临走又期望他作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这里还有一点向敌人斗争的影子吗？没有！初次交谈，便“倾诚相见”、“一见钟情”！

为了进一步“感化”和规劝关敬陶，共产党员杨晓冬竟然和反动汉奸交上了朋友，建立了友谊。关敬陶对银环一再表白：你们的友情“我永远不忘”。对杨晓冬更是多次表示：“同贵军贵党是朋友，友谊很好。”作为地下斗争的领导人杨晓冬对关也一拍即合，奴颜卑膝地说什么“友谊是肯定的”。听！这口气是何其亲昵和急切！

通过一番“感化”和“规劝”，杨晓冬还派自己的心腹银环，亲自找到关家门上，说什么：“你在这边干事没出路，应该携枪带人投奔到八路军方面去。”看！他们对这个汉奸是多么关怀备至！“投奔八路军”是假，找“出路”是真。这“出路”，就是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招降纳叛。

是朋友还是敌人？是阶级斗争还是人性“感化”？难道铁杆汉奸的反动本性通过“要良心”，“建友谊”，“找出路”，就能改变吗？魔鬼真的能变人吗？全是痴人说梦话！

当着地下工作者的面，关敬陶满口“仁义道德”、“交情义气”，但在暗地里却跟他的老婆说：“人家说人家，自己管自己，我们别沾八路军的边。”“掏良心说，我对共产党没有什么感情”，并认为投奔共产党、八路军这条路“可怕，可怕极了！”看！这位叫嚷“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敬陶，阴一面，阳一面，两面三刀，诡计多端，是多么阴险狡猾啊！就是这个被杨晓冬、银环“感化”、“规劝”过的关敬陶，在我攻打警司，他本人被俘、部

下全部丧失战斗力的时候，他仍然命令其部下：“不要管我，你们尽管开枪！”一副多么凶残狠毒的反革命死硬派嘴脸！

但是，出于宣扬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需要，作者不仅美化关敬陶，而且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颂扬关敬陶，在小说的结尾，让关敬陶决然率部起义，骑着高头大马成为我根据地军民夹道欢呼的“革命英雄”。请看：

“关敬陶纵马在盘山道上，看着正前方巍峨耸立的眺山。眺山披挂着夏季特有的浓绿盛装，盘道沿途长满了鲜花香草……”

“关敬陶与杨晓冬抬头一看，青山绿叶的眺山口外，迎风招展着飘飘红旗，振奋人心的锣鼓响的铿锵悦耳，麻密簇拥的欢迎行列里，喊着激动人心的口号……”

这哪里是坐着写小说？作者简直激动得要发疯了。于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不自禁地为反动汉奸关敬陶唱了一首“铿锵悦耳”的赞美歌。作者是很知道利用小说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他曾公然宣称：“写历史题材的时候，眼光要看准今天”。当他“看准”了他要竭力鼓吹的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并“看准”了时机时，他怎能不“激动”呢？

《斗古城》的要害，是一个“降”字。这本反动小说出笼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三年由作者参加改编搬上银幕。这个时期，正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候，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国内外的牛鬼蛇神遥相呼应，利用我国经济暂时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古城》就是适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需要“破门而出”的。

但是，历史的车轮岂容倒转，革命的洪流不可阻挡。铁的历史表明，凡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叛徒、内奸、工贼刘





## 革命人经得起地陷天塌

——《斗古城》里的杨老太太根本不是革命母亲

子弟兵母亲 戎冠秀

李英儒写的反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使尽吃奶的力气，鼓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想方设法往阶级敌人脸上搽脂施粉，往革命群众脸上涂灰抹黑。书中有个杨老太太，说是“革命母亲”，其实，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革命母亲”的影子。

### (一)

看一个人革命不革命，不管标准有一千条，还是有一万条，但是，头一条就得看他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看他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见过黄继光的母亲、邱少云的母亲等许多革命母亲，在北京和他们一块开过会，叙过话。她们都是对毛主席最忠，跟毛主席最紧，而对大叛徒刘少奇和他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恨。她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那才真称得起革命母亲，我就是要向人家学习。

我的家乡是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解放的，我的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从苦海里给救出来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戎冠秀。我打一九三八年入党那天起，就在红旗下宣誓：“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直到解放全人类！”我曾经把决心写成歌：“毛主席指路我们走，风里浪里不回头！”毛主席教

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把毛主席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铭记在心头，坚决照办。我把儿子送上抗日战场，拿起枪杆打东洋；我自己做军鞋，缝军装，救护伤员送公粮，支援前线打胜仗。在那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身在山沟，心向延安，白天看太阳，晚上望北斗，日夜想念毛主席，我在上级奖给我的“支前模范”红旗上，一针针一线线，亲手绣上“人民的救星”五个大字，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 and 贫下中农心连心，在百忙中多次接见了我们。当日夜想念的恩人毛主席和我握手的时候，那股子幸福劲就没法说。我只觉得浑身热乎乎的，激动得热泪顺着脸流，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现在七十四岁了，身子骨挺壮实，只要有口气，就要紧跟毛主席朝前走！

《斗古城》里那个杨老太太，她算那号“革命母亲”呢？她心里根本没有毛主席，头脑里根本没有“革命”二字，只有她那个死心塌地为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卖命的“宝贝”儿子杨晓冬。杨晓冬对刘少奇那套“政治解决”、“搞上层统一战线”、“白区工作中心论”等黑货，信得深，跟得紧，干得卖劲。杨老太太对这样的一个儿子心疼得不得了，步步踩着他的脚印走，围着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团团转。对她儿子的话百听百信，说什么：“妈懂你的心”，“妈听你的话”。有这么个儿子，她不觉得丢人败兴，反倒“觉得露脸”。真不知道天底下还有羞耻这回事。

## (二)

看一个人革命不革命，重要的是看他站在什么立场，替什么人说话办事，看他那世界观是姓“无”，还是姓“资”。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为“公”，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是为“私”。毛主席

教导我们：要“大公无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他老人家为我们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光辉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做人的依据。我学了这三篇光辉著作，心明眼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心一意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早日打败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我送儿子兰景去参军。当时兰景已经订了婚，有人劝我说：“让孩子过了事再去吧，穷人家寻人不容易，留下个根根苗苗要紧呀。”我说：“要说要紧，还是打鬼子要紧，革命成功了，全国解放了再结婚吧。”我和儿子、媳妇一商量，他们也同意。送儿子走那天，俺一家子忆了阶级苦、民族恨。我说：“兰景，这阶级仇，民族恨你要牢牢地记在心里，为咱穷人握枪杆，为咱穷人打天下，毛主席指到哪，你就打到哪，把敌人消灭干净你再回来，你娘在后方支援你们。”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俺兰景不含糊，杀敌英勇，立了三次大功。后来，兰景参加抗美援朝，光荣地牺牲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没有掉泪。心想：儿子死了，娘还活着，革命还要革到底！我把儿子的抚恤金和家里的存款，还有上级奖给我的那头大骡子一下子交给合作社，作为发展集体生产的资金。我和贫下中农并着膀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觉得能多给社会主义增砖添瓦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就是我最后的心愿！

《斗古城》里那个杨老太太，算是自私到家啦！她认为“儿子是她身上的一块肉”，革命就象割她的“肉”。她养儿是为了“养老送终”，“光宗耀祖”。她对儿子的要求是：“做好掩护，千万别暴露目标”，“一年之内要讨个儿媳妇”，“眼看快到年底，要回家过个年。”她对儿子就是这三条要求，从不勉励她儿子好好干

革命。姓肖的让她帮着送信，她推说：“自己是上岁数的人了，拙嘴笨腮，又没心计儿。”不肯去。可是，当她听到“儿子搞地下工作，妈妈当联络员，最好掩护”时，便接受了掩护儿子的任务。她打着送信的旗号，专门给儿子保媒说媳妇。动员儿子和银环一块回家过年，她把这当成“最幸福的理想”。后来，她入了狱，银环去看她，问她：“对工作有什么吩咐”，她说：“工作上提不出什么来”，却大谈什么：“最后的心愿”。她的最后心愿既不是中国革命，也不是人类解放，而是把一只戒指“戴在晓冬称心如意的姑娘手上”，还不知耻地横着老脸硬要银环姑娘做她的儿媳妇。死前，凡是革命的事，她丝毫不牵挂，唯一牵挂的是她儿子和“中意的姑娘”。她唯一的遗憾是：不能跟着儿子“到京城风光风光，开开眼界”。看，她的灵魂是多么肮脏啊！

### (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干革命就要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为革命乐于吃苦，勇于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子弟兵，战斗在太行山上，凭着“小米加步枪”，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人民子弟兵个个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好汉。我打心眼里热爱他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那时，我是妇女主任，转移大队长。男人们参加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我带领妇女们拥军支前，送水送饭。有一天，下着大雪，敌人又来进攻。仗打得正紧，忽然一个战士负了伤，我心里象刀刺一样，立刻冲上去，冒着吱吱乱飞的枪弹，背着伤员爬回家，我做豆腐脑一口一口地喂他。后来见他伤重，我又和几个妇女把他背着送到柏冶沟后方医院。还有一次，一个战士在我家养伤，伤刚养好，敌

人来搜，四、五个鬼子用刺刀逼着我问：“他是不是八路军？”我一口咬定：“他是我的儿子！”敌人威胁我：“撒谎的死啦死啦的。”我想：“子弟兵是俺贫下中农的命根子，没有他们谁来消灭敌人，谁来解放全中国，就是我死了，也要保护他们！”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子弟兵。敌人走后，我送战士回前方。临走时，他说：“戎妈妈，我一定多杀敌，多立功，报答你老人家。”我说：“孩子，我就希望你为保卫毛主席，为解放全中国多出把子力呀！”

象杨老太太那样的“革命母亲”，我可没有见过。让她送个文件，她就怕得要死；路上遇点风雪，她就叫苦连天；看见敌人的炮楼，她就“心惊肉跳”。她被捕后，觉得“无限委屈”、“失望”、“恐惧”、“哀伤”。敌人还没有动刑，只叫她看了看刑具，就“害怕”得“闭上眼睛”，骨头架子都酥了。敌人见她怕死，就用“精神战”威胁她，说要给她母子“轮番动刑”。她一听立刻尖叫起来，“辛酸的热泪滴在儿子脸上”。这时，什么民族尊严，什么革命气节，她统统没有了，有的只是生死离别的哀痛。她一点也没有向敌人作斗争，反而跳楼自杀了。她为“私”而死，死得窝囊，比鸿毛还轻！这哪有一点象“革命母亲”的样子？！

我在北京看了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那可真是咱无产阶级的戏，好上加好，我一边看，一边不住劲地鼓掌。《沙家浜》里的沙奶奶，她待伤员亲如一家，“精心调理总不差”。为了保护革命同志，她不怕敌人严刑拷打，“把天大的事儿一身担”，“粉身碎骨也心甘”！敌人要杀害她，她毫不畏惧，利用和敌人相见的机会，面对面地揭穿敌人“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反动面目，大骂敌人“少廉无耻丧尽天良”，充分表现了她那种大无畏的革命胸怀。《红灯记》里的李奶奶，坚信“革命的火焰一定要大放光芒”，在敌人监狱里，面对敌人的屠刀，她脸不变色心不跳。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她挺着胸，走上刑场。高呼：“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从容就义。她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无产阶级的硬骨头。她们不愧“革命母亲”的光荣称号。

“无私才能无畏，大公才有大勇。”沙奶奶、李奶奶还有我亲眼见过的那些革命母亲们，灵魂深处只有“公”字的天下，没有“私”字的地盘。她们一心想的就是“献身于世界革命”，“不屈不挠斗敌顽”，“火海刀山也扑上前”。她们是太行山上的青松 翠柏 万古长青！相比之下，杨老太太不过是道边石缝里的毛毛草。

反动小说《斗古城》歪曲和丑化革命群众，美化阶级敌人，宣扬反动的“骨肉之情”、“公私溶化”等封、资、修黑货，妄想麻痹人民的斗志，让人民不要革命，不要斗争，服服贴贴地跟着大叛徒刘少奇走，那是痴心妄想。我们贫下中农，坚决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伟大教导，挥起革命的铁扫帚，把反动小说《斗古城》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四月九日)

## 撕下老牌机会主义者陶铸的画皮

——评反动小说《小城春秋》

吴泰昌 马连儒 邹正贤 林 心

姚文元同志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运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关头发表这篇文章，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陶铸是一个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从反革命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大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极力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多年以来，文艺界出现了不少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作品，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就是其中的一个。

### (一)

《小城春秋》是以陶铸直接参与和具体领导的一九三〇年五月厦门劫狱事件为背景的。小说把这个事件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厦门党的地下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整个作品的高潮，安排在全书的后半部。作品自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以后，引起了陶铸极大的注意和关心。他多次对小说发表意见，沾沾自喜地吹嘘说作品中所写的那次劫狱事件就是在他领导下



取得“成功”的，并且一有机会就大肆宣扬这一段所谓“光荣的历史”，极力捞取政治资本，妄图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

被陶铸拿来到处炫耀而又在《小城春秋》中得到歌颂的这一次厦门劫狱事件，到底是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还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产物？陶铸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老牌的机会主义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小说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错误路线当作正确路线来加以歌颂，把贯彻错误路线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美化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一株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次劫狱事件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九三〇年七月八日，即事件发生以后两个月，中共福建省委给当时被李立三把持的党中央所写的报告，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报告中说：“厦门破狱运动的产生必然的是受了全国革命的群众斗争激烈的影响，和白色恐怖严厉的暗示”。而这次劫狱在“统治阶级日趋崩溃”、“革命高潮快到来”的时候举行，是“武装暴动的演习”，是为着准备“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十分明显，这个报告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当时福建省委搞这次劫狱的指导思想），和那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完全一致的。李立三等人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统治阶级就要完蛋了，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了，因此，主张用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掀起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以实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从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

陶铸等人领导的劫狱事件就是在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发动的。一九三〇年，蒋桂军阀混战刚刚开始，国

国民党反动派在白区加紧实行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在厦门这个海岛城市里，驻有大批海军，派遣了人数众多的警察、侦探，设立了很多特务机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这种形势下，党的地下工作者“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但是，当时福建省委陶铸等人却在李立三把持的中央领导下，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经常无条件地组织工人学生举行频繁的集会和示威，给党的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特别是在当年为庆祝“三·一八”巴黎公社纪念日而举行的集会以后，就有十八个党内外重要干部被捕，导致福建省委机关两次遭受破坏。然而他们非但不接受失败的教训，组织必要的战略退却，反而在五月采取了更为冒险的军事行动——武装劫狱。陶铸代表省委军委会参加了破监武装行动特委会，并被指定为武工队队长。他十分起劲地参与了领导和组织这次武装劫狱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举行这种军事行动，根本不可能赢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不可能起到发动群众投入革命斗争的作用，而只能使党的地下组织丧失其战斗力。可是，这一错误行动发生后不久，却得到了当时被李立三所把持的党中央的表扬。而《小城春秋》居然以十分肯定、赞扬的态度，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拚命美化、渲染这次劫狱事件，把厦门地下党组织在李立三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所组织的集会游行等等，加以详细的描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从一九五六年以来多次得意洋洋地吹嘘这次武装劫狱事件，说这样搞是“对的”，“不是立三路线”。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足以表明他坚持错误路线反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顽固立场。

陶铸参与和领导的这次劫狱事件的后果和影响是极其恶劣的。这次劫狱事件，虽然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缺乏防备，侥幸地取得成功，但是，对于一个政治事件的评价，决不

能只看它一时的胜负，而必须看它的实质，并且联系它对以后整个革命形势的影响来考察。这次事件以后，引起了敌人严密的防范，再次加强了对厦门地下党和群众革命斗争活动的残酷镇压，给党的白区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障碍。福建省委当时给中央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厦门这时简直闹得满城风雨，白色恐怖到了极高度了”。更令人气愤的是，陶铸等人非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相反却被一时的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把这个事件说成是工农武装力量“伟大”、“完满的胜利”。紧接着在八月间，组织了攻打盐管局的飞行集会，这次大规模的盲动行动，事先以贴告示的方式，公开暴露给敌人，在敌人充分准备与布置之下，革命群众遭到镇压，两个带队的领导同志当天就被敌人杀害。从厦门劫狱的所谓“胜利”到攻打盐管局的失败，厦门的地下党便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同党的关系也完全公开。这一年冬天，陶铸从厦门调到漳州担任特委书记，他仍然顽固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漳州地区的武装斗争引向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的邪路，同样给这个地区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小城春秋》所描写的劫狱是经过艺术处理的。陶铸等人宣扬劫狱无一伤亡，而书中写劫狱时就有人被敌人打死在狱里，小说全力歌颂的主人公四敏也在冲出监狱后，因身负重伤又得不到及时的营救而死去；另一个主人公何剑平则险些被敌人抓去。此后厦门地下党组织处于很难活动的困境。小说这样写的用意是为了歌颂那些执行错误路线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的“英雄、顽强，不怕牺牲”，然而弄巧成拙，这倒说明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必然给革命造成的危害。

大家都知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应该走什

么样的道路？是以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呢，还是采取以城市工作为中心，首先占领中心城市，然后攻打农村的方针？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也是把中国革命引向成功或失败的根本问题。毛主席早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就根据对中国社会的科学分析，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乡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他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对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李立三和后来的王明、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者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危害。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根本否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战争，也根本看不到在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而总梦想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它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蓬勃发展，只要一遇到时局对革命有利的变动，就幻想通过几个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促成全国革命的高潮，并妄图一举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胜利。陶铸等人就是把厦门的劫狱事件看作是“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前的“武装暴动的演习”，因此这个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完全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陶铸领导的厦门劫狱事件所以引起李立三的中央如此高度的重视，就是因为它可以被他们用来当作一个“胜利的范例”，证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正确”。以厦门劫狱事件为背景而写成的《小城春秋》，几乎没有一处提到发展农村武

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却以极大篇幅描写厦门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白区工作，而在涉及厦门附近的农村游击区时，又完全把它写成为白区斗争服务的陪衬。小说中讴歌的一些英雄人物，尽是脱离工农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信徒。每当他们在厦门呆不住了，就溜到农村去“避风”。贯穿全书的，正是这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观点。

严峻的历史无情地戳穿了陶铸的谎言。他参与领导的厦门劫狱事件，根本不是什么正确路线的胜利，而是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产物；陶铸根本不是什么“未犯过路线错误”的“一贯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个一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老牌机会主义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革命、反革命。

## (二)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也跃跃欲试。一九五六年五月，也就是在《小城春秋》出笼的半年以前，陶铸乘福建龙溪地委编写闽南革命斗争史的机会，大肆吹嘘自己在福建厦门、漳州那一段“光荣历史”。他竟然厚颜无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立三路线我们是反对的。当时上海的中央（王明、博古）派来传达反立三路线的指示，我们已经基本上清算了立三路线”。王明和李立三纯属一丘之貉，同样都是老牌机会主义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来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自称忠实地执行王明指示的陶铸又怎么可能来清算“立三路线”呢？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欺人之谈！厦门劫狱事件后，陶铸在漳州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的错误做法，就足以证明他丝毫没有改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可是，陶铸在这次谈话中，竟然把他那一套完全违反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流寇主义的军事行动，当作正确的经验来炫耀，说他是“坚决主张搞武装斗争的”，如何“带着武装发动群众”，使“农民在斗争中得到利益”。他不仅歪曲历史，美化自己，而且象恶狗一样反咬一口，大骂敢于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主张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的革命同志是“机械”的“教条主义”，这是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久以后，根据陶铸口述而写成的回忆录《厦门破监记》出笼了。回忆录把“破监”描写得神乎其神，竭力夸大这次事件的作用，胡说什么“成绩是非常巨大的”，并对“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陶铸大肆吹捧。这篇文章流毒极广，是陶铸公然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的铁证，是射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支毒箭。一九五九年小说译成外文时，根据《厦门破监记》写的序言，又一次传播了该文的毒素。一九六二年小说重版时，在外文版序的基础上又写了再版序言。外文版销售国外，新版在国内大量发行，为陶铸在国内外大捞了一笔政治资本。

一九六一年，在国内外阶级敌人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中，陶铸假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总结党史之名，在他的默许下，由福建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了题为《一九三〇年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厦门破狱工作向党中央的报告》的大毒草，并且在按语中吹捧它是“一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这个按语竟颠倒历史，极力美化陶铸等人，胡说什么，他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勇敢机智，迅速而成功地拯救了被囚禁在厦门监狱的革命同志，为革命写下了光辉的史迹”。

厦门劫狱事件为什么会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如此重

视，以致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大做文章呢？陶铸真的仅仅是为了翻三十多年前的老账，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英雄吗？他的阴险的目的决不仅如此。没有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是用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马克思说得好，召唤过去的幽灵，使死人复活起来，是为了替自己效劳。陶铸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大的阶级搏斗中，都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党内错误路线翻案，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为了美化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代表的旨在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而为资产阶级篡党篡政篡军效劳。

陶铸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绝不是偶然的。陶铸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是一路货，都是老牌的机会主义者。历史是无情的。谁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管你伪装得多好，隐藏得多深，爬得多高，都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命运是这样，陶铸的命运也只能是这样。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 “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吹鼓手

——评反动小说《小城春秋》

驻厦门大学工、军宣队，厦门大学革委会大批判小组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革命的文艺就应该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写革命春秋。可是，反动小说《小城春秋》所写的却是刘少奇、王明、李立三机会主义路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革命“春秋”。其要害是：对抗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背离毛主席关于武装斗争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鼓吹“白区工作中心论”，宣扬“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为叛徒陶铸一伙树碑立传，为王明、李立三“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翻案，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作反革命舆论准备。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把反动小说《小城春秋》彻底批深批臭，肃清其流毒。

《小城春秋》的炮制者们无耻地标榜什么它“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中国一角的革命斗争”，这是欺人之谈。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这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真相就大白了，它的骗人的西洋镜也就被拆穿了。在这个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革命力量，



所采取的反革命方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施行反革命大屠杀，同时，集中兵力向江西中央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中国革命处于外侵内患的危急关头。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分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作出英明决策，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以革命武装粉碎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福建，毛主席亲自率领工农红军，“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建立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所指引的这条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道路。

《小城春秋》在根本上背离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回避了波澜壮阔的工农革命群众运动。却集中地描写了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厦门“孤岛”上搞地下活动，“大唤大叫”地出了事，统统被捕，“横冲直闯”地破了狱，又纷纷逃跑了。概括地说，贯穿通篇的基本情节是“左”倾盲动主义与右倾逃跑主义。

作品所塑造的几个主要人物是什么货色呢？书生气十足的吴坚，道貌岸然的四敏，大喊大叫的剑平，温情脉脉的秀苇，这些号称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人全是一些内心世界充满着自我矛盾的，成天价在生与死、情与爱的问题上打转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个冠以工人出身的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李悦，则是一个卖力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

当敌人捕杀我党地下工作者和革命群众达到疯狂的时候，李悦决定了这样的行动纲领：“头一步，先把厦联社一部分‘红’出来的社员，提前从城市撤退，转移到福建内地去开辟新的基地；第二步，利用纪念日的游行集会，布置一个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示威请愿，狠狠的干他一下……”。这个纲领正是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自白。

所谓“厦联社一部分‘红’出来的社员”，就是指那些在党的外围组织中搞活动，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又完全暴露了自己身份的地下工作人员。当大喊大叫一阵不奏效，反倒吃了亏以后，他们便把大叛徒刘少奇的黑话奉为符咒：“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此自我宽慰，纷纷溜之大吉。吴坚跑到福州，剑平逃往长汀，秀苇转移漳州，简直是一哄而散，正如李悦自白：“去避一阵风”！这不是赫鲁晓夫的“明智妥协”是什么？这不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的逃跑主义又是什么？在他们心眼里，哪里有什么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他们心眼里有的是：农村配合城市。农村是“避风港”——风波起，避一避；风波息，返回来，再干一场。

所谓“大规模的”、“狠狠的干他一下”，只不过是炫耀其“左”倾盲动主义的华丽外衣。形“左”而实右，这是刘少奇、王明、李立三之流的家传秘方。它完全违背毛主席关于白区工作必须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他们是怎样“狠狠的干他一下”的呢？不外是吴坚组织的“锄奸团”发警告信，割掉几个走私日货大奸商的耳朵；还有就是扬言“有了这把左轮，我还怕什么”的剑平和秀苇，在游行示威集会上煽动群众退彩票的“盲动”。此外就是李悦亲自策划的以吴七为支柱的“武装劫狱”。这些所谓“狠狠的干他一下”，实际上是老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产物。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对于国民党反动政权实在无损半根毫毛。

“狠狠的干他一下”，其结果是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外围组织的群众一百多人被捕，吴坚、四敏、剑平、秀苇一个个被抓去，李悦自己也不例外。其所以被捕除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本性所决定之外，从路线上看，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招致

的恶果。然而，小说却一而再地描写劫狱、劫车、劫船，“三劫”连捷的奇迹，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唱“颂歌”。

先是“狠狠的干他一下”，而后统统被抓去，最后纷纷跑掉了事，这就是作品中表现机会主义的“三部曲”，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忽“左”忽右，“左”就“左”得出奇，右又右得要命，这就是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本质，也是刘少奇、王明破坏我党伟大事业的反革命两手。

《小城春秋》为了掩盖其机会主义本质，还巧妙地为自己披上一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华丽外衣。让我们剥开伪装，看一看他们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是：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二、以工农基本群众为主力军；三、对同盟军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作品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些英明指示。小说中，作为地下党统战工作主要负责人的四敏，公开宣称：“风头主义也罢，爱国主义也罢”，“实实在在干出成绩来，这点不能抹杀。我们首先看效果。”这种出卖政治原则的“效果”论，和“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论调何其相似啊！而这正是小说中地下党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小说中的地下党不但以机会主义思想代替毛泽东思想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而且始终撇开工农主力军。而偶尔登场的寥寥可数的几个工人、渔民，全部是没有什么“名堂”的配角。统领全局的那批“举足轻重”的同盟者，不过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一班武的，那就是吴七为首的一伙乌合之众，实际上是一帮“三大姓也全听他使唤的”封建宗派、游民无产者。

在对待同盟军的方针上，毛主席教导我们：“第一个是团

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小说中的地下党不但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相反地，通过四敏的口推销大内奸刘少奇的机会主义黑货，胡说什么：“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这些同盟者简直被捧上了天，他们不但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流砥柱，而且成了地下党的“保护人”、“保镖”。“深孚众望”的校长薛嘉黍当了地下党外围组织厦联社社长，忘乎所以地说：“让我来干吧，凡是你不干的，都由我出面。”而国民党反动派也果真不敢动他半根毫毛。还有那个吴七，明明是乡里有械斗，当敢死队的家伙，而地下党武装劫狱当支柱的偏偏又是他。这样一个封建宗派头子，作者偏要把他刻划成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英雄”。凡是地下党人临难，无不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真是神通广大的“救世主”。他当仁不让地当上了地下党的“保镖”，而当他那一伙和日本浪人及角头歹狗大搞武斗时，作为地下党主要领导人的吴坚居然拜为“军师”。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吗？不！这是狼狈相依，阶级调和。说穿了，就是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寻找了一些在国民党政权下还吃得开、行得通的文武金刚作为靠山，以期保存自己，哪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

综上所述，自谓为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斗争”的《小城春秋》，既宣扬了“左”倾冒险主义，也宣扬了右倾投降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吹鼓手。

（原载《福建日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 反动小说《红日》为谁招魂立传？

驻沪空军 卫红鹰 红鹰群

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象一轮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照耀着全世界革命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道路。一切革命人民怀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满腔热忱地讴歌她、颂扬她；一切阶级敌人则怀着刻骨的仇恨，千方百计地诅咒她、攻击她。

解放初期，在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的亲自领导下，拍摄了我国第一部体现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优秀影片《南征北战》。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小喽罗，对《南征北战》这部影片棍棒齐下，百般指责，横加扼杀，妄图抵消这部影片的巨大影响。并指使所谓“战争文学的主将”吴强，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抛出了一株疯狂反对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大毒草《红日》，明目张胆地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唱反调。

《红日》这部反动小说，大肆诋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恶毒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赤裸裸地为蒋家王朝树碑立传，反映了大陆上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在八百万蒋匪军被消灭后的疯狂复仇心理和时刻梦想蒋该死重返大陆的反革命“理想”，博得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片喝采声。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周扬，就曾肉麻地把反动小说《红日》吹捧为“中国第一部战争文学巨著”。十分明显，我们同《红日》的炮制者吴强及其黑后台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吴强和他的黑主子，煞费苦心地炮制这部反动透顶的小说，难道他们是想用红日东升来歌颂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吗？不！这个有着三十多年反共经验的老牌特务，善于打着“红旗”反红旗。让我们看一看吴强是怎样施展其偷天换“日”的反革命伎俩，恶毒攻击毛主席军事思想的。

## 一套蒋匪军的军装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几十年来，一直把这支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的无产阶级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作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他和人民公敌蒋该死一样，对我军施尽分化瓦解，以至出卖、扼杀之能事，必欲将我军置之死地而后快。吴强对他新老黑主子的反革命意图心领神会，他在反动小说《红日》中对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竭力丑化和恶毒的攻击。

在小说中，吴强精心塑造了一个他理想中的“英雄”连长石东根，恶毒地为他设计了一个“醉酒纵马”的场面：石东根“晕乎乎醉醺醺”地在马上装着“象一个国民党的大军官”，“头上戴着高檐大帽，两脚蹬着带马刺的长统黑皮靴，身着黄呢军服，腰里挂着长长的指挥刀”，在“山前公路”上“疾驰飞跑”。吴强还在石东根“嘴上画一道胡须”，解释道：这活象“李仙洲”。吴强对这套蒋匪军军装真是念念不忘，在小说《红日》改编为电影时，反动的编导者怕太露骨，没有给石东根穿上这套军装。吴强竟为此大动肝火，拍着桌子再三叫喊，非让他穿上不可！吴强为什么对这套蒋匪军军装那么感兴趣呢？为什么要把这套早已腐烂了的反动僵尸的画皮重新拿出来呢？这难道不正说明吴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吗？难道不正说明吴强千方百计地

为蒋家王朝大唱挽歌吗？

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的历史是一部胜利的历史。在我国解放战争史上占有重大地位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大战役，是闪耀着毛主席军事思想光辉的三大胜利。涟水一仗明明是我军遵循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作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可是，吴强在《红日》中竟然把我军歪曲为涟水失利，狼狽溃退，打了一场大败仗；莱芜一仗明明是我军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以极少代价歼灭大量敌人的大胜利。可是，吴强在《红日》中居然把我军丑化为“洋相百出”，污蔑我军打了一场窝囊仗；孟良崮战役，明明是我军坚决执行毛主席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用兵如神，使敌七十四师如瓮中之鳖，全军覆没。可是，吴强在《红日》中却把我军歪曲为侥幸取胜，打了一场冒险仗。这完全是恣意篡改我军历史，妄图把我军的丰功伟绩一笔勾销，为国民党反动军队招魂立传，歌功颂德。

吴强在反动小说《红日》中恶毒地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丑化成“糊里糊涂”的“乌合之众”！同时，他还用极端恶毒的语言诅咒我军的运动战，胡说什么这是“脚板与石头作战”。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我们深深感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之流对毛主席军事思想恶毒的攻击，真如狂犬吠日，无损于太阳的光辉！

吴强拚命往我军脸上抹黑，难道仅仅是为了丑化？且慢！让我们先看一看他的黑主子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时局问题的报告》这篇黑文中的一段“精采”表白：

“军队也要整编，我们军队要取得合法化，要成为正式国

军，成为国防军，成为地方保卫队，成为自卫军。……要做到和国民党差不多”。

不打自招！刘少奇的所谓“整编”，就是要把人民子弟兵“整”得“和国民党差不多”，“编”成蒋介石的“国防军”，从而妄图从根本上消灭我人民解放军。这里，刘少奇作为反革命内奸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吴强就在《红日》中，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黑指示来了个创造性的执行，形象化的发挥，所谓“英雄”连长石东根“醉酒纵马”的场面，就是刘少奇上述阴谋的绝妙图解，借此吴强恶毒地把我人民解放军丑化成为国民党的法西斯军队。刘少奇要人民解放军脱下军装，吴强就马上巧妙而恶毒地给人民解放军穿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装。看！这一“脱”一“穿”，主子和奴才，协作得多么默契，搭配得何等紧密！

几十年来，我们党依靠人民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因而，是保卫还是攻击、是加强还是取消这支人民军队，历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焦点，刘少奇几十年的反革命历史，就是与我党争夺枪杆子的历史。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而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奴才吴强，却妄图把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取消，把人民的一切葬送，为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扫清障碍，让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这简直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队伍，是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吴强对我军的恶毒攻击和污蔑，无损于我军的一根毫毛，结果只能同其黑主子一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一支反革命的黑枪

在《红日》里，吴强突出地描写了一个被称为“神枪手”的典型人物王茂生，和一支百发百中的“神枪”。班长杨军有了这支“神枪”，就轻而易举地当上了“战斗英雄”；新战士王茂生一接过这支“神枪”，就当上了“神枪手”。他在练兵中，一枪打中了靶子，团长刘胜就号召全团“要向他学习”；在莱芜战役中，一枪击中敌师长甘成城的战马，第二天就升王为副班长；在孟良崮战役中，一枪击落了敌机，团政治处主任潘文藻当即指示“可以发展他入党”。这支被吴强描写得神乎其神的枪，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神枪”？它“神”在那里？

这里，我们必须破除这支“神枪”的种种神话，还它个庐山真面目。原来，这就是一支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的黑枪，枪枪都对准伟大的毛主席军事思想。

这支反革命的“黑枪”，第一枪对准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命根子，是我军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锐利武器，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洋洋三十七万言的《红日》，却找不出“毛泽东思想”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这不是天大的怪事吗？可是，吴强却说：“表现毛主席的运动战的军事思想，别人已经写了，我不写军事思想。”贼子狼心，不打自招。毛主席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吴强不歌颂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那末他歌颂的是什么思想？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这支反革命的“黑枪”，第二枪对准的是我们伟大的党对军队的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

容许枪指挥党。”多年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拚命地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竭力鼓吹什么“一长制”是我军“建军方向”。他们怎么说，吴强就怎么写，真是反共一家，心心相印。在《红日》中，军事干部一手遮天，独断专行，没有开过一次党委会和支委会，把党的坚强领导和党委的集体领导作用一笔抹杀。毛主席教导我们：“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在小说中，石东根这个“英雄连队”的党支部完全陷入瘫痪，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不见了，只看到连长石东根在那里耀武扬威，身为党支部书记的罗光从不对党员进行教育，只会扮作“金殿装疯赵小姐”，成了一个可笑的小丑。吴强曾大言不惭地说：“《红日》就是要突出军事首长的作用。”果真如此，《红日》就是突出了“枪指挥党”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为彭德怀、罗瑞卿推行的“一长制”，树立了一个活龙活现的黑标本。

这支反革命的“黑枪”，第三枪对准的是我军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根本原则。在《红日》里，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统统被抹杀了；政工干部名存实亡，只会跟在军事干部屁股后面团团转，根本不做政治思想工作。相反，吴强却用大量篇幅，细致地描写练兵、演习、实弹射击等军事活动，大树特树“军事第一”的典型，连长石东根就是一个大搞军事第一的活样板。小说在写他打了大胜仗后和文化教员田原一起搞战斗总结时，摸着脑袋说：“脑子长在头上！马列主义？我没有！”一个根本不懂政治，没有一丝一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居然还打了大胜仗，成了全军的典型，总结了一套倍受军长赞赏的作战“经验”。这是什么“经验”？这是一份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的黑经验，是彭德怀、罗瑞卿极力兜售的“军事第一”的黑货。

吴强为什么要拚命神化这支反革命的黑枪？看看《红日》的

出笼就清楚了。解放以后，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之流，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吴强则步步紧跟，不甘落后。就在这时，他开始构思《红日》。到一九五七年，彭德怀、罗瑞卿和右派分子一起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吴强的《红日》就破门而出了。正因为《红日》里有这样一支反革命的“神枪”，所以，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如获至宝，马上抓住不放，紧紧攥在手里，妄图使用这支黑枪，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真是狼子野心，恶毒至极！

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搞军事第一，历来是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焦点。我军从建军的第一天起，就把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当作建军的核心。我们要永远忠于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战斗终生！

### 一具妄图反攻大陆的僵尸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党内的头号代理人，是人民公敌蒋该死反共反人民的老搭档。几十年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对这个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蒋该死，吹捧得天花乱坠。吴强在《红日》中对张灵甫的精心刻划，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吹捧人民公敌蒋该死黑话的再现。

吴强这个国民党特务、共产党的叛徒、蒋该死的忠实走卒，连做梦也在想着他的老主子蒋该死重返大陆，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为他的黑主子蒋该死效劳。

他在挖空心思炮制《红日》这部反革命小说时，特地从孟良崮的乱尸堆里，刨出了一具早已被我军击毙的国民党反动派七

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尸体，把他当做小说的主人公来塑造。为什么吴强要着重描写张灵甫这具僵尸呢？因为张灵甫和七十四师，是反动头子蒋该死经常吹嘘的一张“王牌”。吴强心目中的张灵甫，就是人民公敌蒋该死的化身。请看，吴强是怎样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竭力通过美化张灵甫这具僵尸，达到美化蒋该死的反革命目的的。

为了美化这具僵尸，小说在张灵甫没有出场前，就用了整整十三章的篇幅，为张灵甫的登场表演大造声势，鸣锣开道。如吴强借我军战士之口，大肆渲染七十四师“训练严格”，“大炮凶、敢冲锋”；通过描写国民党反动派的杂牌部队，反衬七十四师是块“硬骨头”，不好啃。这样，当这个蒋该死的忠实走狗张灵甫还没有出场时，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一个反革命的“英雄”形象就已被吴强精心烘托出来了。

为了美化这具僵尸，吴强突出地描写了张灵甫出场的情景。安排了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张灵甫登上了孟良崮的顶峰，“傲然地瞰视”眼下的战场，为他唱出了“立马沂蒙第一峰”的诗句。为了美化这具僵尸，吴强使尽浑身解数，精心描绘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英勇奋战，临死不惧”，对张灵甫的反革命“风度”作了淋漓尽致的刻划。当张灵甫和他的七十四师陷入我军重围，孟良崮周围的高地相继失守时，张灵甫仍然“声色不动，镇定如常”。当七十四师节节败退，接连被歼，我军攻到敌指挥所时，张灵甫对着劝降的张小甫，歇斯底里地狂吼：“我不怕牺牲！我要战到底！”当张灵甫死到临头时，他还端着手枪进行顽抗，喊出了蒋该死反共到底、“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誓言。

难道张灵甫果真象吴强描写的那样象个“英雄”吗？不！这完全是弥天大谎。历史是见证人。我们部队参加过当年的孟良崮



化大革命铁流的强大冲击下，这支拿着笔杆子的反共队伍已经溃不成军，露出了纸老虎的原形。但这伙反革命分子，困兽犹斗，负隅顽抗，妄想作垂死挣扎。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动一场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象当年全歼蒋匪军七十四师那样，打一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孟良崮”战役，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他们消灭掉！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 彻底砸烂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天白日”

——评吴强的反动小说《红日》

济南文 解胜文

伟大的解放战争，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同拿枪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经过这场大决战，国民党的反动政权，象一只插着“青天白日”破旗的破船，在人民革命的狂风巨浪中沉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象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普照着祖国的大地。但是，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英明预示的：“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同不拿枪的、甚至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这是又一场关系中国和世界命运的大决战。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这两场大决战的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精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仍然是政权问题。

要知道蒋介石王朝崩溃之后，那些“蒋家王朝的代表人物”是怎样潜伏在大陆上，甚至钻进我们共产党内，以更加狡猾的两面派手法，进行反革命复辟阴谋活动的么？要知道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怎样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相互勾结，合伙进行反革命复辟阴谋活动的么？要知道这些党内的走资派是怎样在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中，起了蒋介石和地、富、反、坏、右所起不到的作用的么？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由国民党特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吴强和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黑干将陈丕显、周扬之流合伙炮制，名为歌颂红日，实则歌颂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天白日”的反动小说《红日》，就是一份绝妙的反面教材。

## 一出反革命丑剧

先让我们从反动小说《红日》出笼的前前后后，看一看吴强和陈丕显之流合演的一出反革命丑剧。

这出丑剧，分为三幕。

第一幕叫潜伏与出笼。一九五二年，窃踞华东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要职，千方百计用资产阶级文化腐蚀人民军队的吴强，从人民解放军里被清扫出来了。这时候的吴强，虽然还没有暴露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但已开始露出他对毛泽东思想和人民军队刻骨仇恨的面目。当他看到江青同志亲自培植的宣传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影片《南征北战》诞生时，就在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的指挥下，大写黑文，进行围攻。他决心用同样的题材写一部小说，与《南征北战》唱对台戏。此时，窃踞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要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大叛徒彭柏山，看中了吴强，伙同上海的几个走资派，把吴强拉到上海，让他当上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的副处长。从此，早



就妄图使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和干将——胡风、路翎打进军内的吴强，就更加积极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当内奸。一九五五年，在反胡风运动中，吴强的狐狸尾巴被捉住了。富有反革命斗争经验的吴强，便跑到他的“老上级”、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那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反诬别人“陷害”他。陈丕显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打气，叫他顶住，还派小汽车把他送了回去。就这样，吴强被包庇下来了。当过国民党沭阳县党部机关报编辑，每天都要向国民党党部迎门那块“青天白日”屏风“三鞠躬”，专写反共反人民文章的特务分子吴强，深知国民党反动派代理人让他继续潜伏下来的用意，便继续利用文艺这个武器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他遵照周扬“不要开始写就想到要写一个什么战略思想”即不准写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黑指示，舞起黑笔杆，日夜炮制大毒草《红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陈丕显之流，对吴强的这种反革命劲头十分赏识。国民党特务吴强，没有辜负他的新靠山、新主子的栽培。一九五七年，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吴强一面发出了《谈拆“墙”》的反革命信号，一面用他的反动小说《红日》作为武器，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挖墙脚来了。

丑剧的第二幕叫请功与领赏。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反动小说《红日》出笼后，周扬吹捧它是“中国第一部战争文学巨著”，把吴强捧上了中国战争文学“主将”的宝座，并替吴强向正在猖狂反华的苏修叛徒集团请功，把《红日》推荐给了苏修。苏修一看，正中下怀，马上把它译成俄文，大量出版。特务和叛徒是亲家。吴强为了进一步向苏修叛徒集团请功，便赤膊上阵，在给俄文版写序时，把中文版《序言》中仅有的用来作幌子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几个字也

一笔砍掉，并声称他与苏修叛徒集团是“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一九六〇年，资产阶级司令部派吴强到苏联“访问”，吴强便一头扎进苏修叛徒集团的怀抱，说什么“在苏联，我感到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干起里通外国的罪恶勾当来了。一九六二年，在帝、修、反大搞反华大合唱的鼓噪声中，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此时，周扬又给了吴强一个向蒋介石领赏的机会。吴强心领神会，与反共老手瞿白音一起，抛出了反动影片《红日》，更加露骨地为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招魂。请看，为在中国进行反革命复辟阴谋活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得多么密切！

丑剧的第三幕叫退兵与反扑。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燃遍全国。反动影片《红日》受到了批判，革命烈火眼看就要烧到吴强身上。烧到吴强身上，岂不是就烧到陈丕显身上，烧到了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陈丕显一面布置退兵的策略，说什么《红日》“小说中的问题还是和电影有些区别”，指使吴强到处散布空气，说电影《红日》是背着 he 搞出来的，他对瞿白音等人还是有抵制的，等等，鬼话连篇，妄图钉住黑盖，掩住黑幕，保存黑班底。另一方面，陈丕显又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组织反扑，亲自打长途电话把吴强从常熟召回上海，亲自布置，亲自掌握，要吴强一伙重写电影剧本《红日》。什么小说与电影“有些区别”！它们都是盘在国民党反动派“青天白日”上的毒蛇，而且小说《红日》这条毒蛇伪装得更巧妙，隐藏得更深，揪住这一条，就能揪出一窝。这就非揪出来不可！陈丕显原想在“区别”的烟幕里反咬一口，逃之夭夭。但是，正象从批判《海瑞罢官》突破彭真黑帮的反革命独立王国一

样，陈丕显亲自参加演出的这场退兵与反扑丑剧，反而给自己在上海建立的反革命独立王国揭开了黑幕的一角，使人们更加看清了：一北一南，两个反革命独立王国，都是连在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那根黑线上的。

反动小说《红日》出笼的前前后后，陈丕显和吴强之流合演的这出反革命多幕丑剧，以及我们对他们的揭露和批判，就是活生生的两个斗争的继续。陈丕显曾说：“吴强是我们队伍里的人嘛！”陈丕显所说的“队伍”，就是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统率下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今天，是彻底清洗这支反革命别动队的时候了！

### 一块为蒋家王朝招魂的黑碑

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匪首张灵甫被击毙以后，我军把他埋在孟良崮的一个小镇上，还写上了一条标语：“警告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顽固派，若不弃暗投明，向人民投降，张灵甫就是你们的下场！”直吓得国民党的乌龟王八胆颤心惊。那时，躲在南京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为他的“御林军”被歼而伤心，特地在玄武湖边为张灵甫立了一块狗碑，寄托他苟延残喘，“保住半壁江山”，以便卷土重来的反革命希望。然而，不到两年，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炮火，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砸烂了这块黑碑。

国民党的黑碑虽然被打烂了，国民党特务吴强之流企图在

中国复辟的希望却从未停息过。“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他们希望蒋家王朝卷土重来。全国解放才两个月，吴强就站在厦门岛上，看着大海的波涛，涌起了怀念蒋家王朝的无限“思绪”。不过，吴强知道，在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土地上，明目张胆地再为张灵甫立碑是不可能了。于是，他就在国民党代理人的“殷切关怀”下，日夜炮制大毒草《红日》，为张灵甫大唱挽歌。《红日》就是一块为国民党反动派招魂打气的黑碑。

吴强在为张灵甫树碑立传时，倾注了他的全部反革命狂热和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他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张灵甫的幽灵上。他对张灵甫的描绘，反映了整个被推翻了的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攻复辟迷梦。他把他卖身投靠国民党，从事反共活动的全部本领，都施展了出来，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把张灵甫和他的七十四师，写得好象“天将神兵”。你看，张灵甫陷入我军包围，照样“睡得很酣沉”，仍呈现着“乐观自豪的神态”，甚至还想来个“中心开花”，“创造一个惊人的奇迹”，“解决山东战局”。吴强绘声绘色地描写“七十四师，正和孟良崮高峰一样，巍峨屹立，气概雄伟，任何力量永远打它不倒”，赞叹张灵甫是“有气概、有作为的人”，他的“气色、风度，就是七十四师的灵魂，就是天下无敌的标志”。这种肉麻到极点的吹捧，充斥全书。事实上，早就想借故离开战场，避免被歼灭命运的张灵甫和七十四师，刚陷入我军重围，就一片慌乱。张灵甫向南京声嘶力竭地求救。他换上便衣，妄图逃命，又怕蒙混不过去，最后，换上士兵服，想混在被俘的士兵群中。整个七十四师，更是被打得无法招架，丢枪枝，挂白旗，举手投降，动作特别熟练，出尽了丑相。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在孟良崮的覆没，是它的反动军队的本质决定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的缩影。可是，吴强却胡说什么张灵甫“打对了九十

九仗”，只是“这一仗打错了”，好象张灵甫是个“常胜将军”，只是因为骄傲才失败了。看，吴强为张灵甫涂脂抹粉，到了什么程度！

吴强歪曲历史真实，拚命为张灵甫涂脂抹粉，只是为了歌颂张灵甫一个人吗？不。阶级斗争从来不是什么个别人的行动。吴强的行为是反革命阶级、集团的行为，是为整个剥削阶级效劳的。请听吴强是怎样借张灵甫的嘴，为他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发出歇斯底里嚎叫的：什么“让共产党知道我的厉害”，什么“歼灭共产党军队”，什么“跟共产党和平，就是向共产党投降”，什么“我绝不相信我们就从此完结！”什么“我不怕牺牲！我要战到底！我不会死！我要征服共产党！”听听这魔鬼的语言，发自什么人的心腑？！好一个“我要战到底！”“我要征服共产党！”一语道破了吴强写《红日》的罪恶目的。这些梦呓，不只是张灵甫的灵魂，更是吴强的灵魂，《红日》的灵魂，台湾蒋介石的灵魂，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灵魂。这是在表明：吴强和他的国民党并没有死心，他们“绝不相信就从此完结”，他们还要和共产党“战到底”，他们正日夜做着“征服共产党”的反革命迷梦。共产党“被征服”，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恢复，吴强的如意算盘打得噼啪响。在这里，他的反共反人民的野心达到了最狂热的顶峰。他就是想用反动小说《红日》，在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心中树起“必胜的信心”，引起他们反攻复辟，“征服共产党”的反革命狂想，要他们“坚持到底”，要他们以“最高的自信”相信反动政权会卷土重来。《红日》就是这样一块为鼓舞反革命士气而立在国民党余孽心中的精神之碑。

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妄想反攻大陆，吴强欣喜若狂，以为“征服共产党”的机会到了，特意在他伙同瞿白音之流炮制的反动电影《红日》里，增加了张灵甫威风凛凛地站在涟水城宝塔前

留影的反动情节，把反革命黑碑树得更高。要知道，这个宝塔曾经是我军消灭大量国民党匪徒的机枪阵地，吓破了敌人的狗胆。吴强公然捏造这种颠倒黑白的反动情节，把我军杀敌阵地作为张灵甫的“记功碑”，拼命为国民党反动派打气。这件事情，也无情地暴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周扬之流鼓吹的“写真实”论，都是无耻的骗局，他们的“写真实”论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透过《红日》字里行间，我们清楚地看到，站在张灵甫背后的，就是吴强这个反革命魔鬼；而站在吴强背后支持吴强的，又是一群与蒋介石异床同梦的国民党代理人。看看吴强的反革命狂热的表演，听听他的极端仇恨共产党的嚎叫，完全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从蒋介石在玄武湖边为张灵甫树狗碑到这块狗碑被砸，从吴强又利用小说为国民党反动派树黑碑到这块黑碑又被砸，决不是一件小事情，决不仅仅是一块碑、一本小说的问题，而是围绕“权”字而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碑，是政权的象征。

历史是无情的。吴强吹了一大通牛，发了一大通狂，用《红日》为反动政权树起了一块招魂的黑碑。可是，这块黑碑，到头来还是变成茅坑里的臭石头。吴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彻底暴露了他是代表国民党向共产党进攻的反革命吹鼓手。吹牛终究只是吹牛，蒋介石八百万匪军决不会因为吴强的吹捧而还魂归来。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较量了几十年，还不知他们的底

细？几十年仗打下来了，只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是无敌于天下的军队，蒋介石的国民党匪军再多也不过是一堆粪土。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代理人想靠一撮粪土卷“土”重来，结果只能是彻底完蛋，进入坟墓。

## 一把阉割人们革命灵魂的毒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过去，国民党蒋介石舞弄反革命屠刀，妄图把中国改造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把中国永远引向黑暗。但是，他们彻底失败了，完蛋了。经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长期斗争，被剥削阶级统治了几千年的旧中国，终于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然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并不死心，国民党蒋介石并不死心，吴强们并不死心，他们还想继续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中国。不过，他们变换了反革命的斗争策略和形式。他们知道，今天，要想明火执仗地打着“青天白日”旗，挥着血淋淋的屠刀，来与共产党决战是不可能了。他们妄图凭借几千年的反动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造成的某种“基础”，来与共产党决战。为此，他们需要变一变，伪装一下。于是，在吴强之流的努力下，“青天白日”变成了“红日”，血淋淋的屠刀变成了“小说”，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不是吗？请看小说中一把不知杀害过我们多少军民的指挥刀，被我军缴获了，吴强却把它拣起来，塞进解放军连长石东根手里，大挥大舞，引人哈哈大笑，变成了表现“个性”，“塑造人物”的“道具”。就这样，屠刀上的血污和罪恶被轻易地掩盖过去，而以另一种方式杀人——裹上拌着砒霜的蜜糖，在不知不觉中阉割人们的革命灵魂，抹

去人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警惕和仇恨，甚至变为他们进行复辟活动的爪牙，这就叫“软刀子杀人”。《红日》正是这样一把毒汁四溢的毒刀！我们与吴强的斗争，我们对《红日》的批判，正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请看吴强是怎样把屠刀变成“小说”，在“小说”中藏着毒刀的。

吴强在《红日》这本反动小说中，首先不遗余力地宣扬了修正主义的战争观。吴强用“惊惶的眼色，颤抖的声音，恳切的悲酸的言语”来拚命渲染战争的恐怖。翻开《红日》，从头到尾找不到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揭露，看不到我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壮举。满篇皆是敌人找我军“拚战一场”，我军找敌人“出闷气”，“报私仇”。双方都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无止境地相互残杀，而使百姓受害。吴强完全跟在修正主义者的屁股后面，妄图抹杀战争的阶级性，抹杀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抹杀革命战争“是拯救人类的旗帜”。

至于鼓吹“战争毁灭一切”，这是修正主义者的老伎俩了，吴强当然也丢不了。他咒骂着战争是“痛苦和死亡的魔鬼”，“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和幸福”，叫嚷战争弄得“哪个庄子、集镇没有黑墙框子？”还有什么“惧怖的嘶叫声”，“断了手的手腕插入在泥土里，泥土和血胶在一起”，“使人感到心酸难受”和“战斗的恐惧”。吴强真是骂的一切战争？不！他骂的是共产党，骂的是人民革命战争。他公然在小说里指桑骂槐地大骂：“烧了的房子还没盖好，你们……又打！打不够！弄得你神魂不安，鸡犬不宁！同志！不能不打吗？”气势汹汹地质问：“就只有打了？”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责推到共产党身上，完全和当年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首蒋介石发表的所谓“求和”声明一个腔调！



照吴强看来，战争这样可怕，还是应该按照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办法，把枪杆子交出去，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这样就有“和平民主新阶段”了。一句话，就是要让国民党反动派继续统治下去，用心真是恶毒透顶。

吴强在挥舞了一阵修正主义战争观的毒刀之后，又在刀上涂上另一种毒药：活命，享乐，谈情说爱，拚命鼓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鼓吹活命哲学，“钟爱自己”，吴强就叫嚷：人，总希望“享长福，过长寿”。因此，遇到敌人炮弹，得“紧紧地抱着脑袋，把身子缩成一个团团，挤轧在掩蔽部的最里边”。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鼓吹“我们的革命就是靠物质刺激”，吴强的黑书里就有动员部队到山东去是用烟台的苹果，肥城的“一线红”桃子；“多捉俘虏，多缴枪”，就“有肉吃”；谁仗打得好，谁就能喝到“一杯一杯又一杯”的老酒，直到“喝得个烂醉”。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鼓吹“男人加女人”的“辩证法”，提倡建立“婚姻介绍所”，《红日》里就把我军从军长到“所有军官”到战士，都写成一见女人就挪不动腿，感到“新鲜”、“快慰”、“温暖”；鼓吹什么要能找到一个“漂亮的老婆”，“就不当兵了”，甚至“只活上三天就够了”！

肮脏！无耻！哪里还有一丝一息革命的味道！

这分明是国民党文化加上修正主义破烂货的大展览！这是国民党御用文人怀着阶级仇恨，对我伟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恶毒污蔑和丑化！这是一帖妄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变人民军队颜色的剧毒药品！巍巍长城不可侮。吴强如此刻毒污蔑人民军队，罪该万死！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吴强写的这一切，正是他和他的主子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灵魂的真实写照。吴强这个国民党狗特务，生活十分糜烂下流，又是个老吸血鬼。他游山逛水，住高级饭馆，从不给钱，还摆出一副国民党军阀的凶相，喝骂服务员。他积极炮制大毒草，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就用大量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犒赏吴强。吴强竟得意地说：“我只要一个标点符号，就够你们吃的了！”

从小说《红日》到吴强自己，全都散发着糜烂的资本主义臭气。我们对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要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的权偷去或骗去。这是关系到千百万人民掉不掉脑袋的大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吴强的《红日》，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代表着台湾的蒋介石和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向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一次严重挑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它，彻底肃清他们的一切流毒！不过，我们也要告诉吴强之流，你们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破烂货，实在是不堪一击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足以粉碎一切旧思想、旧文化在一切领域里的一切挑战。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总攻击的大战役。这次大战役，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普及，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在受到空前的大扫除。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不仅能够巩固和发展所有制革命方面的伟大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全面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

## 一条篡军复辟的黑轨

吴强这个反革命的小丑，在反动小说《红日》受到国内外牛鬼蛇神的捧场喝采之后，曾得意忘形地泄露了他这本黑书是“沿着一条轨道”写的，所以很“顺利地走完了这一段写作路程”。

吴强是沿着一条什么“轨道”炮制大毒草《红日》的？答案很明白：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轨道，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黑主将彭德怀篡军复辟的轨道。吴强和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本来就是一条道上的人，沿着主子制定的反动路线行走，当然是十分“顺利”了。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也就是国民党的军事路线，其根本目的是妄图拉着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沿着他们的路线走过去，把我军蜕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且看吴强是怎么“顺利”地在那条黑轨上行走的吧。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胜利。吴强狗胆包天，竟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全书没有一处写到指战员在传达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没有一处写到指战员在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却极其恶毒地让一个“英雄”在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时，“皱起眉头”，“额角上”冒出了“焦急的汗珠”。吴强明目张胆地污蔑、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攻击毛泽东思想“在许多情况下”“已不适用了”，和彭德怀不准挂毛主席像，不让喊“毛主席万岁”，一脉相承。吴强反动透顶，罪该万死！

对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吴强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攻击。吴强明知涟水战役中我军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在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后，主动放弃涟水空城，诱敌深入，

是极其英明的一着。但是，在他笔下，竟变成“涟水城陷落到敌人手中”，我军被打得“班找不到排，排找不到连”，一败涂地，无法收拾。在孟良崮战役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把敌七十四师从敌人重兵密集，齐头并进的集团中挖了出来，实行三面包围，然后抓住有利战机，奔袭垛庄，敌背插刀，切断敌人的退路，速战速决，在孟良崮全歼敌七十四师，击毙张灵甫，取得了辉煌胜利。然而，在吴强笔下，这次战役中，全军上下，对“上级意图”都是“胡里胡涂”，不知道为谁而打仗。吴强妄图用这种手法来否定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指导意义，用心何其恶毒！

在《红日》里，一点看不到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黑货却应有尽有。

毛主席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反动小说《红日》，厚厚一大本，仅提到一次被丑化得不成样子的党支部会。全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称职的：军政委是只会跟在军长后面哼哼哈哈的傀儡；团政委陈坚是“嘴上说得好听”的“空头政治家”；团政治处主任潘文藻是迷信大炮的悲观论者；营教导员只露了两面就死了；连指导员是“哪里有笑声，他就到那里，他一到，笑声也就跟着扩大起来”的小丑……这些人，整天只会叫唤“政治工作不好做”“马列主义，我没有！”其他人就跟着说：“你没有，我更没有！”完全否认了毛主席亲自创立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完全否认我军靠政治打仗的根本方向。整部小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有的只是带“长”字的发号施令，有的只是资产阶级政治。这和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革命不一定要共产党领导”，和彭德怀、罗瑞卿等等反党野心家鼓吹的“一长制”是“建设的方向”，完全是一

个调子！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基本出发点。对待人民战争的态度是两条军事路线的根本分水岭。吴强也写了人民群众，但却是“惶急的、恐惧的、凄惨的逃难者”，是见了敌人只会“紧贴着岸边磕磕颠颠地”逃跑，整天哭叫着“不能不打吗？”的怕死鬼。群众支前，不是“扎的木排不够用”，就是找一条老牛拖一辆破车，“怎么也抬不起腿来”；民兵去打仗，总是“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吴强对人民战争和人民群众的诬蔑和攻击，疯狂到了极点。

不要毛泽东思想，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要坚强的政治工作，不要人民群众，吴强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彭德怀、罗瑞卿的“技术决定一切”“武器决定一切”“军事决定一切”的资产阶级政治。

反动小说《红日》从头到底，就贯穿着这样一根又粗又黑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哼哈二将彭德怀、罗瑞卿之流篡军复辟的黑线。吴强高叫他“不是写军事思想”，鬼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话很别扭，总是言不及义，需要我们给予注解：吴强是专写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军事思想，疯狂攻击毛主席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人民军队和劳动人民的生命线。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和蒋介石王朝代表人物——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等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就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今天，《红日》这株用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写成的毒草，终于被连根带梢拔出来了。亿万革命人

民胜利前进的雄伟步伐，踏碎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青天白日”梦。我们要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篡军复辟的黑线、黑轨，彻底砸烂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天白日”！让这些碰壁苍蝇去嗡嗡叫，去抽泣吧！

（原载《解放日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以下文字因模糊严重，无法准确识别，疑似为另一段被遮挡或模糊的正文内容）

## 叛人民战争之道的黑标本

——彻底批判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

### 音 文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归根到底，就是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以人民战争反对反人民战争。敢不敢进行人民战争，是敢不敢革命的试金石；拥护还是反对人民战争，是真革命和假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象蛆虫惧怕阳光一样，害怕人民战争，发出咒骂、诋毁人民战争的猖狂吠。中国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分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都是人民战争的叛徒。积极追随、执行王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周扬等“四条汉子”，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划时代巨著中所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反对毛主席在《讲话》中所制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以及关于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无产阶级文艺的最高原则，大刮反“火药味”、“离经叛道”论等黑风。他们打着“创新”的旗号，贩卖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的黑货。

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就是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

线上的一个毒瓜，是叛人民战争之道的黑标本。周扬曾不止一次地对《铁道游击队》加以吹捧，列为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而且向国外推销，扩大其反革命的政治影响。周扬所以对《铁道游击队》如此器重，就是因为它适应了帝、修、反的政治需要。它露骨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公开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特别恶毒的是，它打着反映人民战争的招牌，进行歪曲、攻击人民战争的罪恶勾当，对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 (一)

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必须有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这是人民战争的主要组织形式。这支军队，不论主力兵团，还是地方部队，不论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和民兵，都必须置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纲领，才能战胜重重困难，绕过急流险滩，把人民战争的历史巨轮，驶向胜利的彼岸。

毛主席教导我们：“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就是怀着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崇高意愿，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建立了永垂史册的伟大功勋，夺取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但是，《铁道游击队》中所描绘的游击队员，却都是一些个人主义者，他们到人民队伍里来，都是抱着不同的个人目的。有的是为了“找出路”，有的是为了“混饭吃”，有的是为了“感恩”，有的是为了“报仇”。他们的思想基础，不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而是建立在所谓“讲义气”、“够朋友”上。大队长刘洪所以能成为“众望所归”



的人物，就是因为他“讲义气”、“够朋友”，“跟着他不会吃亏”。就连上级党派来的政委李正，这个所谓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优秀政治工作干部，到了铁道游击队以后，不仅不以党性原则和革命精神来教育队员，反而被他们的“讲义气”、“够朋友”所溶化，也变成了开口“义气”，闭口“朋友”的江湖侠客。“讲义气”、“够朋友”成了铁道游击队队员们行动的宗旨，衡量是非的标准，鉴别好人和坏人的准则。毒草小说宣扬的什么“讲义气”、“够朋友”，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鼓吹的“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修正主义者所贩卖的“人和人是兄弟”，“人和人是朋友”，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在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表现在政治上，必然是阶级投降主义。不论是地主、汉奸、反动派，都可以在“讲义气”、“够朋友”的帷幕掩盖下，称兄道弟，握手言欢。政委李正不就和那些地主、伪保长、汉奸打得火热，互相称颂“够朋友”、“讲义气”吗？分队长小坡面对着可耻叛徒，不是依然在大讲什么“义气”、“朋友”，对叛徒进行所谓“感化”吗？在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表现在组织上，必然是招降纳叛。有个叫李九的土匪，是个国民党兵痞，他明抢暗夺，打家劫舍，聚赌宿娼，无恶不作。但在刘洪看来，他却是个“讲义气”、“够朋友”的好汉，千方百计地要把他拉入铁道游击队，后来这个人在宿娼时被鬼子打死，刘洪还非常惋惜，说他是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真是奇谈怪论！毛主席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毒草小说炮制者竟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把陈腐不堪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硬加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身上，这是对伟大的人民军队的恶毒诬蔑，是妄图从根本上篡改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

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却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丑化成一伙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它的基本队员并不是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所说的是什么“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而大多是所谓“偷鬼子”、“吃两条线”的无业游民。他们挂着“人民战士”的招牌，酗酒、纵赌、争吵、哭闹，是个十足的流氓集团。不仅建队初期如此，就是经过了进山整训和一系列战斗之后，他们身上无业游民阶层的“破坏性”，有增无已。正副分队长林忠和鲁汉，在执行任务时，竟不顾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和人民军队的铁的纪律，私自潜入群众家里喝酒，结果在酒醉后被敌人包围，他俩和另外两个队员，都做了无谓的牺牲。在林忠、鲁汉牺牲之后，他们不是化悲痛为力量，更勇猛地打击敌人，而是呼天叫地，哭哭闹闹。“喝醉了酒，在草铺上喊着林忠、鲁汉的名字哭泣。”王强则完全丧失了理智，不顾毛主席的俘虏政策，随意举枪打死两个俘虏。这那里还有一点人民军队的气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直疯狂反对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鼓吹写英雄人物的“阴暗面”、“落后面”，就是要否定和丑化工农兵英雄形象，就是要使诬蔑工农兵形象的反革命理论合法化。毒草小说炮制者居心叵测地丑化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说明他是周扬反革命理论的忠实执行者。

人民军队靠什么打仗？靠什么战胜敌人？靠政治，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铁道游击队》中的游击队员，却是靠所谓“勇敢”、“技术”去打仗。毒草小说炮制者极尽全力夸大渲染彭亮开车的超人技术，林忠打旗挂钩的神奇本领，刘洪扒飞车的独特技能。把这些说成是取得胜利的法宝，靠了这些技术，才能飞车搞机枪、打布车、粮车，进行票车上的战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技术是有一定作用的，但这绝不是根本。克

敌制胜的根本是毛泽东思想，而决不是靠什么特殊技能。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年代，转战南北，用革命的暴力夺取了政权，在革命政权建立以后，又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红色江山的忠实保卫者。毒草炮制者对人民军队进行恶毒的丑化和诬蔑，妄图毁我长城，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 (二)

人民战争的基础是人民群众，他们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进行人民战争，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首先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结成工农两大阶级的联盟，这是人民战争的可靠的、坚固的群众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联合其他阶级、阶层的革命分子，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胜利地进行人民战争。

但是，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却极力诽谤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丑化人民群众。在这数十万言的毒草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党和人民军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场面，看不到军民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看不到人民群众在人民战争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更看不到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英雄人物。在毒草小说炮制者的笔下，群众只是可有可无的陪衬，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在敌人的刺刀下，他们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日本鬼子扫荡时，我们听到的是男人的叫骂和妇孺的哭泣。日寇屠杀我抗日军民时，他们“都在哭叫声里流着眼泪”。他们听到日寇小头目的名字，吓得“头发梢就打扎撒”。他们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当铁道游击队被鬼子包围的时候，不敢挺身而出掩护、支援自己的部队，而是“默默地为铁道游击

队的安全而祈祷着”。我们英雄的人民，在毒草小说炮制者的黑笔下，完全是一些任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是一些任人宰割的奴隶，是一些逆来顺受、哭哭啼啼的宿命论者。

当然，毒草小说的炮制者也煞费苦心地写了两个群众中的所谓“英雄”人物，这就是芳林嫂和冯老头。这两个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被一根俗不可耐的、腐朽不堪的资产阶级爱情的黑线牵动着。芳林嫂是为“英雄”刘洪所精心安排的“美人”，冯老头是为这对战火中不寻常的情侣奔波、牵线的“月老”。这一老一少，一男一女的“群众代表”，披的是工农外衣，但灵魂深处却是资产阶级王国。作品不仅通过他们把个人幸福和革命战争对立起来，极力宣扬战争恐怖，诋毁人民战争，而且丑化了军民关系，丑化了人民群众。在毒草小说的炮制者看来，人民群众支持自己的军队，不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而是被诸如爱情等等的个人主义动机所驱使。这个芳林嫂，她对铁道游击队的所谓支持、帮助、关心，完全是出自对刘洪一见钟情的爱情。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与民族敌人，阶级敌人的生死斗争中，他们竟进行着卿卿我我的热恋。芳林嫂就是一个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女性，这种人，为了爱情，可以“支持”革命，同样，为了她的所谓“爱情”和“幸福”，也可以叛卖革命。难道依靠这样的人，能够进行人民战争吗？

而冯老头，除了在刘洪、芳林嫂的爱情纠葛里插科打诨以外，就是喋喋不休地吹嘘自己的所谓“光荣”历史，他的这段“光荣”史，就是在大革命中加入了共产党，而在大革命失败后，经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当了逃兵。这种人，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出来凑凑热闹，而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会溜之大吉，甚至做革命的叛徒。依靠这样的人，难道能进行人民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吗？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毒草小说对广大人民群众肆意歪曲、丑化，就是妄图挖掉人民战争的群众基础，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从根本上否定人民战争，为帝、修、反效劳。

### (三)

人民战争，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开展人民战争，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中国革命所走过的人民战争的胜利道路，也是世界革命正在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和毛主席的教导背道而驰，这支游击队，对群众不宣传，不组织，不武装，不去建立革命政权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支游击队，是典型的黄巢、李闯式的流寇队伍，它象断了线的风筝，到处飘摇不定。他们这支队伍，似乎人越少越好，其来源多是“扒车”“吃两线”的“穷哥们”，他们可以不要根据地，不要革命政权，可以不要人民的支援，相反，他们倒成了“救世主”，他们不搞布车，主力兵团就穿不上棉衣，他们不搞粮车，群众便要挨饿。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武装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夺取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有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的牢固观念。而铁道游击队则是一伙毫无政权观念，毫无建设根据地思想的“流寇”。这样，他们在顺利的环境下，还可以闯来闯去，而环境恶化以后，就一筹莫展，

无立锥之地了。第一次退却，就是因为敌伪顽的夹击下，坚持不住，被迫进山整训。而在整训出山以后，他们连住宿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他们不敢傍庄边，夜里睡在雪窝，白天被鬼子赶得吐血”，“不得不待在船上在湖里打转游”。

在毒草小说炮制者的笔下，这支游击队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去热衷于做所谓“上层工作”，来“感化”那些地主、保长、汉奸。政委李正说：“要注意上层工作”，“要善于和他们接触，了解并争取他们。”由于他们煞费苦心的经营，果然那些保长、汉奸、地主都俯首贴耳的“顺从”他们了。“一个通知下去，所有的伪保长都来开会”。伪保长给他们通风报信，派粮派伙，地主给他们送吃送喝，汉奸为他们站岗放哨。于是，他们十分乐观地认为：“已经完全隐蔽在人民的海洋里了。”这是地地道道的“和平过渡”“和平长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保长、汉奸，是日寇伪政权中的反动人物。对于他们中间的矛盾也可以利用，把他们的争斗、缺口、矛盾，统统集中起来，作为反对最主要的敌人之用。但是，绝不能对他们存有任何幻想，更不能把他们当作依靠力量。而对于地主、保长、汉奸们所支撑的伪政权，必须坚决用枪杆子彻底摧毁，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伪政权是绝不可能“和平改造”成革命政权的。武装夺取政权，彻底打碎旧的政权机器，还是对旧的政权进行改良，实行所谓“和平过渡”，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赫鲁晓夫鼓吹“议会道路”，大做所谓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赢得政权的修正主义迷梦。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则鼓吹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胡说什么“不是一切国家都可以进行武装斗争”，叫嚷要进行“议会斗争”，他甚至梳装打扮，送上门去，要到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当“大官”、做“要员”。这些无产阶级的

叛徒，是帝、修、反的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是帝、修、反的“别动队”。其罪恶目的，就是要人民群众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武装革命，维持帝、修、反的反动统治。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所贩卖的，就是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暴力革命，用枪杆子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新政权。

#### (四)

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革命战争中，会打破一些坛坛罐罐，在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是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但它却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砸烂手上的镣铐，而赢得整个世界。革命战争使革命人民锻炼得更加坚强，革命战争推动历史以空前的速度胜利前进。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等“四条汉子”，秉承其黑主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旨意，大肆宣扬战争恐怖，胡说什么“这里不但有血，还有那数不清的眼睛所流的眼泪”，恶毒咒骂革命战争的“每一声枪炮的发响，都将伴随着流血和死亡”。毒草小说炮制者，是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忠实走卒，他阴险地以写革命战争为幌子，极力渲染战争恐怖，贩卖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在他的黑笔下，革命战争成了阴森可怕的“魔影”，它给人民带来的不是战斗的欣喜、胜利的欢乐、革命的成果，而是灾难、饥饿、悲惨、死亡。人民群众不是革命战争的热情拥护者和积极参加者，而是害战争恐惧病的可怜虫。他们面对着日寇的屠刀和铁蹄，不是起而斗争，而是低头弯腰，哭泣呻吟。在战争中，树烧焦了，屋倒塌了，田园荒芜了。满村“烟

火滚滚”，“被绑的中国人倒在血泊里，村民们都面对着刺刀，脸色在发白”，“到处是失掉家的老人和妇女的哭叫声”。这一片凄惨是怎么造成的呢？毒草小说炮制者的回答是鬼子的“报复扫荡”，就是说是因为游击队打了临城、枣庄的鬼子，引来了日本鬼子的“报复”。按照这种逻辑，如果甘心当“顺民”，甚至去当汉奸，就不会引来横祸了。这真是一副十足的卖国奴才相。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是我们先“惹”了日本鬼子，它才来侵略我们吗？毒草小说炮制者制造革命战争“惹祸”的假象，用以蒙蔽人民群众，麻痹人民群众的斗志，不仅充当了战争恐怖论的吹鼓手，而且充当了帝、修、反进行反革命侵略战争的辩护士。

毒草小说的炮制者为了达到用战争恐怖恫吓人民群众的反动目的，连人物的梦境也充塞上一片战争恐怖的悲惨景象。在芳林嫂的恶梦里，“四周的树上都挂着人头，血往地上直滴。鬼子都拿着雪亮的东洋刀，刀口上都沾满鲜红的血迹。”游击队员被“拿着带血的东洋刀的鬼子”押着，“准备要杀头。”……这个梦集中地反映了毒草小说炮制者的战争观，妄图用“死亡”来把人民群众吓住，不准人民进行革命战争。但是，这种卑鄙、拙劣的伎俩，只能吓倒出卖灵魂偷生的怕死鬼，而不能对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民有丝毫的影响。我们并不否认革命要有牺牲，人民战争的每一个胜利，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可是，也正是人民战争使我们取得了政权，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说：“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几十年来，我们党领导的伟大的人民战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为翻身解放而斗争的壮丽诗篇。面对着嗜血成性的帝国主义豺狼，面对着凶暴残忍的蒋介石匪帮，革命人民群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革命战争的烈火千锤百炼



的革命人民，是吓不倒、压不垮的。毒草炮制者秉承刘少奇、周扬的黑旨意，妄图用文艺形式散布战争恐怖，宣扬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完全是徒劳的！英雄的革命人民，将更高地举起人民战争的胜利旗帜，打出一个“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的新世界。

\* \* \*

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疯狂地污蔑、反对人民战争，这是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它是周扬等“四条汉子”利用文艺大反人民战争的总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周扬吹捧《铁道游击队》是什么写战争的“优秀作品”，还吹嘘它的所谓“传奇性”，这正好说明毒草小说炮制者忠实地体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意图。《铁道游击队》也真有它的“奇”处。“奇”就“奇”在它以反映人民战争之名来诋毁人民战争，“奇”在它打着描绘人民军队的幌子来诬蔑人民军队，“奇”在它挂着写人民群众的招牌，对人民群众极尽其诬蔑丑化之能事。这也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是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复杂性、尖锐性的反映。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空前大普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越来越为广大的革命人民所掌握，漫天的革命烽火，已经燃烧到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帝、修、反的日子已经不长了。我们必须高举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战斗旗帜，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如果帝、修、反敢于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就要把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把他们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掉！

（原载《大众日报》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 刘洪是哪个阶级的“英雄人物”？

青島市文化局革命委员会写作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作品总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文艺中的“英雄人物”，都是按照剥削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塑造出来的，是毒害人民、麻醉人民、为巩固剥削阶级的政权服务的；无产阶级文艺中的英雄人物，则是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塑造出来的，是打击敌人、鼓舞人民、为无产阶级夺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的。

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重要的标志，要看主人公是什么样的人物和作者对主人公持什么态度。毛泽东思想育英雄。在现代的中国，离开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让我们拿这个标准，衡量一下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主人公、游击队的大队长刘洪，就不难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英雄人物”。

### 流寇主义的黑标本

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的炮制者，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肆意歪曲丑化我抗日游击战士的英雄形象。在他的笔下，从大队长、政委到每个队员，没有一个是“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全是一群浑浑噩噩、鲁莽蛮

干的亡命之徒。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刘洪，更是毒草小说炮制者着力刻划的一个“流寇主义”的黑标本。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由于红军中游民成份占了很大的数量”，“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要“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份。”可是小说炮制者笔下的刘洪，在建立游击队发展队员时，公然反对毛主席的教导，不吸收“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游击队，专门在“吃两条线”的游民中挑选“重义气”、“讲交情”、“够朋友”的所谓“有种”人物，把一些酒鬼、赌棍、无赖、打手、工头、流氓之类的社会渣滓网罗来倍加重用，这些人成了游击队的大队副、分队长、虎将、骨干等等。这分明是有意以“流寇主义”的反动建军路线来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妄图建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来取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毒草小说炮制者笔下的刘洪，不但不执行毛主席规定的打仗、做群众工作和进行生产的三大任务，不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党的组织，依靠广大群众去狠狠打击敌人，反而极力诬蔑群众，攻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胡说什么：“群众多了没有用”、“群众多了倒碍事”……这些恶毒诬蔑群众的胡言乱语，不正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的翻版吗？刘洪领着他的“流寇队”从“血染洋行”到“最后胜利”先后打了四十多仗，没有一次依靠群众和组织群众参加战斗。当他们劫了布车，在非用群众不能把布运走的情况下，刘洪竟用“运一匹给一丈、运一捆给一匹，多运多给”

的雇佣手段，来驱使群众为他干活，完全是一派地主对待长工的丑恶嘴脸！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刘洪在几次战斗中，既“亲自动手”绑了火车上的“司炉工人”，又捆了“贫下中农”。毒草小说炮制者通过刘洪之手，妄图捆住千千万万革命群众的手脚，使游击队脱离群众，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孤军的恶毒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毒草小说炮制者笔下的刘洪和他的“流寇队”，根本不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只想“搞火车影响大”，“有吃有喝多痛快”；连进山里整训，吃几天小米，他们都受不了，嚷着要“赶快出山”，胡说什么，出去以后“再不济也能吃上个馒头加咸鱼”。他们到处要吃要喝，就是不要革命群众，不要革命根据地。结果被敌人撵得东跑西窜，最后跑进微山湖躲了起来。毛主席早就深刻指出：“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毛主席这些伟大指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毒草小说炮制者宣扬流寇主义的反动目的，是对刘洪这个所谓“游击英雄”的最彻底、最深刻的批判和否定。

### “军事第一”的黑样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的炮制者，却不遗余力地把刘洪树成一个疯狂反对政治挂帅、大肆鼓吹“单纯军事观点”的黑样板。刘洪之所以能被捧成神乎其神的“游击英雄”，主要是靠他那一

套“飞檐走壁”的扒车技术，“百步穿杨”的神奇枪法。在《飞车搞机枪》一节中，毒草小说炮制者极力宣扬刘洪具有“手钳窄窄的铁棱，脚踏寸长的铁角”的扒车绝技；在整部小说中，我们没有见到刘洪向游击队进行过一次政治动员，做过一次政治思想工作。他注意的只是“扒车技术”、“善使枪法”；他吸收队员的主要条件，也是“扒车技术”、“善使枪法”。毒草小说炮制者所以要刘洪只热衷于所谓“技术”，其目的是在“军事第一”、“技术第一”的掩护下，贩卖王明、刘少奇之流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他们篡军、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而毒草小说炮制者笔下的刘洪，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宣扬“唯武器论”。他向往的就是“穿戴好、武器好”；他与微山湖的游击队会面时，第一句话就问：“装备怎么样”？并胡说什么“土枪不管用”，指责人家“不搞几支好短枪”。毒草小说炮制者借刘洪之口，如此明目张胆地鼓吹反动的“唯武器论”，真是反动透顶！

毒草小说炮制者笔下的刘洪，对毛主席关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灵活机动、百战百胜的战略战术，一窍不通，拒不执行。他仗着自己的所谓“有种”、“胆量大”，到处瞎撞蛮干。在苗庄他硬逼着“流寇队”与敌人的大部队死拼，结果伤了“政委”，死了队员，几乎全队覆灭。这时刘洪“失掉理智的冲动”，“象疯了样端着机枪”……其形象要多丑恶有多丑恶，根本没有半点我军指挥员的气味！

## 个人主义的黑典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的利益，还是为个人的私利，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与剥削阶级的所谓“英雄人物”最本质的区别。毒草小说炮制者笔下的刘洪，就是一个毫不为公、专门为私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黑典型。他对游击队员只字不提“人民战士一生奋斗求解放”、“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的崇高理想和壮志豪情，而是一味宣扬“吃喝”、“光彩”、往上爬等腐朽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他在游击队建队会上毫不隐讳地说：“搞车弄钱一半分给家属”；他对彭亮说：“开炭厂有你一份股东”！他拉队伍的目的，是想为自己“搞出一些名堂来”，他飞车搞机枪的目的，是为了攫取上级的好感和夸奖。当他想到上级在说：“还是我们的老洪呀！”“这是老洪送给我们的好礼物呀！”竟自“暗暗的笑了”。看！这是一副多么猥琐鄙俗的丑恶嘴脸！他那暗暗一笑，不正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的无耻流露吗！在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这一“诀窍”指引之下，刘洪越陷越深，越变越坏，以至堕落到不顾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一味追求个人的私欲私利。他念念不忘的是芳林嫂那对“美丽的大眼睛”，当下乡“扫荡”的日本鬼子驻满了铁路两侧的时候，刘洪竟“冒险穿过敌群”，来救芳林嫂，他私心毕露地说：“明天就可能开始捕捉老百姓了，你留在这里是危险的”。在刘洪看来，广大人民群众被鬼子捉走了没有关系，只要保护住他的情妇芳林嫂就行了。苗庄一战，刘洪不惜队员的大量伤亡，拚命蛮干，为人民群众报仇是假，替芳林嫂“出气”是真。刘洪为了达到个人的私欲私利，已经走上不顾人民和战友的死活，不

惜损害革命利益的地步了。

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的炮制者，费尽心机地塑造了刘洪这个“英雄人物”，无非是想指鹿为马，鱼目混珠，用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来代替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用资产阶级的反动军事路线来代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用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代替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以达到其污蔑人民军队，丑化抗日英雄，诋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为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之流反党篡军、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罪恶目的。

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是在刘少奇及其爪牙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直接指挥和吹捧下出笼的。当前，在全国军民高举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旗帜，彻底批判刘少奇及“四条汉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进军声中，把《铁道游击队》这棵大毒草拿出来示众，把刘洪这个流寇主义的黑标本拿出来示众，是十分必要的。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将毒草小说《铁道游击队》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恶劣影响！

（原载《大众日报》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日）

## 胜利从何而来

虹 燕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主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革命战争的胜利，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但是，由刘流炮制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评书《烈火金钢》，却背道而驰，它假歌颂抗日战争之名，公然歪曲抗日战争的历史，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大唱反调。它一出笼就得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代理人周扬的吹捧，一再大量出版，还通过电台长期连播，流毒甚广，必须彻底批判。

###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华北变为“大东亚兵战基地”，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疯狂“扫荡”。久经锻炼的华北各根据地的军民，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基本的是游击战”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有组织地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充分发挥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威力，使日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之中，彻底粉碎了日寇妄图扩大侵略，摧毁我华北根据地的罪恶计划，为赢得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这一伟大真理。

《烈火金钢》是写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扫荡”和冀中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的。可是，在整个作品中，完全看不到我抗日武装力量的威力，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威力。通篇只见几个所谓的“金钢”、“虎将”在那里大显身手。作品所着力渲染的是史更新单枪匹马力敌千军，丁尚武一把大刀所向披靡，以及肖飞的“超人”智勇等等。在刘流看来，反“扫荡”的主角是几个“金钢”、“虎将”式的“英雄”、“好汉”，凭着他们的个人智慧和勇敢就能克敌制胜，扭转乾坤；至于人民群众，不过是跑跑“龙套”，作作“陪衬”而已。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为了突出“金钢”、“虎将”们个人的作用，作者竟不惜用诽谤群众的手段作为反衬。请看！桥头镇突围战中，主力军撤出后，民兵无影无踪，唯一出现的群众还是为了寻找儿子尸体的，而身负重伤的史更新却“单枪打开千军阵，独身冲破重兵围”；小李庄妇女落入虎口，区、村干部束手无策，老百姓喊着“难道真没有人管了吗”，求助于汉奸地主何大拿和“老天爷”。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肖飞突然“降临”献智，和丁尚武等三人潜入敌穴，救出被掠妇女。更加恶毒的是在两次沙滩战斗中，为了表现丁尚武们“真不愧是杀敌英雄！抗日的好汉！”竟然把民兵和区小队丑化成见了鬼子“惊慌失措，乱窜乱跑”、临阵“逃跑”的怕死鬼。如此等等。一褒一贬，两相对照，越发显示出“金钢”、“虎将”们“出类拔萃”，“力量无边”；而仅仅作为点缀所写的人民群众和群众武装的一点点作用，也被抵

销得一干二净。这一切，都是对人民群众的恶意诬蔑！是对历史的无耻颠倒！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已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否认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同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英雄模范人物的作用，对于那些扎根于群众之中，自觉地为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英勇奋战的先锋战士，是加以充分肯定的。而那些顽固坚持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群众落后论”者，尽管他们打着各色旗号，其实都是要塑造他们本阶级的理想人物，他们也必然用丑化人民群众的恶劣手法来表现这种人物的“非凡”和“超群”。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能所决定的，是不可能不顽强地表现出来的。

事实上，《烈火金钢》中的所谓“金钢”，“虎将”，与无产阶级英雄格格不入，不过是一些穿着现代服装的新的武侠和剑客。他们的共性之一就是所谓的“艺高人胆大”。无产阶级从来认为“艺高人胆大”是一种陈腐的谎言。无产阶级英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智大勇的本质和过硬的战斗本领，来源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伟大革命的实践，来源于对党、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历来剥削阶级的文人墨客总是以“艺高人胆大”的谎言，来掩饰他们本阶级“英雄”们的反动立场和虚弱本质。《烈火金钢》是地地道道的新“剑侠传”。刘流把这样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美其名曰抗日烈火中的“金钢”，冒充无产阶级的英雄，抹杀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充分暴露了他反对人民战争，为地主、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险恶用心。

## 革命的枪杆子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用枪杆子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

《烈火金钢》所描写的抗日斗争完全是另一种情景。在刘流的笔下，日寇气势汹汹，处处主动，我抗日力量则连连受挫，处处被动，以至接连被日寇堵在村里，有的死了，有的被困在洞里，到了毫无出路的地步。在大摆了这样的无耻吹捧日寇、恶意中伤我抗日力量的所谓“危局”之后，接着笔锋一转，说是由于日伪之间的内讧、由于争取了伪军刁世贵小队的反正，终于转危为安，形势大变，被困的人员救出来了，并且在刁世贵的帮助下，顺利地袭击了高铁杆的骑兵队和日军的尖兵小队，就连所谓我军“无法摧毁”的炮楼也因得了刁世贵的力量，不费吹灰之力地解决了。作者甚至情不自禁地在书中高歌刁世贵们“见义勇为，光荣正义”，“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等等。

刘流在这里制造了一个历史谎言，仿佛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是依靠枪杆子的威力，而是取决于敌人内部的互相争斗和伪军的反正起义。这是公然篡改历史，否定枪杆子的作用。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用武力消灭敌军以外，利用敌军内部的矛盾，瓦解敌军，争取敌军起义，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策略原则之一。但是，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彻底消灭敌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难道八年抗战

中消灭日寇和伪军一百七十万人，把日寇赶出中国，不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武装力量，还是靠别的什么东西吗？按照刘流的逻辑，只需静候敌人内部的争斗，从而争取其中的一方反正在起义，就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十足的“革命战争取消论”，“武装斗争取消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消灭敌人武装离不开枪杆子，争取敌军内部反正也同样离不开枪杆子。瓦解敌军的工作只有在我军枪杆子的威力下才可能发生作用。没有军事上的打击，没有强大的军事压力，依靠什么“唇枪舌剑”，完全依附于日寇的伪军是谈不到反正和起义的。可是《烈火金钢》偏偏就在置我抗日力量于最困难的同时，安排了顺利争取伪军反正的情节。作者首先抹杀敌人内部矛盾的性质，使汉奸与汉奸，汉奸奴才与日寇主子之间的纠葛，变成了“好人”与坏人、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斗争。为此，竟不顾前后矛盾，把铁杆汉奸部队高铁杆的心腹和把兄弟打扮成有“良心”和“正义”的“好人”，把他与日军小队长为争夺妇女引起的狗咬狗的争斗，说成是“还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并且精心设计了一个辱妻丧妻刁世贵受屈的场面，编造出一种刁世贵反正起义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进而大力宣扬如何用帮助刁世贵“复仇”的“义气”感动并使他归顺。刘流所鼓吹的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要以所谓人性感化来否定枪杆子的作用。

### 党的领导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英明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是有以毛主席为伟大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是否如实表现这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光辉历程，是否满腔热情歌颂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区别无产阶级文艺和修正主义文艺，革命作品和反革命作品的分水岭。

反动评书《烈火金钢》以“五一”反扫荡斗争的残酷性为口实，竭力把党的组织和党的骨干队伍写得七零八落，软弱无能。书中着重描写的小李庄，党员干部不是牺牲被捕，就是离开村庄，仅剩几个则躲躲藏藏不敢出头，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新任的党支部书记和两名委员，也是有的胆小怕事，有的盲目蛮干，意见不一，各行其是，起不到战斗堡垒的作用。一名留在小李庄的并非区委委员的宣传部副部长齐英，明明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患得患失，害怕斗争，对汉奸地主何大拿姑息养奸，竟被小李庄的党员一致拥戴为代理区委书记，作者还称他为“有政治远见”、“处处执行政策”等等。从这些别有用心描写中可以看出，刘流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肆意丑化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没有千百万共产党员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模范作用，没有千百万共产党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满怀信心，英勇奋战，带领群众坚持斗争，就没有反“扫荡”斗争和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刘流不去表现这个主要方面，却把它淹没在艰苦性和残酷性的渲染中，并且用齐英这样的人物来冒充真正共产党员的代表，目的是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人

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在反动评书《烈火金钢》中，把党的领导者形象歪曲成了机会主义者。在“五一”反扫荡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党的领导的县委书记田耕，好容易出现在小李庄，却又不引导群众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面对重大牺牲，他只是一味地叹息，任凭满脑子孔孟之道的何世清用“民族血”，“咱们都是皇帝的子孙”的名目在那里“激动”群众，完全放弃了党对群众的领导。这就是作品大部分篇幅中田耕的表现。但是对于领导争取伪军小队队长刁世贵，田耕却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他力排众议，默认从本质上肯定刁世贵，指挥齐英用“义气”、“舌战”等等进行工作，并且坚信：“有了刁世贵这部分伪军的配合”，“这个地区将另是一种局面”。这一切都被作者称之为“执行政策正确”。这是什么样的政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田耕根本不去发动群众，组织人民力量，打击敌人，而把希望寄托在伪军的身上，寄托在伪军的“良心”和对伪军的“感化”上。田耕的所作所为，与党的政策针锋相对，十足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但是作者对此却赞不绝口，并且捏造了一个由此而来的胜利的结局。刘流妄图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抗日战争的胜利篡改成机会主义的胜利，其用心何其毒也。

《烈火金钢》炮制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前夕。它的形成时期，正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反对革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反动气焰甚嚣尘上的时候，正是以刘少奇为总后台的资产阶级右派酝酿并跳出来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时候。《烈火金钢》通过歪曲抗日战争的历史，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毛主席关于武装斗争和人民战

争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实践，完全适应刘少奇反党复辟的需要，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相呼应。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人民群众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下，紧握枪杆子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光辉范例。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已经在全世界革命人民中生根开花。一切帝国主义在武装起来的世界革命人民面前都逃不脱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下场。那些被帝国主义吓破了胆的修正主义者们，也必将和他们的主子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被革命人民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人民军队所向无敌

驻军某部 红线兵 锋 军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举世无双的革命军队。几十年来，这支军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南征北战，所向无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创建了新中国。在革命战争中，这支队伍，涌现出千千万万个英雄，为人民打江山，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支军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被广大人民群众亲热地称作“我们的子弟兵”。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写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就必须热情地歌颂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可是，反动评书《烈火金钢》打着描写革命战争的幌子，却极力丑化和攻击伟大的人民军队。它是射向人民军队的一支毒箭，必须彻底批判。

人民军队，所向无敌。首先是因为参加这个军队的人，切实执行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一系列无产阶级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懂得为谁扛起枪，为谁去打仗这个根本问题。“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所以，人民军队的干部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打败侵略者，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反动评书《烈火金钢》对于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本质，根本不



去表现，而是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极力丑化人民军队。在书中，史更新和丁尚武是作为人民军队的代表者出现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在作者刘流的笔下，这是两个什么样的人物。

作者刘流标榜史更新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金钢铁汉”。他“勇”在哪里？“谋”在何方？反动评书一开头，就写“史更新死而复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八路军的一个排为了掩护突围，全体战士壮烈牺牲。而史更新竟用同伴的尸体盖着自己，“在死人堆里藏着”，保住了自己的命。当史更新到了赵连荣家，敌人又来搜查时，他又用赵连荣的死保住了自己的命。当敌人发现他时，他急忙逃跑，又钻到了老百姓的大躺柜里，保住了命。这时，史更新竟为保住性命而高兴得“象驾了云”。在敌人又一次发现他的时候，他想的不是战斗，而是“自杀”。但一想到死就觉得“孤单得可怕，不由得心酸难过起来了”，“破着嗓子地大喊，快来救我啊！”……够了！只这些就不难看出，史更新的“勇”，就勇在“后退”、“逃跑”上；“谋”就谋在“装死”、“躲藏”、“钻柜子”保命上。这那里是人民军队排长的形象？分明是大叛徒刘少奇“活命哲学”的黑标本。

再来剖析一下丁尚武。他为什么参加革命？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利益吗？不是。他是带着“报杀父之仇”的个人恩怨和“谋求高升”的私欲参加革命的。他参军后，“杀俘虏，打士兵，骂县长”，甚至为争夺区小队长的职务同史更新争权夺势。丁尚武到底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他的世界观是那个阶级的？这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一个史更新，一个丁尚武，两个躯体，一个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由小到大，从弱到强，就

是因为人民军队是按照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立起来的。可是，刘流硬把人民军队写成是一群自私自利、怕死保命、争权夺势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并左一个“英雄好汉”，右一个“威武勇士”，把一顶顶桂冠扣在他们的头上，还叫他们不断打胜仗。这不明明是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和改造人民的军队吗！这不明明是妄图把人民军队改造成大叛徒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吗！告诉你刘流，这纯粹是痴心妄想。

我们人民军队最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一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断提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为人民立新功！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会主义前进，还是把革命停顿下来，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向资本主义倒退？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五亿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周立波的反动小说《山乡巨变》，打着描写农业合作化的招牌，却死死抱着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放，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对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妄图把中国农村“变”向资本主义。

在这部反动作品中，周立波精心刻划了一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清溪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此人有一个“总主意”，叫做：“社会主义是长路”，“急什么呢？”“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这个“总主意”，统帅着李月辉的一举一动，是李月辉的灵魂，也是整个《山乡巨变》的主题。在这个“总主意”的指导下，李月辉倒行逆施，干尽坏事。合作化高潮前夕，他“坚决”响应刘少奇“砍社下马”的黑指示，把清溪乡仅有的一个合作社，一刀砍掉；合作化高潮刚刚到来，他又大喊大叫要“停顿一下”，“切忌太冒，免得又要纠偏”，妄图来一个紧急刹车。

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体现着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周立波通过李月辉和他的“总主意”，表达了那个阶级的政治主张？一望而知，他要表达的是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主张。

曾记否，民主革命刚刚胜利，就是这个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东奔西走，四处叫喊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斗争”，胡说什么，社会主义“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要过

“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考虑”，攻击农业合作化是“急躁冒进”。两相对照，李月辉的所谓“总主意”，不正是依照刘少奇的反革命黑葫芦画出来的一把破瓢吗？！

按照这个“总主意”，就是要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基本胜利以后，把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停顿”下来，让五亿农民慢慢吞吞地去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长路”。这是一个反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极其恶毒的政治阴谋。

早在三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一再深刻地指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就要“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全国解放不久，毛主席又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向全国人民指明了继续革命的胜利航向。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非常尖锐，非常激烈。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三年就英明指出：“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无产阶级要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从取得政权之日起，就必须不停顿地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持续地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通过不断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改造个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

个体经济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农村，一直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要使社会主义牢固地占领农村阵地，无产阶级在土地改革之后，就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趁热打铁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把个体经济逐步

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革命停顿下来，走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长路”，资本主义就会在农村自由泛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就要卷土重来，亿万农民就将吃二遍苦，重新陷入黑暗的深渊，整个农村阵地就必然会被资产阶级占领。

土改以后，正是由于刘少奇极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不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我国农村的许多地区一天天地发展起来。新富农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成富农。而广大贫下中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不去“急”贫下中农之所急，硬要“从容”“稳当”地走什么“中间道路”，实际上就是妄图“稳住”资本主义阵脚，发展富农经济，从从容容地走资本主义老路，妄图在全国农村复辟资本主义。

“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先后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按语等光辉著作，系统地、深刻地批驳了刘少奇一伙对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无耻澜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这一英明论断，击中了刘少奇一伙的要害，也彻底揭穿了“总主意”的反动实质。这个代表资产阶级、富农利益的“总主意”，是不折不扣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黑主意。

为了宣扬这个“总主意”，周立波采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居心险恶地把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统统歪曲成留恋私有制度，梦想“发家”“起水”，非常自私自利的“落后分子”，把他们推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借他们的口，反对革命转变。世

代老贫农陈先晋，一听说“办社”，就象晴空响起“炸雷”，感到“吃惊、苦恼和悲哀”，叫喊什么“世界变得实在不象样了”。党员互助组长、后来的农业社长刘雨生，办社干部刚“入乡”，他就“心灰意冷，打算缩脚”。其他贫下中农也都死守资本主义亡灵，反对农业合作化这场“新变动”。这是周立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无耻攻击，对广大贫下中农的恶毒诬蔑！

把农村资本主义的死对头贫下中农，丑化成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护者，从而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制造根据，这是新老机会主义者的惯技。叛徒考茨基攻击斯大林领导的伟大的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就曾经叫嚷农民“不愿意参加集体农庄”，是布尔什维克党“使用暴力强迫参加”的。刘少奇一脉相承，胡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得农民“动荡”“不安”，“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周立波一笔抹煞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他们和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完全证明，他和新老机会主义是一丘之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文按语）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最拥护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这场伟大的“新变动”，他们始终是这场“新变动”的主力军。因为他们懂得，没有这样的“新变动”，就永远不能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个体经济的束缚，就永远不能摆脱贫困。只有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才是唯一的出路。反对这场“新变动”，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富农，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一伙。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光辉思想，集中反映和代表了我国五亿农民的迫切要求和根本利益。在毛主席伟大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广大农村很快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历史的发展，彻底粉碎了以刘少奇一伙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妄图在中国复

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然而，他们贼心不死，时刻伺机反扑。周立波炮制《山乡巨变》时，刘少奇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就曾面授机宜，要他把毛主席严正批判过的“小脚女人”“写进书里”。周立波心领神会，照此办理，特意刻划了李月辉这样一个有名有实的“小脚女人”，极力往他脸上贴金，称颂他是一个“顶好的”支部书记，猖狂已极地嚎叫：“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这是明目张胆地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攻倒算，是周立波死心塌地为刘少奇尽忠效劳的铁证！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其势如大海怒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卷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周立波扛起刘少奇的反革命破旗，为黑主子效劳到底，也就只能得到同样可耻的下场！

### 把集体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黑公式

革命在前进，斗争在继续。农业合作化的红旗插遍全国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围绕着办社方向问题，又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实质，仍然是：向社会主义前进，还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分析了合作社建立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明确指出：“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指明了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正确方向，是办好合作社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亦步亦趋地跟着刘少奇走的周立波，继续与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唱反调。一九五九年，配合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猖狂进攻，他又炮制了反动小说《山乡巨变》续篇，再一次通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化身李月辉，抛出一个篡改社会主义办社方向的黑公



式：“哲学的方法”加“经济学的措施”。

这个黑公式贯串着整个续篇。它不仅是续篇反动主题思想的形象概括，而且被描绘成解决合作社内外矛盾的“灵丹妙药”。

所谓“哲学的方法”，一语道破，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贯奉行的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叛徒哲学。

在续篇中，周立波用了大量的篇幅，通过描写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王菊生和合作社的一场“竞赛”，来鼓吹这种反动哲学。富裕中农和合作社的“竞赛”，本来是我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有时公开、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坚决地支持合作社。这是一场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生死斗争，绝没有丝毫的调和余地。但是，周立波却极力宣扬，它们之间“没有你死我活的敌对性质”，有着“和好的共同的基础”。按照这个反动观点，李月辉主动登门找王菊生攀“亲”认“邻”，口口声声要“亲为亲好，邻为邻安”。王菊生“鼓足暗劲，满心满意”要把合作社“比垮”，他对此不仅表示“欢迎”，而且积极支持；王菊生抢挖塘泥，遭到社员的反对，他赶忙出面解围，把针锋相对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化作“球场”上的“友谊竞赛”，气势汹汹地训斥社员，低声下气地向王菊生讨好。一副十足的卑躬屈膝的奴才相，李月辉却恬不知耻地称之为“里面是有哲学的”。这是什么“哲学”？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叛徒哲学！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批判，就是革命，就是斗争。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巩固、发展的。农业合作化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也是在斗争中出现、巩固和发展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

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面对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是同它攀“亲”认“邻”，大谈“友谊”，还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表明了无产阶级立场同资产阶级立场、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本分歧。周立波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奉行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竭力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变阶级斗争为阶级投降，其目的就是妄图解除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为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擂鼓助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不是吗？在李月辉的投降哲学的鼓动之下，王菊生不仅“比垮”合作社的决心更坚定了；而且竟敢“当人暴众”，“斩钉截铁”地表示：资本主义道路，他要“坚决”走到底。这一事实，正好表明了周立波煽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起来，兴风作浪，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用心。

“哲学的方法”如此，“经济学的措施”又如何呢？这个“措施”不是别的什么玩艺，乃是赤裸裸的“物质刺激”。

在周立波笔下，物质刺激的作用，超乎寻常。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靠它，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也靠它。李月辉开一张支钱借米的条子，就“打退”了党员副社长谢庆元“心里的寒潮”，使他“重新积极起来”；社长刘雨生宰一头肥猪，就消除了社员插秧时的“懒心懒意”，“使大家都忘命地干了”。这是对合作社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的莫大诬蔑！周立波以资产阶级之心，度贫下中农之腹，把自私、贪馋、物质至上、金钱万能这一类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强加在合作社干部、社员身上。这丝毫无损于贫下中农的革命光辉，只能暴露他自己散发铜臭的丑恶灵魂！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最本质、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有不断加强政治工作，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才会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使广大干部、社员焕发出冲天的革命干劲，把无穷无尽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搞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就会不可避免地走上资本主义邪路。周立波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肆意诋毁党的政治工作是“不分青红皂白”，“一窝蜂”，把所谓“经济学措施”吹上了天，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反动政治、反动思想征服人心，腐蚀群众，使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逐步变质。周立波用“哲学的方法”宣扬阶级投降，用“经济学的措施”推行物质刺激，李月辉这种解决合作社内外矛盾的“灵丹妙药”，原来是杀人不见血的两把软刀子，是破坏和瓦解集体经济的一付毒药。“哲学的方法”加“经济学的措施”等于资本主义。这就是李月辉的黑公式的反动实质！周立波用“哲学的方法”和“经济学的措施”宣扬阶级投降和物质刺激，从来就是修正主义者推行和平演变两个重要手段。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苏联领导权后，正是用这两手，把社会主义经济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结果，使列宁、斯大林亲自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顺着苏修的脚步爬行，也妄图用这两手，使我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周立波极力鼓吹的这个黑公式，就是秉承刘少奇的黑旨意，从洋主子那里贩来的破烂货。周立波为什么周立波要在人民公社早已建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日益发展的一九五九年，抛出这样一个反动公式？联系两年前他竭力宣扬的“总主意”想一想，人们就会十分清楚，黑公式正是“总主意”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一九五七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周立波以“总结经验”为名，抛出“总主意”，诬蔑搞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妄图把历史拉向后退。两年之后，“总主意”被人民公社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周立波不甘心失败，又无可奈何，只好变换手法，从篡改社会主义的办社方向入手，想方设法破坏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以此同社会主义顽抗到底。披着“哲学”“经济学”外衣的黑公式，完全是为这一罪恶目的服务的。

按照什么方向办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十几年来，刘少奇等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总是与地富反坏串通一气，千方百计篡改社会主义的办社方向，妄图把集体经济引向邪路。尽管他们的阴谋一次又一次被粉碎，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正是利用刘少奇阶级调和、阶级投降和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的余毒，采用各种手段向无产阶级发动新的进攻。他们或者散布以“私”字为核心的腐朽没落的反动人生观，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破坏为革命种田；或者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挑拨国家、集体、社员三者的关系，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落实。对于阶级敌人的这些进攻，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斗争的哲学，随时给以粉碎性的打击，保证集体经济永远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胜利前进！

### 社会主义革命和周立波的“观音经”

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它把我国农村社会

主义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伟大的事件。

但是，这一场伟大革命，却被周立波描写成“波及每一个家庭，深入每一个人的心底”的“苦难”。他通过李月辉之口，大喊大叫：办社以来，“家家有本观音经”（按：即“苦难经”）。而且，在他看来，革命越是向前发展，“苦难”就越加深重。初级社，害得社长刘雨生妻离子散，老贫农陈先晋“恋土”痛哭；高级社，逼使副社长谢庆元“孤魂野鬼一样拖在世界上”，最后，走上吃水莽藤自杀的道路。直到续篇最末一章，他还不放过机会，打着“欢庆”胜利的旗号，大敲反革命的“锣鼓”，再一次以“劝父入社”、“吃水莽藤自杀”等三个“小戏”，复照横贯全书的“苦难”情节，唤起人们对“苦难”的回忆。如此恶毒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真可谓沥血呕心，机关算尽！

周立波这样凶相毕露，还唯恐人们不懂得他的心机。一再点明，这一切“苦难”，不仅跟办社“有关系”，而且“跟办组都有关系”。他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到合作社身上，以致忍不住借书中人物之口，大出反革命“恶气”，扬言要“放一把火”，把合作社“连牛带人烧一个精光”。赤裸裸地露出了这个老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孔。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正是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胜利，使我国城乡迅速改变面貌。“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介绍一个合作社》）亿万农民，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千百年来个体经济的束缚之后，以崭新的革命姿态，建设着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向前发展，他们为革命种田的精神境界不断提高，更加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量。二十一年来，我国广大贫下中农，创建了象大寨、洛塔、野鸡坪等震惊世界的改天换地的英雄业绩。这一曲又一曲响彻云霄的胜利凯歌，反复证明“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这一伟大真理。周立波颠倒是非，把光明说成黑暗，把五亿农民向着社会主义大道奔跑的壮举，说成是痛苦不堪的“灾难”，这就彻底暴露了他对亿万农民的翻身解放事业，有着何等的刻骨仇恨！

宣扬革命就是“苦难”，把革命斗争描绘成凶恶可怕的洪水猛兽，用这种手段恫吓革命群众，煽动群众脱离革命的轨道，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效劳，这是一切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创作的共同特征，也是周立波一贯的创作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他适应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需要，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极力宣扬所谓战争的“劫火余烟”，诬蔑伟大的抗日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历史空前、举世无比的悲运”。同刘少奇所唱的“八年抗战，到处打得疮痍满目”完全是一个调子。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按照这个反动思想炮制长篇毒草《暴风骤雨》，把书中的好人处死，人为地制造悲剧的结局，处心积虑地显示革命的“苦难”。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后，他更是采用这种手段，变本加厉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一九五五年以来，他所抛出的一系列以农村为题材的短篇作品，诸如《桐花没有开》、《盖满爹》、《禾场上》、《民兵》等等，无一不是这种反动创作思想的大暴露。在他的笔下，这些作品中的主人翁，只要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积极，就注定逃不脱痛苦和灾难的折磨。他们由于革命，不是闹得众叛亲离，孤苦伶仃，就是被突然一场“火灾”烧得焦头烂额。尤其是《禾场上》这株大毒草，公然一再咒骂社会主义革命是“难产”、“无法减轻她临盆的痛苦”。完全是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语言。

周立波的这一套，自然不是什么新货色，不过是拾的苏修

叛徒集团反革命思想破烂摊里的一点破铜烂铁。三十年代初，当考茨基、布哈林等攻击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是“可怕的灾难之上还要加上笼罩着整个农业的可怕的不安”时，就有那么一个肖洛霍夫，抛出臭名昭著的大毒草《被开垦的处女地》相应和，诬蔑苏联集体化运动的“调调儿已经唱得人到处掉眼泪”，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为了吓唬革命人民，扑灭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极力宣扬革命战争的恐怖，此时，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这一类的反革命作品，又破门而出，狂呼乱叫，革命战争“埋葬了”人民的“最后的希望和欢乐”。周立波的一大堆毒草，原来是苏修反革命文艺鼻祖老“调调儿”的重弹！

伟大的列宁曾经指出，“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只有资产阶级和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才会视革命为洪水猛兽。每当革命的风暴来临，他们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怖，念起那一部咒骂革命的“观音经”。这种现象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历史从来就是如此。无产阶级每迎来和欢庆一次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们，就总要在咆哮的咒骂声中，发出一次“灾难”呀、“痛苦”呀一类的哀鸣。社会主义革命，是要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连同它们腐朽的意识形态彻底埋葬的一场大革命。当无产阶级和亿万人民，以更加欢悦的心情和更加高昂的姿态，迎接这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时，阶级敌人以十倍的疯狂发泄对革命的仇恨，岂不是完全合乎阶级斗争规律的吗？！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就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

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下，人民革命的伟大风暴，正在愈来愈猛烈地席卷着全世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内外交困，日暮途穷，面临着灭顶之灾。让一切阶级敌人，在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中，哀鸣吧，发抖吧！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在这一场革命风暴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而获得的必将是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原载《湖南日报》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 黑作家周立波和他的反动哲学

桃江县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指出：“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黑作家周立波在反动小说《山乡巨变》中，借清溪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之口宣称“这里边是有哲学的”，极力鼓吹他的“哲学的方法加经济学的措施”的灵验。周立波的“哲学的方法”究竟是什么货色？让我们拨开迷雾，识别庐山的真面目吧！

### 抹煞阶级矛盾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门科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概括。它科学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用“一分为二”的世界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就能够更深刻理解“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复辟资本主义，指使其在哲学界的代理人、叛徒杨献珍抛出了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对抗“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周立波在反动小说《山乡巨变》中就是打着所谓“哲学的方法”的幌子，狂热兜售“合二而一”的黑货，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掩盖农村存在着的阶级矛盾，反对“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

伟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农业合作社里的贫下中农和坚持单干的富裕中农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指出：“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一分为二，阵线分明。可是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却胡说：“地主踩在我们脚下了，无所谓了。”地主、富农不但不支持单干的富裕中农，不但没有任何破坏活动，而且都“鼓掌”欢迎农业合作化了。这完全是周立波抹煞阶级斗争实际的主观臆造。解放以来，地、富、反、坏分子和资本主义势力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社会主义的破坏，直到今天，“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周立波鼓吹刘贼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就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好让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扑。不是么？在周立波笔下的党支部书记李月辉，不但不向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还对坚持单干、要比垮合作社的富裕中农表示“欢迎”，鼓励他们“好好干”，胡说这是“友谊竞赛”。这就是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共处”，使社会主义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

不仅如此，党员副社长谢庆元有严重个人主义，经常不工作，党支部书记不但不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还总是用他的所谓“哲学方法”——“几句米汤灌得谢庆元称心如意”，“经济学的措施”——替他“开条子”，给钱给米，把谢庆元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由此可见，周立波的所谓“哲学的方法”，就是在政治上，妄图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贫下中农和地主阶级“合二而一”；在经济上妄图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合二而一”；在思想上妄图把“公”和“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合二而一”。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布哈林鼓吹资本家和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谬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说：“只要我们现在合作搞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叛徒杨献珍胡说什么：“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周立波贩卖的正是这些抹煞阶级矛盾的“合二而一”的破烂货。

## 反对阶级斗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就是指导我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用正确的方法，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去解决矛盾的强大思想武器。周立波鼓吹“哲学的方法”，不仅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而且还否认矛盾的斗争性，认为矛盾可以调和，斗争没有必要，用“矛盾调和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什么“不要存芥蒂，一个村的人不能这样子。”这纯粹是周立波反对广大贫下中农向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黑话。任何一个村里都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贫下中农与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矛盾，广大农民与地主、富农的矛盾，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激烈搏斗。我们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就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于富裕中农的自发倾向就是要坚持斗争。广大贫下中农只能是这个样子。否则让资本主义倾向自由泛滥，让阶级敌人肆意破坏，

无产阶级江山就会变色，我们就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们决不能受骗上当，决不能象周立波胡说的“一个村的人不能这样子”。

什么“跟你我一样，他是搬泥头骨出身”。这是周立波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鸣冤叫屈的胡说。同是劳动农民出身，也有贫下中农和富裕中农之分，也有不同政治思想之分。不管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强调同是“搬泥头骨出身”，实际上是取消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破坏集体经济打掩护，为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我们一定要戳穿周立波的这个罪恶阴谋，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狠批资本主义倾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什么“是吃力的劳动……在这一点上，不论是王家，不论是社里，都一个样。这是他们可以重归和好的共同基础。”这是周立波为了宣扬“哲学的方法”，直接跑出来发表的谬论。他不区别是集体劳动，还是坚持单干、搞资本主义活动的劳动。甚至在他笔下，地主、富农参加劳动，也和贫下中农有了“共同基础”，居然“鼓掌”欢迎农业合作化了。“劳动”就能解决阶级矛盾，代替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可以说是周立波对“矛盾调和论”的发展。

修正主义分子一个惯用的反革命手法，就是否认矛盾必须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来解决，宣扬矛盾可以通过“统一”、“同一”、“溶合”、“协调”来解决。大叛徒刘少奇胡说什么：“我们的方针是利用矛盾的统一性（不去扩大它的斗争性）。”刘少奇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也歪曲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立是怎样同一的（统一的）。求同存异。”周立波也正是用形而上学的诡辩和唯心

论的幻想，把矛盾都掩盖起来，调和起来了。他的所谓“共同基础”，都是“一个村的人”，都是“搬泥头骨出身”，都是“吃力的劳动”，等等，就是排斥斗争性的形而上学，就是“合二而一”的基础。它不作阶级分析，调和矛盾；它不透过现象看本质，取消两种思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大搞“合二而一”，为准备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就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每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坚持“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彻底批判周立波之流“矛盾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继续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顽固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在哲学上“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也就是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周立波为了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出发，在《山乡巨变》里大肆鼓吹“合二而一”的“哲学的方法”，把事物看成是“合二而一”的，凝固不变的，否定矛盾的普遍性，否定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哲学，反对广大贫下中农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从而充当刘贼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拚命地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鸣锣开道。

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违反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因此又

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周立波在反动小说《山乡巨变》中为证实他的谬论所捏造的许多事例，都是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违反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律的。他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不是叫喊：“不能草木皆兵，什么事情本来不是阶级斗争，也要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吗？他不是疯狂攻击：“发动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吗？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对大量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故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不仅是周立波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又一次大暴露，而且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英明指出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周立波这个家伙就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妄图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妄图挽救资本主义覆灭的命运，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奴才相。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武装头脑，树立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掌握“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继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湖南日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 《三里湾》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反动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

“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就在这年春天，反动作家赵树理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大毒草《三里湾》。

《三里湾》一出笼，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便亲自出马，大肆吹捧，什么“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什么“反映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激烈斗争”；什么“农村社会主义变革的新图画”；什么“建国以来”的“优秀成果”，等等。列宁指出：“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剥去《三里湾》的画皮，就暴露出它的本来面目：《三里湾》是一株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反动！

### 丑化贫下中农 反对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解放后我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场大决战，是有几万万农民参加的一场极其伟大、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是站在广大贫农、下中农一边，热烈歌颂他们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引导和支持他们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还是向群众的头上泼冷

水，扼杀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广大贫下中农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诬蔑办农业合作社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恶毒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反动作家赵树理炮制的《三里湾》，正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抹煞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一株大毒草。

《三里湾》所写的背景，是山西晋东南革命老根据地的一个农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晋东南的广大贫下中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从一九四三年以来，先后出现了象李顺达、郭玉恩所领导的那种为实现远大的革命理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与阶级敌人斗，与大自然斗的模范互助组、合作社。然而在赵树理的笔下，三里湾这样一个“工作开辟得早、干部多，而且干部的能力大、经验多”的“模范村”，却成了漆黑一团，乌烟瘴气。赵树理在《〈三里湾〉写作前后》里诬蔑农民“对组织起来不感兴趣”，存在着对农业合作化的所谓“离心力”，“而这种离心力时时影响着一部分社外群众，侵蚀着一部分社员、一部分青年，甚而侵蚀着一部分党员”。这是赵树理在《三里湾》中丑化贫下中农的黑纲领。小说一开始，就丑化翻身农民，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热心——多数没有参加，少数参加了的也不积极”，“有些人除自己不愿入社不算，还劝他们组里的组员们也不要入社”。在小说里，他把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写成了雇工剥削、热衷于单干，反对农业合作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把广大男



女青年说成是一群争风吃醋的恋爱迷，或者是只钻技术，不问政治的糊涂虫，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阶级觉悟和丝毫的社会主义热情。至于对广大农村妇女，则更是极尽诬蔑之能事，不是公开攻击、咒骂农业合作化，就是拖丈夫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后腿。总之，赵树理笔下的贫下中农，都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充满了“离心力”，一心向往资本主义的丑恶人物。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树理，为了迷人耳目，打着“歌颂”“翻身贫农”的骗人幌子，标榜他在《三里湾》中，描写了“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快的”翻身贫农中“两种可爱的人”：一个是所谓“心地光明维护正义”的贫农代表王满喜；一个是“生产上创造性大”的“特等劳模”王玉生。好吧，我们就来看一看王满喜、王玉生究竟是两种什么样的人。

外号“一阵风”的王满喜，刮的是“一阵”什么“风”呢？三里湾一九五一年建立农业社，他没有参加；一九五二年初扩社时，还是拒绝入社。他一头钻进了新富农范登高和资本主义代表人物马多寿控制的“互助组”，给他们出卖劳动力。这个“互助组”，实际是范、马两家专门雇工剥削，并用来对抗农业合作社的一个假互助组，是毛主席抨击的那种“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农民趁机组织低级组或富农社”。在三里湾的两条道路斗争中，王满喜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站在资本主义势力一边，刮了“一阵”又“一阵”资本主义的黑“风”。

所谓“特等劳模”王玉生，在三里湾又有哪些模范事迹呢？在赵树理的笔下，王玉生没有丝毫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整天钻在小屋子里，摆弄着小尺子，埋头技术革新。三里湾两条道路的斗争，他根本不加过问；在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面前，不是斗争而是躲避。甚至因为和老婆吵架，就要“连夜逃出三里湾”，离开农业生产合作社。

同不王满喜、王玉生这“两种可爱的人”，就是赵树理“歌颂”的贫下中农的“英雄”形象。本来是满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却被歪曲成了在两极分化的假互助组里出卖劳力，为资本主义推波助澜的小丑；本来是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冲锋陷阵，同富农资产阶级坚决斗争的贫下中农，却成为脱离阶级斗争，钻在“真空管”里的庸人。歌颂是假，丑化是真。赵树理对贫农代表的所谓“歌颂”，正是对贫下中农的肆意丑化、极大诬蔑！三《高岗对派、干工人雇的“办社办队”

赵树理如此恶毒丑化、打击贫下中农，而反革命文艺黑线“祖师爷”周扬，却胡说什么《三里湾》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这不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弥天大谎吗？大封套

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是农村中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在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最深，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恨，富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战争期间，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就有着互助合作的优良传统。土地改革以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广大贫下中农的生活，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并不富裕，为了摆脱贫困，抵御灾荒，改善生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迫切地要求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正如毛主席说：“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反动作家赵树理百般诬蔑和丑化贫下中农，完全抹煞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就是否定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就是否定

伟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

## 美化资本主义势力 大搞阶级投降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地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和政治的斗争。”在《三里湾》中，反党老手赵树理，打着描写两条道路斗争的虚伪幌子，从根本上歪曲、抹煞了两条道路斗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势力，大搞阶级投降，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样板”。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是站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勇敢战斗的先锋战士。但是，党支部书记王金生，在新富农范登高和政治上反动的富裕中农马多寿等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面前，却采取了调和、纵容、包庇和支持的态度。

绰号“翻得高”的范登高，是一个挂着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招牌的新富农分子。在土改时，他利用职权多分土地，占好地。在合作化运动中，他一方面勾结马多寿等人拼凑假互助组，把地靠给别人种，不劳而获；一方面雇了王小聚给他赶上两头驴子倒贩商品，进行投机剥削。他恶毒地攻击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念经”，咒骂社会主义道路是“金箍咒”。他利用村长大权，给马多寿一家撑腰，不叫让出“刀把地”来，疯狂地破坏农业合作化，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

对于这个新富农分子范登高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王金生先是放任自流，处处回避。碰上他们“东家伙计”吵架，他“就打了一个退步”（这一个“退步”，正是向资本主义退让），生怕范登高“下不了台”。继而纵容、支持，提出什么“党内可以按照具体情况派几个党员留在社外”，“领导”象范登高那样假互助

组的反动主张。在群众的压力下，实在“放不下去”的时候，王金生在刘少奇“党内和平论”的指导下，又导演了一幕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投降的“整党”丑剧。在这个会上，王金生公然认为范登高的问题，只是“经济上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而在政治上又是满脑子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这根本不是什么批判。范登高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明明是政治问题，王金生却说成是经济问题；范登高疯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明明是一个罪恶累累的阶级敌人，王金生却认为是“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完全是为范登高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进行辩护，是向资本主义势力的可耻投降。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就必然反对社会主义。赵树理别有用心地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用经济和思想问题掩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是为了美化资本主义势力，煽动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对政治上极端反动，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马多寿，赵树理更是百般美化，竭力颂扬。富裕中农马多寿一家，“自古”以来就和地主、汉奸刘老五家“有点来往”，土改时险些被斗。马多寿凭着六十多亩水、旱地以及两头驴子的优势，和新富农范登高结成了一势，拼凑假互助组，剥削别人的劳动等于一年雇“三个多月长工”，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力求把自己变成三里湾的首户。他恶毒地辱骂党、团员，死守“刀把地”，对抗扩社，反对开渠，向农业合作社猖狂进攻。就连他家的大黄狗，也成了专咬合作社社员的怪物。王金生对马多寿夫妇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獗进攻，不但不发动贫下中农作斗争，反而装聋作哑，任其泛滥。在王金生的眼里，“刀把地”简直成了农业社的“命根子”。离开它，农业社就开不成渠，扩不成社。为

了这块“刀把地”，他动员全体干部、社员给马多寿夫妇“赔情”，“说好话、讲条件”，“要什么给什么，要地给她换地，要租给她出租，要产量包她产量”。一再奴颜婢膝，百般乞求。当把那块“刀把地”搞到手，“糊涂涂”马多寿也带着他发家致富的“铁算盘”，被迫进了合作社的时候，王金生惊喜若狂，立即高喊“欢迎欢迎”，“光荣上加光荣”。王金生为了进一步博取资本主义势力代表人物的欢心，赶制了“一杆光荣旗”要送给马家。“常有理”听说要来送旗，反动气焰更加嚣张，破口大骂：“不要他们的旗！送来了给他们撕了！”尽管这样，王金生还是厚着脸皮，让党支部吹喇叭，副社长打着红绸旗，桥梁主任敲鼓，全体社员整装列队，前呼后拥，到马家院送“光荣旗”。党支部张永清更是奴气十足，摇尾乞怜。在“授旗”仪式中，他向“常有理”赔罪说：“老嫂子，从前我得罪了你，今天吹着喇叭来给你赔个情！”完全是一副跪倒在资本主义势力面前的投降主义者的奴才相。

赵树理究竟在歌颂什么，鼓吹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吗？他通过王金生的丑恶表演，借着红旗和锣鼓，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反动人物树碑立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组织必须领导广大群众，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破坏农业合作化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三里湾的党支部书记王金生不是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而是蒙蔽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屈膝投降，完全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在王金生的妥协投降下，范登高和马多寿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根本没有受到真正的批判、斗争和清算，就一个个眉开眼笑地在一片锣鼓声中进入了“社会主义”。范、马、王三家结了亲，成

了儿女亲家，伙穿一条裤，同走一条路，都“成了一势”了。一个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村长，一个是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兵，一个是支持他们的黑后台党支部书记，共同掌握着三里湾的大权。范、马、王三家驾驭着三驾马车，乘坐着“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小反倒”等一群散发着臭气的人物，正踏着“偏西的月光”，向资本主义滑去。反动作家赵树理把王金生这样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称为“好党员”、“社会主义光明势力的代表”，就是宣扬阶级投降，为大叛徒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唱赞歌。赵树理狂妄地叫嚣，要把王金生的复辟黑货“推广”开来，“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就是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 打着合作社的招牌 鼓吹资本主义

反动小说《三里湾》，是在庆祝三里湾合作社“扩社”“胜利”的锣鼓声中结尾的。赵树理是歌颂社会主义胜利吗？否！他打着写扩社的幌子，拼凑了一个假社会主义合作社的样板，狂热鼓吹资本主义道路。

三里湾这个假合作社，是赵树理否定贫下中农，大搞阶级投降的必然结果，是推行刘少奇反革命路线的必然产物。三里湾经过扩社，从它的领导权到经营方针和发展前景，都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完全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轨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扩社以后，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走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金生，仍然窃踞着党支部书记兼副社长的大权；新富农范登高仍然挂着党员招牌，继续当他的村长。其余的干部，有的是埋头技术不问政治的黑标兵；有的是向资本主义势力俯首投降的软骨头。同资本主义势力同流合污的人当了监察委员；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富裕中农的儿子，掌握了文教大权；新富农的女儿恋爱

迷当了社长的秘书兼管财政。三里湾的党、政、财、文大权，完全掌握在一小撮资本主义势力代表的手里。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把赵树理的复辟幻想变为复辟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取代了社会主义道路，三里湾合作社成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

在这个修正主义领导班子的控制下，三里湾合作社一贯推行刘少奇鼓吹的“利润挂帅”、“实利第一”的资本主义经营方针。在这种反动方针指导下，他们不分敌、我、友，只要粮、棉、油，有钱就行，有利就干，有奶就是娘。宣扬这种反动方针的情节，书中比比皆是。专署的何科长，区上的张副区长，一到三里湾就忙问分红和收入账，连连称赞菜园“十八亩就收入三千万”，画家老梁急忙高喊“再种它五十亩”。赵树理笔下的广大农民入社不是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羡慕”合作社“光菜园子的收入，每户平均就能分到差不多一百万元”。三里湾社干部们在宣传扩社的优越性时，不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而是一口一个“多赚钱”。外号“两大份”的袁天成，入社时把多半土地留作“自留地”，大搞变相单干。有些社员不同意他入社，王金生却大谈什么“好地多一亩有一亩的作用”，有实利，于是让袁天成入了社。政治方向可以不管，而好地不能不要，资本主义可以泛滥，只要有实利就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

我们的方针是“抓革命，促生产”，政治统帅经济，革命统帅生产。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狠抓革命，才能使生产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飞速发展。离开无产阶级政治，离开阶级斗争，离开社会主义，离开世界革命，一味追求“多打粮”、“多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它只能滑向资本主义，决不能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的合作社，实质上是打着社会主义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

赵树理为了掩盖他假扩社、真复辟的罪恶阴谋，给他所炮制的假合作社披上一层社会主义的外衣，请出画家老梁画了三幅画：“现在的三里湾”，“明年的三里湾”，“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说明“三里湾以后要走的路子”。赵树理指的是一条什么路子呢？

这三幅画和全书一样，根本看不到五亿农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阔步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根本看不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看到的只是青山绿水，杨柳成荫，小孩子在水渠里“捉蛤蟆”、“捉鱼”的一片和平安静的景象；看到的是“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还有什么“锄草器”、“收割机”。不管赵树理说得怎样天花乱坠，戳穿了，他理想的“社会主义”，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是检验科学的社会主义同一切形形色色的冒牌的社会主义的试金石。赵树理公然抹煞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一客观事实，抽掉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叛，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通过三里湾合作社这个黑“样板”，复辟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让黄世仁、南霸天、座山雕这些地、富、反、



坏牛鬼蛇神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贫下中农重新当牛做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吹捧《三里湾》是什么“农村社会主义变革的新图画”。什么“新图画”？不正是这幅资本主义的蓝图吗！什么“变革”？不就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吗！

\*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大毒草《三里湾》在一九五五年出笼，绝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刘少奇一伙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复灭的命运，抛出了“停、缩、整”一整套反动方针，大砍农业合作社，妄图阻挡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资产阶级司令部豢养下的“实干家”赵树理“为了迅速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立刻跳了出来，披装上阵，急不可捺地炮制了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大毒草《三里湾》，赵树理“配合”刘少奇的“政治任务”是多么忠实！赵树理贩卖刘少奇的黑货是多么卖力！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我国五亿农民，紧跟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绕过暗礁险滩，战胜妖风迷雾，沿着社会主义航向从胜利走向胜利。反动作家赵树理及其黑主子刘少奇也被革命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当前，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抓紧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倒批臭反动作家赵树理，把农村两条道路斗争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原载《山西日报》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七日）

## 彻底批判《三里湾》贩卖的 “阶级斗争熄灭论”

晋 红 兵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彻底埋葬农村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一场大革命。在整个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资产阶级反动作家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却一笔抹煞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激烈的阶级斗争，抹煞了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大肆贩卖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为地、富、反、坏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推波助澜，大开绿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 抹煞阶级斗争 掩护敌人进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反革命破坏合作化运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反动作家赵树理却公然宣称“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因为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所以在《三里湾》里“就根本没有提”。

什么“见到的不具体”！赵树理炮制《三里湾》“体验生活”的所在地——平顺县川底社，在办社中就存在着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川底党支部带领广大社员群众，同反革命分子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赵树理不仅亲眼看到了这一切，而且与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赵树理的谎言，只能是欲盖弥彰，更加彻底地暴露了他故意抹煞农村阶级斗争，贩卖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掩护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反革命面目而已！

什么“根本没有提”！阶级敌人破坏农业合作化，赵树理在《三里湾》里不是“没有提”，而是提的很多。只是他硬把敌人当作“人民”，把破坏活动写成“思想落后”，有意地把阶级敌人掩盖起来，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在小说一开始就通过“旗杆院”的详细描绘，宣布三里湾唯一的一个地主刘老五，早在一九四二年因当汉奸，“叫政府捉住枪毙了”。从此，三里湾的地主彻底消灭，除去旗杆院门前还有一块上题“文魁”二字的破匾以外，简直连一点剥削阶级的影子也看不到了。三里湾成为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了。但是，三里湾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新富农分子范登高，勾结政治上极端反动的富裕中农马多寿、“常有理”，以及劳改犯、老牙行等等，组成了一股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疯狂地向社会主义进攻。他们或者利用假互助组，组织富农社，大搞变相雇工剥削；或者通过假入社真单干，盘剥贫下中农；或者跑运输，搞黑市，大挖社会主义墙脚，拚命发展富农经济。他们甚至通谋合作，精心策划，疯狂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诅咒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金箍咒”、“头疼药”等等，真是切齿之声，格格可闻。这股极为反动的资本主义势力，掀风鼓浪，兴妖作怪，从政治、思想、经济各个领域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赵树理硬说他在《三里湾》里“根本没有提”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赵树理为了混淆视听，欺人耳目，硬给这些破坏农业合作

化的阶级敌人披上“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或“劳动农民”的外衣，在他们的反动嘴唇上浓施粉黛，乔装打扮，把他们破坏农业合作化，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和“思想上”的“离心”倾向，把他们狂热地发展资本主义，归结为只是入社“慢”了一点，等等。总之，都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赵树理还为这个荒谬的结论无耻辩解说：“我这部小说是写合作化的，要写阶级斗争那是另一部小说的事情。”这就是说，农业合作化中没有反革命的破坏，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在这里，赵树理就是以所谓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故意抹煞阶级斗争，混淆敌我矛盾，贩卖其黑主子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他把阶级敌人与人民群众“合二而一”，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杂凑一锅”，从而把水搅浑，为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施放烟幕。其反革命目的，就是妄想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掩护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严格划清敌我界限，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目前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象范登高、马多寿那种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仍然存在。有些人由于中了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余毒，丧失了革命警惕，把敌我矛盾看成人民内部矛盾，对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发起的进攻听之任之，置若罔闻，让范登高之流自由泛滥，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狠抓现实的阶级斗争，把“一打

“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倡的大寨大队为榜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彻底批判刘少奇及其走卒赵树理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鼓吹“党内和平” 阴谋篡党篡政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党内也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反动作家赵树理炮制的毒草小说《三里湾》，不仅抹煞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而且竭力歪曲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公开贩卖其黑主子刘少奇“党内和平论”的黑货，彻底背叛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学说，肆意篡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赵树理笔下的《三里湾》党支部书记王金生，就是一个竭力推行刘少奇“党内和平论”的黑典型。而赵树理却无耻吹捧王金生是社会主义“光明势力的代表”，是“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党员”；他与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范登高，“走的是两条道路”，并且“摆开阵势”，“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王金生果然与范登高“走的是两条道路”吗？他们之间又是如何“摆开阵势”进行“斗争”的？

在《三里湾》的整个扩社过程中，混入党内、大搞投机倒把的新富农分子范登高，疯狂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强迫”农民入社，恶毒咒骂党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是给党员“念经”。他甚至无耻地叫嚣：“当私有制度还存在的时候，你们就不能反对我个人生产”；在研究扩社、开渠的干部会上，歇斯底里地叫嚷：“我的骡子明天还要走，我可以先退席了。”并勾结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马多寿，公开破坏开渠和扩社。面对阶级敌人如此穷凶极恶的进攻，这个“修养”到家的王金生，唯恐范登高怀疑自己“组织群众打击他”，一再对范登高妥协投降，处处表现“忍辱负重”，“委屈求全”，活现出一副可耻的奴才相。

更有甚者，在几次“整党”会议上，范登高不仅拒不检查他自己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而且摆出“革命功臣”的架势，继续猖狂地向党挑战，反党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王金生不但连气也不敢吭，反而挖空心思地为范登高进行无耻的辩护。他胡说什么，“范登高在经济上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又是满脑子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赵树理故意把范登高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只归结为“经济问题”和“思想问题”，完全是别有用心。这正是赵树理鼓吹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支持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反革命策略。

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当范登高被包庇过关后，王金生竟拱手让权，委以重任，让这个新富农分子继续当党员，做村长，把持村里的领导大权，“带着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富农分子范登高要把三里湾带向何处，岂不可想而知！从妥协投降包庇过关，再到拱手让权，这就是王金生“摆开阵势”同范登高进行的一次次的“斗争”，实际上是一次次的投降。赵树理在这里是反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是贩卖刘少奇的“党内和平论”，

岂不一清二楚！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反动作家赵树理还要把王金生这个极力推行“党内和平论”的黑典型，作为一个“范例”，“推广”开来，“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妄图彻底取消党内的思想斗争，大搞一团和气的“好人党”，让那些大大小小的范登高们篡夺党政领导大权。显然，如果他们的这套反革命阴谋得逞的话，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很明显，王金生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光明势力的代表”，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派。他同范登高根本不是什么“走的是两条道路”，而是同一条资本主义邪路，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扮演的两个丑角。赵树理拚命鼓吹“党内和平论”的反革命阴谋，就是妄图让我们宽容混进党内的坏人，使他们继续留在党内，用孙行者钻进肚皮的战术，从内部破坏我们的堡垒；就是在“党内和平”的烟幕下，肆无忌惮地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因此，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以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光辉学说为武器，彻底批判刘少奇、赵树理鼓吹的“党内和平论”，积极地严肃地进行党内斗争，加强思想上的整顿，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党内斗争是党的生命。“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党发展、壮大的战斗历史，就是党内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党内一切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历史。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们党正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彻底批判和战胜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粉碎了刘贼破坏农

业合作化的反革命阴谋，引导全国亿万农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前进的。反动作家赵树理，歪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篡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是为其黑主子刘少奇篡夺党的领导大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服务的。他们贩卖的“党内和平”，就是要搞“和平演变”，使我们的党“和平演变”成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党内和平论”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大敌。我们必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主动地向阶级敌人打进攻战，在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中，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今冬明春，我省整党建党的群众运动即将蓬勃开展。我们整党建党，如果不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也就可能象《三里湾》那样，走到“关门整党”、“和平整党”的邪路上去。离开阶级斗争，是整不出一个好的党组织的。整党就要充分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重点放在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混入党内、特别是领导班子中的极少数的坏人，把王金生、范登高式的人物揭露出来，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并作出适当处理。在整党中，我们要以反动作家赵树理及其毒草小说《三里湾》中的资本主义代表人物为活靶子，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他们贩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批判象王金生搞的那种“和平整党”和“关门整党”，提高广大党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中的继续。“阶级斗争熄灭论”，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手段，是麻痹革命人民斗志的一付毒剂，是掩护阶级敌



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颗烟幕弹。它的要害在于：只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而不许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反击，以便篡夺无产阶级政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反动作家赵树理在《三里湾》中费尽心机，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地贩卖其黑主子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充分证明了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条忠实走狗，是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员得力干将。但是，小小蚍蜉，岂能撼动参天的大树；碰壁苍蝇，休想阻挡历史的车轮！我们必须坚决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伟大号召，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山西日报》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七日）